

学科综述

党史·党建

2015 年度河南省党史研究综述

尹书博 叶春涛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是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历史发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学科。所以,从学科门类的科学划分来说,目前的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实际上是分属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因而也是分属于历史学与法学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按照历史分期,可以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 年—至今)。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 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东方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的

牺牲巨大,它极大地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实力,大大缓解了苏联和英美等国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并“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孙俊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在政治上能够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坚决支持和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战得以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在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与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有效吸引和沉重打击了敌人,并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为民族抗战担当重任并指明了胜利的方向;在文化思想上动员全民族抗战,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促进了人民的大觉醒,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使中国人民对抗战具有了必胜的信心;在政权建设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立以“三三制”为特点的抗日民主政权,使解放区成为当时中国民主政治的模型,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光明美好的前景,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开掘了无尽的力量源泉。由上说,中国共

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①

吴宏亮指出,游击战最早是从古人的战斗实践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战争形式,其机动性和灵活性充分体现战斗指挥者的智慧和勇敢,往往能够达到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效果。游击战争是战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继承创新,在抗日战争中把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高度,确立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斗争方式,这是由中国国情、党自身性质、党领导武装力量的特点和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军事斗争的经验所决定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最广泛动员了人民群众参与抗战,牵制并大量歼灭了日伪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坚持和最终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②

(二) 关于遵义会议的研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具有深远影响,不仅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转折点。楚向红撰文指出,遵义会议提出的正确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证,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夯实了实践基础;遵义会议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动力;遵义会议结束了第三次“左”倾错误思想在党中央的统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遵义会议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团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构建了坚实的人才支撑;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平台。^③

(三) 关于延安时期的研究

张俊国指出,纵观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史,不难看出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前期,中共的许多重大决策和决定都是由共产国际做出的。但在土地革命后期,尤其是在长征途中,中共一度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也得不到其直接指导与

帮助。这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分析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创造了条件。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影响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会议。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于1935年7—8月间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工作思路,即“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这一工作思路的转变在客观上为中共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开展工作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延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工作十分关注,不仅经常讨论中国问题,而且还经常给予党的各项工作以理论指导、经费与物质援助,这对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正确处理国内外棘手问题、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④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地完成领导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制定了一系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与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对日军战俘的政策,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八路军俘虏日军战俘以后,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成为当时摆在党和人民军队面前的又一项重要课题。张俊国、张亚楠指出,党和人民军队采取了多项措施对其进行教育、引导和改造。第一,建立日本工农学校。学校校长由1940年春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野坂参三担任。教员由从延安各界调来的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军战俘如吉积清、川田好长、杉本一夫等担任。第二,重视对日军战俘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想把日军战俘从他们以前因受反动教育形成的思想与观念中转变过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党和人民军队认为必须对这些日军战俘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内容主要是,要将日军士兵与日本的统治阶级和军阀区别开来,并对日军士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们能够深明大义。第三,用真诚的态度与行为打动和感化日军战俘。在与日军战俘打交道的过程中,八路军官兵深深地感到,如果单单使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对待他们,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

他们之中一些人内心深处的错误观念根深蒂固。在此情况下,用真诚的态度与行为打动和感化这些日军战俘就尤其显得重要。第四,改善日军战俘的生活待遇。为了感化和安抚日军战俘,八路军总政治部曾经专门作出了《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日军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提出对日军俘虏的优待层次和办法。经过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优待、教育和改造,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军战俘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⑤

(四)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研究

吴宏亮、陈杰撰文指出,鄂豫皖根据地以大别山为中心,南瞻江淮,北望中原,沟通南北,连贯东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播撒革命火种,动员民众暴动,建立革命政权,使该地区成为中共武装斗争的一块重要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缩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⑥

刘晖认为,陕甘宁边区政权,即“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其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是依据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在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建立的自治性地方政权。边区政权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归属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具有体制内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年底大体完成第一次普选,基本实现从苏维埃制度向抗日民主制度的转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适应新的局部执政环境,接受新的执政考验。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实施“三三制”政权结构模式,并在民主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等理政层面进行艰苦探索,显示出抗日根据地政治生态演化的民主取向和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务实创

新特征。陕甘宁边区政权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实践创设了有效载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强后盾。^⑦

(五)关于中原局的研究

中原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朱德曾说“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中原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曾三次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使其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第一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任命刘少奇(化名胡服)为中原局书记,郭述申、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等为中原局委员,所有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中原局机关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第二次,1945年8月12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原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既可阻滞国民党军队向华东、华北、东北各战略要地进攻,又可成为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向北巩固的重要阵地。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鄂豫皖中央局,徐向前任书记(因病未到职),郑位三任副书记,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等为中央局委员。10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鄂豫皖中央分局改称为中原局。第三次,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开会研究战略进攻的准备工作。刘伯承、邓小平等向中央建议成立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16日,党中央复电同意,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郑位三任第一副书记,李先念任第二副书记,李雪峰任第三副书记。中原局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之后,机关随军先后设在息县、光山、新县、商城、潢川等地。^⑧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一)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改革思想研究

多年来,不少人对毛泽东是否有“改革”思想颇有微词。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一生喜欢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一直陷于“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漩涡或者“政治革命”的无限纠葛之中。张俊国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对毛泽东

一生革命生涯的过于简单化理解与误解,也是对“革命”与“改革”之词的混淆与曲解。毛泽东是中国改革伟业的探路者与开拓者。他既具有内涵丰富的改革思想,也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梳理和总结毛泽东改革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两个不能否定”以及“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实质,从而不断增强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政策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⑨

(二)关于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研究

当前,学界忽视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论述,没有很好呈现出毛泽东在商品经济问题上的相关论述。近年来,随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出版,披露了大量的新材料,使得我们有可能更为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主要集中在1958年的下半年到1960年的上半年。在这段时间内,他带领一些同志认真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边读边议,迸发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些重要火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林志友、曲星颐认为,深入研究1958~1960年中国这段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发掘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具有深刻的理论内容和独到的个人见解:中国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阶段;发展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发展商品生产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⑩

(三)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既是一场经济改革,也是一场政治革命;既有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设计,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利益发展,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现实考量。高斐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利益发展,促进农民政治认同的经济改革和政治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几个阶段,农民由于每个阶段获得的利益不同,政治认同呈曲线变化态势,从互助组的欣然入社到高级社的强迫入社甚至闹事退社,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其所得利益息息相关。由此可见,农民政治认同状况由利益发展状况所决定,并随利益发展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而动态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利益发展的促进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形成了双向互动传输,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因此,要维持和巩固农民的政治认同,就要不断引导农民利益向更广范围和更高层次发展,要关注农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⑪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一)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深入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把兰考县作为他的联系点。2014年3月和5月,他两次实地指导兰考县的教育实践活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尹书博认为,深入学习、持续弘扬焦裕禄精神,同全面从严治党是高度契合的,是落实“三严三实”要求,深化“四风”整治、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必然要求,是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选择。全面从严治党与持续弘扬焦裕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永远不会过时。全面从严治党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认真贯彻落实“三严三实”要求,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焦裕禄式的

好党员、好干部,推动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⑫

从严治党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和政治遗产。闫德民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战略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其继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的继承;二是对其思想理论成果的继承。其发展则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全面从严治党同其他“三个全面”并列提出,共同构成治国理政新的战略布局;二是把从严治党由一种管党治党思想,上升为管党治党理论体系;三是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深化了对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为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基本遵循。^⑬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在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周楠认为,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战略部署,说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说明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步入了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就是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新方法、新举措、新变化、新局面,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其关键在于全面和从严。这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关键所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要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切实搞好作风建设。^⑭

(二) 中国共产党文化生态思想与研究

文化生态,即文化生发和存在的状态,是一种借用生物学的方法探索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研究范式。王桂兰指出,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在探讨文化建设规律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文化生态的理念。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思想,体现了鼓励文化多样、学术竞争、继承与借鉴不同时空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元素等生态理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提出的“两个

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和谐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等观点,则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化应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持文化的良性持续、涵养优势、竞争性文化等生态理念。以文化生态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看待并研究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可使这一问题回归文化本身,其中遵循文化规律使之化解就显得尤为必要。^⑮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获得全体民众广泛认同,是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其自身由社会主导价值观逐步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的元问题。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为关键的是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否则就没有实际意义。孟轲认为,按照价值认同的一般模式,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建构,应当遵循宏观上的“内生”和“外推”两种路径。前者属于主体自身的自觉行为,即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由内而生”地建构认同;后者则属于外在主体的间互推动,即通过制度规范、法律约束、教育引导、榜样示范等方式,“推己及人”地建构认同。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大多侧重于探索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内生路径。从价值认同的外推路径来看,引导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进一步以完善教育体系为基础,引导民众行为认同;以融入制度法规为保障,推动民众教化认同;以强化干部垂范为重点,引领民众效仿认同;以倡导互动参与为载体,促进民众体验认同。^⑯

(四) 群众路线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哲学基础,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谷正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群众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并且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创新群众工作的方

式方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⑭

(五) 执政党形象研究

良好的政党形象对于政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对自身政党形象的塑造和维护。孙景峰、刘佳宝认为,自媒体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各级党组织、各级党媒和党员队伍是自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三大主体。自媒体为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带来了机遇,有利于提升党的权威形象、高效形象、亲民形象、民主形象、廉洁形象和法治形象,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提出了意识形态、党员队伍和政治参与能力三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必须建立健全自媒体管理机制和运营机制,各级党媒应努力实现与自媒体的深度融合,党员队伍须努力提升自身的自媒体素养,以建设自媒体环境下良好的政党形象。^⑮

(六) 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研究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是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赵士红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目前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这一制度受到国内外的多重压力,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值得认真研究。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这一制度仍然存在不相适应、需要完善的方面。我们要结合新形势新情况不断巩固和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使其向法制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方向发展。^⑯

四、关于党史重要人物的研究

(一) 陈独秀

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人物的政治定性固化及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有待恢复,针对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成果甚少。十一届三

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之闸门,实事求是又渐成学术研究的学风精髓,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门先后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专门机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一批收录陈独秀文章、书信和诗稿等资料的书籍解禁出版,尤其是随着 90 年代一大批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档案被俄罗斯解密,一系列关于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于世,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建党的历史贡献重新得到肯定。巴志鹏认为,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并推动其中国化的主体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前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积极传播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愈益结合,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基础,而顺应时代潮流的陈独秀则是这个伟大政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成立之后,陈独秀又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重要代表。^⑰

(二) 邓小平

唐国战撰文指出,1949 年 7 月至 1952 年 8 月,西南处于军事斗争向和平建设过渡阶段,邓小平要求全党重视统战工作,他认为统战工作包含团结和分化两个方面,其中团结居首,本质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邓小平批评了当时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着的关门主义、“清一色”思想以及官僚主义,指出统战工作要注意方法,要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注重沟通协商,特别是要发挥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强调要做好党外民主人士的职务安排,注意保护重要民主人士。邓小平西南时期统战思想内容丰富全面,指导简洁透彻,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下,有力地促进了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地完成。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重温邓小平的统战思想,对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有积极的指导作用。^⑱

(三) 叶挺

谢晓鹏撰文指出,叶挺将军一生战功赫赫,威名远播。人们一提起他的名字,马上就会联想到北伐时期的“铁军”名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抗战时期新四军的首任军长。但绝

少有人知道,1932—1937年叶挺曾在澳门长期居住,并积极从事多项政治活动。在叶挺避居澳门的几年间,中共党组织也十分关心叶挺的情况,并委派有关人员与他联系。1934年叶挺从福建回到澳门后,中共党组织曾指定郑德作为联络人,经常往来于香港和澳门之间,与叶挺保持密切的联系。1935—1936年,宣侠父在香港工作期间,也曾多次约见叶挺,向他介绍当时国内的革命斗争形势,鼓励并支持他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的工作。1937年春节过后,叶挺举家自澳门迁往上海。根据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他与国民党方面的陈诚、陈发奎等友人,以及在上海的中共同志频繁往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奔赴抗日战场。^②

参考文献

- ①孙俊杰.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胜利[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 157—158.
- ②吴宏亮. 论人民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5, 05: 11.
- ③楚向红.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里程碑[J]. 学习论坛, 2015, 11: 30.
- ④张俊国. 延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援助[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5, 7: 9.
- ⑤张俊国, 张亚楠. 延安时期党对日军战俘的基本政策及改造路径[J]. 党史文汇, 2015, 05: 31—34.
- ⑥吴宏亮, 陈杰. 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战胜利的历史贡献[J]. 安徽史学, 2015, 6: 157.
- ⑦刘晖.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及其局部执政的路径[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5, 07: 66.
- ⑧王黎锋. 中共历史上成立的三个中原局[J]. 党史博采(纪实), 2015, 03: 43—48.
- ⑨张俊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改革思想探析[J]. 毛泽东研究, 2015, 2: 60.
- ⑩林志友, 曲星颐. 1958~1960年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及其评价[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5: 51.
- ⑪高斐.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利益发展与政治认同[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4: 12.
- ⑫尹书博.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持续弘扬焦裕禄精神[J]. 学习论坛, 2015, 06: 17.
- ⑬闫德民. 论全面从严治党对邓小平从严治党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5, 5: 19.
- ⑭周楠.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J]. 学习论坛, 2015, 08: 10.
- ⑮王桂兰. 中国共产党文化生态思想演进述论[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5, 11: 37.
- ⑯孟轲. 论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推路径[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5, 11: 32.
- ⑰谷正. 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J]. 理论导刊, 2015, 01: 63.
- ⑱孙景峰, 刘佳宝. 自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新论[J]. 探索, 2015, 4: 24.
- ⑲赵士红. 社会转型期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思考[J]. 协商论坛, 2015, 01: 25.
- ⑳巴志鹏.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1: 16.
- ㉑唐国战. 邓小平西南时期统战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6: 1.
- ㉒谢晓鹏.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在澳门的岁月[J]. 工会信息, 2015, 5: 25—27.

(作者单位: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哲学

2015 年度河南省哲学研究综述

孟耕合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重要的基础学科,我国哲学学科的划分目前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宗教学、外国哲学、逻辑学、科技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八个二级学科,2015 年度我省哲学研究概况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撰稿人:孟耕合)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研究

对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研究是一项基础工作,潘中伟在《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与哲学的出路——简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因及体系原则》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的动因是要通过研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指出自我意识哲学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的概念内涵、特点和必然结果,以此为基础明确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为哲学的发展寻找出路。该文认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体系原则是以自我意识为主导、合理地吸收黑格尔整体哲学原则的新的启蒙主义哲学原则。

对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集中在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哲学概念的阐发上。吕世荣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哲学阐释逻辑》中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为经济全球化思想提供了前提,使得马克思能够从现实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唯物史观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根源和趋势,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源、动力和趋势,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王建刚在《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逻辑嬗变及

其当代价值》中系统梳理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逻辑历程:从自我意识活动到主体的对象性活动,再到感性的人的活动,认为这项研究有利于澄清当下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误读和曲解,使科学的实践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长点。刘怀光、马艳艳在《论马克思自由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超越》中认为,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马克思对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哲学自由主义批判后,将自由引向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解决了自由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明确了人类解放的根本在于不断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最终建立了自由理论。路向峰在《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视域》中,认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揭示,指出了破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社会保障路径,即通过社会再分配理论保障人的现实生活权利。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及其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未来如何发展,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潘中伟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歧见产生的三种境域》一文中,论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理解上的分歧主要发生的三种境域:政治实践、学科建设和文本解读。该文指出,产生分歧的核心在于,人们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不同认识。因此,应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概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运用历史的和差异的分析方法,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再以此为基础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李彦如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联系》中认为,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因而也就从本质上把握住了哲学,并以此思维方式面对和解决一切理论和现实问题,完成了对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批判和清算,建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朱荣英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学际遇”及其发展趋向——兼评处在现代与后现代冲突与交融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主义的晚期阶段,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现代主义。该文认为,后现代哲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路径,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现代意蕴和精神指向,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朱荣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核心论点》一文中指出,对“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的三种不同解答,产生了三种研究范式,即“西马是马论”、“西马反马论”、“西马混马论”。“西马是马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别于中苏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理论传统”;“西马反马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面引向了现代唯心主义;“西马混马论”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论”与“反马论”的混合物,自由具体分析才能对这种意义复合体做出准确定性。郭强在《评大卫·哈维过程辩证法的本体论思想》一文中认为,哈维的过程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而且蕴含着一些重要的创新点。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也是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郑永扣、寇东亮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高校智库的功能与实现》中认为,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高校智库在彰显意识形态建设理性权威模式、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培养意识形态智库人才等方面可发挥独特功能。聂立清在《论我国当代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中指出在发展理路上要厘清意识形态包容、整合和引领的关系,扩大主流意识形态

包容力和认同力,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掌握舆论话语权。

郑永扣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中国精神的三重意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确认中国精神的思想特质、价值指向和实践定形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寇东亮在《重塑当代中国人自由观念的三个着力点》中认为,重塑自由观念的三个着力点应是权利、机会与能力统一的“定在的自由”,能动、秩序与自律统一的“规则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与一切人的自由、种自由与类自由统一的“平等的自由”。辛世俊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化”问题研究》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日常化应注重平时,不断重复,建构长效机制;具体化应落细、落小、落实;形象化应注重语言通俗化、载体具象化,注重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生活化应与民众生活深度融合,外化为民众的生活方式,凸显民众的主体作用。李蕊在《榜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中指出,要发挥榜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的作用,需实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生成培育、宣传传播、学习践行三大环节中的良性互动。另外,李蕊在《国际视野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前研究与实践主要存在国际比较研究匮乏、视野定位狭隘,国际关注度不够、认知认同欠缺以及国际吸引力和话语权不强的不足。这些不足要从国际定位、国际认同和国际影响等途径进行改进。

2015年12月6日,河南省哲学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会议由河南省哲学学会主办,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承办,讨论的主题是“意识形态与发展理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交流,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二、中国哲学(撰稿人:李晓虹)

(一)中国哲学代表人物思想及经典发掘

2015年度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面,河南哲学

界主要侧重于中国哲学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经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研究上。

儒家思想研究:刘晓靖《论孟子道德理想人格》对孟子树立的圣人、君子、大丈夫等不同品次的道德理想人格榜样进行了详细解析;《荀子道德理想简析》认为荀子设计了“圣人”“君子”等道德理想人格形象,“圣人”人格的突出贡献是在努力改造自身的基础上制定了礼义法度,“君子”人格的突出特点则在于对“礼义”的学习、贯彻和维护。王占华《论孔子的休闲活动及休闲理念》对孔子的休闲理念知行并举、休闲有道、休闲境界进行分析。吕友仁、吕梁《“天地君亲师”溯源考——兼论《礼记》的成书时代》结合郭店简、上博简资料,对“天地君亲师”的出处进行了考证,认为源出《礼记·礼运》。李敦庆《“三礼”中仪式用乐的政治含义及礼、乐之关系》认为礼乐关系中礼为核心,乐为从属,后世制礼作乐基本延续了“三礼”的这一礼乐思想。陈功文《孔子定〈礼〉考论》对孔子所“定”之《礼》的归属、所定之《礼》与编纂《礼》的关系、孔子定《礼》的依据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和分析。胜祺《孔子的天命观对中国宗教历程的影响》分析了孔子天命观对后世不同时期儒家、道教、佛教等的影响。范国兴《孔子人文思想形成的社会语境分析——从“礼崩乐坏”到“克己复礼”》在分析周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给孔子人道主义进行定位,从“礼崩乐坏”的周礼沦丧道孔子立志“克己复礼”的角度谈孔子人文思想形成的社会语境。韩国良《对“孔子删《诗》”之争的再检讨》对“孔子删《诗》”问题的各种争论比如关于“古诗三千”问题、“《诗》三百”问题、“季札观礼”问题、“思无邪”问题、“孔子删诗权力”问题、“史书无载”问题等六个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其《从王弼玄学看陶渊明的思想属性》一文从王弼玄学的角度分析认为陶渊明思想应该归属于道家而不是儒家。李翠荣《〈论语〉中孔子“仁爱”思想探析》在分析孔子仁爱思想三重意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民爱物)的基础上对孔子仁爱思想的价值追求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曾祥芹《论孔子、曾子“仁学”的人性美、心灵美、体系美》对从人性美、心灵美、

体系美三个方面孔子曾子仁学体系的进行分析;其《〈论语〉、〈曾子〉对〈礼记〉的读以致用》(阐发了孔子和曾子文章对经典的学以致用,发挥了孔子的“礼教”功能;《〈曾子问〉对“三礼”的读以致用》分析了曾子对夏商周礼制、礼仪、礼俗的因革损益。薛立芳《孟子仁政思想中修身与为政之关系辨析》在分析孟子修身、仁政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孟子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并以此提出其“无罪岁”的原则,把修身中的自反原则融入为政之中,建立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内在联系。

张树业《冠礼与成人之道——由冠礼释义看儒家哲学的礼义诠释特征》认为儒家冠礼释义围绕伦理—政治维度、德性—修养论维度和形而上一性体论维度三个方向展开。通过冠礼释义,使其义理信念落实于社会礼仪活动,同时通过对其内涵的揭示和解释,使礼俗获得点化和提升,从而实现了生活哲学化与哲学生活化的双向互动。王雷松《胡安国的民本思想与宋代的王道》认为急民事、惜民力是胡安国王道政治理想的基本途径。刘克《汉代传统孝道观念变迁及其价值的图像考古》通过汉代孝子孝行汉画分析了汉代孝道观念的演变发展;《仁义直道与情理圆融:对“亲亲相隐”命题的新探析——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儒家亲情本位的伦理智慧和价值旨趣》认为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雷永强《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述略》认为孔子继承了西周雅乐“尚中”“尚和”的审美趣向,倡导“中庸”的音乐审美标准,提出文质中道、尽善尽美、节情适度的“中和”审美观,由是二实现其“成于乐”的教化目的。孙喆社《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认为汉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此外,还有赵振《试论二程语录的

《易》学价值及特点》、吴信英的《郭店儒简“礼乐同构”论》、周歌《从〈礼记·乐记〉管窥汉朝音乐教化思想》、邵昊《孔子的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等。

道家思想的研究:刘洪生《〈庄子〉内篇之间的结构关联》对《庄子》内篇七篇文章之间的关系做了梳理,认为七篇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以《人间世》为中轴线,向两边展开的复合结构。前三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和后三篇《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各自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组。前、后两个单元之间,又存在不等价的关系,分别有上下、尊卑、主次、先后、主动与被动等对比区分。七篇的穴窍是《人间世》,核心思想是“贵己”、“重生”。李晓英《试论老子之“善”》对名词之善、形容词之善、副词之善、动词之善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分析“善”是对道或接近道之利物不争等行为及结果的价值判断,亦是对德之一即玄德的颂赞,体现了老子的价值观。《否定和超越:试论老子的否定式表达》认为以否定词和否定句组成的否定式表达是老子文本表达思想观点的重要途径和基本特点,文章总结出老子否定式表达的六种形式:直接式否定、削弱式否定、选择式否定、前提式否定、重复式否定、疑问式否定,立足对行为主体性特点的否定和省思,围绕世界是否完全可以认知、强势强制行为是否可行、民众受扰之如何避免等三方面展开,表达了老子对人是否能够变革世界、是否应该变革世界和如何变革世界的省思。其《〈庄子〉天下观初探》一文则对是《庄子》的重要概念“天下”进行了解析,认为“天下”一词体现了《庄子》对天下理想秩序的向往、想象和建构,也渗透着《庄子》的精神超越和升华过程。魏长领《〈道德经〉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管窥》一文从有无关系、大小关系、争让关系、刚柔关系、动静关系等五个方面对《道德经》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进行剖析。此外,还有张帆《〈道德经〉中“道”与“德”的哲学阐释及其英译研究》等。

(二)中国古典哲学中不同问题不同学派之间、中国古典哲学与国外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

叶平《稟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对从西汉以后建立的儒家稟气人性论和道

家道教的稟气人性论在此后的发展中的儒道互补特征进行了分析,在唐末到宋代,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努力,儒道稟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高建立《论陆九渊心学与孟子心性思想之关系》详细分析了陆九渊心学与孟子心性思想之间的关系,认为陆九渊不仅继承发展了孟子心性思想,而且又兼容程颢好佛教禅宗关于心性论思想,从而超越了孟子思想,形成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李俊《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比较分析》认为儒家伦理长期以来对我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并比较和分析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在建立基础、主体地位、世俗心理、行为规则4个方面的不同及影响,认为深入了解两者所存在的对立和冲突,在构建法治中国过程中对儒家伦理科学合理地进行扬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周海燕《公孙弘儒法结合的思想理论与实践》认为公孙弘以儒术缘饰文法,将二者巧妙结合并成功应用于国家治理之中。彭慧《〈道德经〉“鸡犬之声相闻”与〈桃花源记〉“鸡犬相闻”》分析陶渊明对老子清静自然、返璞归真思想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发展,认为前者折射的是老子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宏观视野和“自然无为”政治思想,后者折射的是陶渊明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细腻情感和“归园田居”的生活理想。王亚萍《孔子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政治定位》从治国依据和治国方式方面对两者进行政治定位,分析其异同,为后续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刘君莉《比较视域下冯友兰的“直觉观”思想探微》在解读冯友兰直觉观的基础上对伯格森与梁漱溟的直觉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冯友兰直觉观有流于“神秘主义”的危险。

(三)中国古典哲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的发掘

李莹《中国传统哲学人格学说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人格学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察》认为以道自认是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根本基础,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等共同构成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传统士阶层之理想人格范型。李晓英《早期道家精

神超越的现代教育意义》从心灵转化和精神超越的角度对早期道家的精神体验和心灵世界进行深度解读,讨论其学派内部对变革世界之不同理解,认为早期道家精神超越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现实指导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刘泽《中国古代哲学中“几”的思想略考》和《中国哲学发展方向忧思》两文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探索。郭树伟《“文以载道”之文学现象与中原文化精神》对“文以载道”和中原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王敏光《先秦哲学视域中的个体性思想性格探略——以价值论为视角》认为先秦诸子所论之相同点在于均站在价值论视域中力主研究世界对于人的意义,目的是促使人能够不断认识、反思自我,以创造更为和谐之社会。赵玉玲《论老子之“德”及其现实意义》对老子之德解析的基础上认为老子之德所体现的无私品格和谦下之风、以俭啬为积德之本的修德方式对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有重要现实意义。张波《墨子生态思想的时代意蕴》从历史发展、现实环境、未来要求等角度认为墨子“节用”“节葬”“非乐”的节俭观和“非攻”“兼爱”等和谐观对现代生态环境建设有启示意义。此外,此类文章还有金妍妍《论先秦之礼的嬗变及现代意义》等。

三、宗教学(撰稿人:李晓虹)

(一)宗教的影响问题研究

魏长领《试论宗教对道德信仰的影响及其双重效应》认为宗教是影响人们道德信仰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一方面,道德和宗教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或主题,宗教具有一定的劝善功能,宗教对人们的道德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宗教是以人对神的崇拜和信仰为前提的,把道德信仰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不可能的。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信仰不仅会因为宗教的瓦解而崩溃,而且,宗教信仰所引导的基本价值一旦偏离了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方向,就会使人们的道德信仰陷入非人性、非人道的误区,人们会因为宗教的非理性而导致偏离正确价值方向的狂热和痴迷不悟。

(二)佛教研究

关于佛教研究方面佛理研究比较少,佛教音乐、佛教文化现象、佛教节日、佛教与古代人文及儒家关系方面研究比较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华伟《从〈法苑珠林·祭词篇〉看唐代孟兰盆节操办中存在问题》和《佛教的精舍》两文对佛教孟兰盆节和佛教的精舍做了详细分析;赵振《二程语录与禅宗语录关系述论》认为二程语录既是对先秦儒家语录的继承,也是受当时盛行的禅宗语录影响的结果;刘英丽《河洛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变迁》认为早期传入洛阳的佛教音乐梵呗,经由古代中原艺术家们的吸收、融合与创新,逐渐演变成具有中原特色的河洛佛教音乐。刘会凤《论〈醒世姻缘传〉的佛教文化叙事》认为《醒世姻缘传》主要以家庭婚姻生活为主线,以“轮回果报”的民间佛教信仰体系建构情节,笼罩全篇的宗教化叙事框架生动地演绎出明末清初民俗文化中的佛教信仰图景。张昌红《论佛偈对六朝传统诗歌体裁的影响》认为佛偈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传统诗歌偏离了原来的抒情主题,分化出了山水诗、宫体诗、叙事诗、哲理诗等。李婷婷《洛阳白马寺“水陆法会”仪式及其声音研究》认为对洛阳白马寺“水陆法会”的研究可见佛教文化传播与声乐关系极大。任红敏《三教圆融与元代禅宗僧人刘秉忠诗词的文化意蕴》认为贯通儒释道三教思想影响了刘秉忠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和致思途径,也促成了他诗词独特文化意蕴的形成。张富春在《试论世说新语中支遁形象》一文分析了支遁的高僧、名士、俗子三位一体的形象。刘英丽《文化转型视域下河洛佛教音乐的价值、现状与传承》对河洛佛教音乐的宗教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社会服务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原佛教音乐研究的基本动态及问题分析》认为中原佛教音乐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为中原佛教音乐艺术研究的发端阶段,成果多见于尼树仁的相关研究;20世纪末以来,为中原佛教音乐研究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新的中原佛教音乐文献及艺术形式通过调查被整理出来,中原佛教音乐的研究视域逐渐扩大,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但

就目前中原佛教音乐的整体研究情况而言,还略显冷清,关注度严重不足。黄昌艳《天台宗形成原因的历史论析》从历史背景、政治扶持、僧侣弘扬、天台教义等方面对天台宗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分析。

(三) 道教的研究

相比于佛教研究,道家研究较少,且主要侧重在道家经相和文化,道教理论研究较少。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许宜兰《道经存思图像初探——以〈太上老君大存思图注诀〉为例》一文主要从道经中众多的存思修炼图像切入,分析道门中存思图像所反映的想象中的神仙世界,生命存在的奇幻形态,由此可反映出道门中人对于人生观、生死观的独特看法和认识;这些存思的神仙境界令人神往,激发人们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学、绘画等艺术提供了神奇绚丽的浪漫意象。许宜兰《道经图像论要》认为道经图像在道教教义的传播中渐次展现,不断丰富完善,它们是道教教义与道教信徒思想沟通的桥梁及美术图像的结合品,是道教思想和交警教义在形象上的重要表现手段和传播媒体。此外还有薛瑞泽《北魏道教视野中的中岳嵩山》对嵩山早期道教记忆和寇谦之对道教的改革做了分析。

(四) 基督教研究

关于基督教研究主要侧重在对经典的研究。比如吴艳培《〈圣经〉与高校专业英语教学》、刘丹青《〈圣经〉中的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侯林梅翻译《〈新约〉与希腊罗马书写》;范迎春《马丁·路德的总结改革及其对西方近代社会的影响》认为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及其所提倡的“因信称义”等学说从根本上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上的统治地位,为西方近代社会自由平等思想的发展、政教分离的出现以及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四、外国哲学(撰稿人:崔增宝)

(一) 西方哲学史基本问题的研究

朱荣英《西方哲学研究“言必称希腊”的宗教情结与神学语义》认为西方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具有同源性,这种同源性成就了西方哲学思维特质的

薪火相传与一脉相承,因此后来历代哲人都情不自禁地“言必称希腊”。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素朴的“家园意识”,除古希腊哲学体现了当时思想的最高水平与最高成就外,更重要是还在于它提出并论证的世界观的神学语义,为此后西方哲学的发展确立了基本信念与发展路向,以至于作为文化轴心为一切知识体系奠基。即使是它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困惑也成为永恒无解的哲学难题,紧紧吸引着历代哲人不断变换思路与方式对之进行无穷无尽的诉求与追问。在西方哲学陷入危机而功亏一篑的关键之时,正是西方哲人借助上帝之名而“言必称希腊”之日,这凸显了古希腊哲学中的那种充满了荒谬怪诞的宗教情结与无可奈何的悲凉意味。张焕宁《笛卡尔哲学难题及其求解方法带给我们的理性启示》表示笛卡尔哲学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哲学。随着现代神经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等相关研究的深入,心身问题的神秘面纱也将逐层揭开,或者为最终破解笛卡尔二元论的哲学难题给人以方法论上的启示。

(二) 现代西方哲学热点问题的研究

曾云《胡塞尔对伦理人格的思考》认为,对于伦理人格的思考,胡塞尔前期持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中后期他对这种理性人格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人格的最深层存在及其自身统一性的根源,不是仅仅在理性中,更根本的是在爱中。王海琴《胡塞尔视域中的自然主义意识研究认识论缺陷》认为在胡塞尔视域中,自然主义意识研究的非科学性主要体现为迷信自然科学范式,使意识自然化,疏离真正的心理现象。这使其认识论基础含糊、思路陷入循环论,视域上偏离纯粹意识领域,理论上导致怀疑论。对此,自然主义者没有深刻认识,这导致了不良影响。胡塞尔以后的自然主义意识研究及其认识论也不能避免以上问题。对于自然主义者而言,胡塞尔走向现象学的方案过于激进,引入现象学方案则较为稳妥。陈四海《海西和罗蒂关于隐喻认知性的论辩》认为海西和罗蒂关于隐喻认知性的论辩是当代隐喻研究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字面主义理论的一次重要交锋。海西和罗蒂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进行修

正,从而对“隐喻是否具有认知性”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回答。该论文把海西和罗蒂关于隐喻认识性的论争置于20世纪后半期分析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一方面希望说明何以隐喻不是一种单纯的话语风格;另一方面借以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进行反思。

(三)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

牛子宏《自然正当性的贫困——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认为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永恒不变的自然法一直是判断理想政治的标准。18世纪兴起的历史主义强调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差异,主张政治价值的多元性和历史性,从而动摇了西方僵硬的自然法传统。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否认统一的价值标准的存在,使人们无法判断何谓良善的政治生活,最终必然导致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而古典的自然正当观念则为人们克服当前的政治哲学危机提供了智慧。虽然施特劳斯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但仍然无法摆脱普遍主义的思维窠臼,最终陷入了政治价值一元论的困境。

(四)语言哲学的研究

杨红玉发表了《对现代逻辑中量词的逻辑哲学省察》认为量词是现代逻辑的关键性概念,对量词的解释既是现代逻辑、也是现代哲学的重要问题。首先,现代逻辑中的量词在本质上是一个二阶函数,量词的这种特点克服了传统逻辑量词的局限性,并使得现代逻辑的语言处理能力大为增强,但同时也使得对量词的语义解释涉及了很多概念和理论。其次,两种对量词的解释方案——指称量化和替换量化,它们的不同特点造成了不同的逻辑后果和哲学后果。最后,量词成为分析诸如真、指称以及本体论这些哲学概念的核心概念,逻辑也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深刻的视角。肖娟娟发表了《语言意义的技术性因缘——基于当代的一种分析》,认为语言意义是语言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在被称为技术时代的当代,“语言意义的技术性因缘”,是语言与技术的复杂互动关系中蕴含着的一个往往被忽视的深层问题。若循梅洛—庞蒂的语言现象学,语言意义以身体经验为“基础”,以身体

经验为“基础”的语言意义显现于“表达”。作为语言意义“基础”的身体经验,因其结构要素的技术规定性而充满着技术性规定;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的语言意义“表达”,因其增生效应、交流功能与权力特征的技术规定性而充满着技术性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意义的技术性因缘,在“基础”与“表达”层面获得某种确证。确证语言意义的技术性因缘,并非主张语言意义的技术“决定”,而是旨在申明,在语言意义的众多因缘中,技术是不可忽视的“座架性”因缘。

(五)西方哲学其他问题的研究

曹玉涛《交往视野中的技术正义》认为当今时代是技术时代,正义的追求与技术活动密切相关。在技术形成、发展过程中,由于责任、机会、风险等使得我们面临技术正义的问题。从交往视野分析技术正义形成的领域、商谈机制、基本原则等,是破解当代技术发展中正义问题的合理路径。程献礼发表了《托马斯·贝叶斯对概率原理的证明尝试》认为贝叶斯所关注的问题是逆推理问题。从贝叶斯的基本概念——概率的两个定义入手,结合Shaffer的对该问题的论述,重新解读贝叶斯对概率原理的证明尝试。不管选择实施的机会变化中什么样的事件,然而贝叶斯构建的一次偶然事件B的持续出现将产生无限的增益。王亚萍《孔子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政治定位》认为中国古代圣人孔子的中庸思想与西方政治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两者所处地理位置与文化背景不同,其各自的政治思想也有很大区别。论文从治国依据和治国方式两方面对两者进行政治定位,分析他们的异同,从而为后续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

五、科技哲学(撰稿人:钟远征)

(一)心灵哲学问题研究

刘高岑的《意识经验问题昭示的新科学理念及其哲学理解》认为,在当代心灵科学哲学的各种物理主义理论均陷于困境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意识经验难题,查尔默斯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二元论”。“自然主义二元论”虽然冠以“二元论”的名称,但它实质上并不是世界观意义上的二元论,因

而并不构成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挑战,但其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则为我们从科学哲学层面探索意识经验问题开辟了新的路径。徐姗、盛士涛《心灵哲学视阈中功能主义的科学路径探析》认为19世纪的心理学家们急于将自己从哲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然而尽管他们对生理现象的研究产生了真正的科学发现,而新兴心理学的任务在于把心理事件和大脑的神经系统过程关联起来。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当代哲学及科学带了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心理学哲学的兴起,以及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技术、认知、人工智能及心脑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心灵哲学学科的发展、壮大,是因为科学主义的倾向是心灵哲学的“催化剂”。刘高岑《丹尼特的幻想虚构论自我观批判》认为,丹尼特是当代心灵哲学中幻想虚构论自我观的主要代表之一。然而,其基于“意向立场”心灵理论所论证的幻想虚构论自我观却并不成立。因为首先意向立场心灵理论本身不能成立,其次他严重忽视了自我概念在当代的新发展,再者他关于“自我是人类的语言虚构和编造”的论证,关于“心灵现象仅仅是生物大分子的自动机制”的论证,以及关于“自我就是身体及其自动机制”的论证,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错误。

(二) 范式转换与科技进步问题研究

罗玉萍《从普遍模式到具体方法——图尔敏科学发现观的范式转换》一文挖掘了科学发现的逻辑这一科学哲学中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认为图尔敏以物理学为例,从科学不等于普遍陈述、自然史与物理史的发现、物理学发现的图像推理法、科学发现的合理性等方面,阐述其科学发现观,从而进一步促进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王国印《论科技进步的非对称性对科技生产力的影响》认为科技进步是科学进步与技术进步的有机融合。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第一生产力,就在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但是,科技进步非对称性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采取适当的措施对科技进步的非对称性进行矫正,才能使科技进步对经济系统发挥更大更持久的效力。

高翠平《技术糜母视角下的技术进化过程研究》中首先分析探讨了技术糜母的基本功能、作用以及以技术糜母为基础的技术个体、技术种群和技术群落。之后,利用产品说明书作为技术的体现,以说明书中抽取出的知识元表征技术糜母,进而应用于智能手机领域的技术进化分析,剖解了智能手机领域在技术个体、技术糜母等角度的技术结构,最终发现智能手机领域可以被看作为以知识元为节点以知识元间相互关联为连线的知识生态系统。

(三) 生态哲学与进化论问题研究

曹玉涛《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批判与重构》认为,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问题,不仅导致了西方技术批判理论的重心从道德批判、制度批判转向生态批判,而且还使得生态文明的理念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当代技术理论批评家们对发生在现代社会中严重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新的展现和揭露,对二战结束后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涌现出的新技术展开了新的分析和批判,并对未来生态文明社会中的“替代性技术”进行了大胆的梦想和建构。李胜辉《自然选择、定律与模型——福多的“先验论证”错在何处?》认为,自然选择理论一直被认为是解释生物进化现象的核心机制,而福多构造了一个“先验论证”说明它不能对同延的性状做出区分。他宣称只有存在可以支持反事实句的生物学定律才能解决该问题。但是,他认为生物学中不存在这样的定律。索伯针锋相对地指出有关自然选择的数学生物学模型即是可以支持反事实句的定律,但索伯的观点太强,我们仅需坚持“生物学模型可以支持反事实句”这一主张就可以反驳福多的观点。

六、美学(撰稿人:刘漫)

(一) 美学原理

席格《〈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当代美学原理的建构》中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中国当代美学原理体系建构的影响,大致呈现出由整体性理论基础到批判性吸收和超越,再到内在性影响的沿革。程勇真《当代美学经济功能转向刍议》认为,美学经济功能的当代转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审美化的结果,二是日常生活审

美化的结果,三是艺术商品化的结果。程勇真的另外一篇论文《劳动:一个重要的美学话题》认为,劳动在中西不同的历史时段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样貌。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观念的学术反思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周馨《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边界研究》探讨了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

(二) 中国美学史问题研究

程勇真《从审丑到审美——先秦女性审美原则历史变迁探析》考察了先秦女性审美原则的历史发展,从“丑陋健硕”到“美丑合一”再到“品貌唯美”,先秦女性审美原则的历史变迁就为我们探析先秦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实在的切点,也为我们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两性关系模式提供了一些启示。王海涛《继承与超越:冯友兰新理学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冯友兰批判继承了儒道美学的合理成分,建构了独特的以人生境界论为核心的新理学美学体系,为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益参照。

(三) 西方美学史问题研究

席格《论维柯思想的美学史价值》中认为,自鲍姆嘉登以来,西方美学经历了从感性学、艺术哲学到文化哲学的递变。每一次变化,维柯均能因其理论的普遍性而被重新阐释,重新发现。席格在他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系梅伦·博塞维奇合作的论文《狄德罗自然观的艺术映像与美学影响》中认为,狄德罗自然处于“永恒流动”之中的自然观首先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其次影响了他的美学理论建构,使他提出了“美在关系”说。崔应贤《文章美质论辩——黑格尔美学思想批判》对美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有关美的特质的界定——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进行了深层次地批判。

(四) 文艺美学与影视美学

在文艺美学原理方面,程勇真《文艺作品的鉴赏标准应来自美学》认为,用美学的观点来评判和鉴赏文艺作品是对美学研究的正本清源。人们应该以内在的美学视点来研究艺术,而不是仅仅以外在的社会学观点研究艺术从而把艺术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和道德谱系,也决不能以经济效益作为艺术

创作的最终目的,更不能以经济效益作为评判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而她的另一篇文章《形式美—道德美—形上学——文艺作品评鉴的三个美学维度》则讨论了以美学的观点评鉴文艺作品的方法,认为形式美、道德美、形上美就是具有最佳“观察位置”或解释力的三个维度。

在文艺美学的其他方面,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如杨虹菲《浅析元代山水图画式的审美愉悦观——以倪瓒山水画的树木为例》认为,中国古代美学为保证审美愉悦的自由性和纯粹性通常将审美愉悦与功名利禄区分开来。庄子提出的“自适其适”开辟了中国古代审美愉悦观的一个新的境界,在倪瓒绘画作品图式中“逸”其实就是倪瓒将“自适其适”这一生命愉悦观的精神境界在绘画图式中的外化表现。刘亚荣在其论文《康德先验美学视域下舞蹈的本真审美研究》中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主旨精神进行分析,在其先验美感理论的基础上对舞蹈审美存在本质进行深入研究,把人们对舞蹈的审美置于人的主体性原则当中。余璐《探析现代流行音乐创作中的美学价值》立足现代流行音乐创作中的美学艺术,探析现代流行音乐的美学特点及流行音乐美学艺术的演变过程,从而挖掘流行音乐创作中的美学价值。王丹阳的论文《凝固的张力——浅析雕塑艺术的审美时间》对雕塑艺术的审美时间进行了研究。

在影视美学方面的成果有梁哲《〈一步之遥〉的叙事策略与美学特征分析》,张景源《纪录片〈第三极〉的美学表达及地域特色》等。

(五) 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方面,王焱《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学向度》认为生态美学通过改变人的审美方式和行为方式,对生态文明建设展示出自身的理论价值。

环境美学的论题集中在乡村美学和城市美学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程勇真《传统乡村美学消逝的趋势表征及其反思》和《审美主体视野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对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不断消逝的传统乡村美学进行了考察及反思,并以审美主体视野为出发点来反思当下的乡村文化建设,提出了乡村文化建设中审美主体的尊重与重建的问题。就后

者而言,主要成果有:位俊达的《本雅明城市美学的当代意义》;胡蓉的《论城市美学视野下的城市绿地》;王珊珊的《地域文化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的应用——以洛阳公共艺术为例》;李晓昕的《环境美学在郑州市龙子湖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六) 美育

吕华在《浅谈美学素养在钢琴音乐欣赏中的重要性》分析了在当今美学素养和美育的必要性及意义,认为提升钢琴音乐欣赏的美学素养对改进音乐教学、推动高校音乐教育改革有很大意义,并给出了具体的途径。张浴《浅谈工科院校中的美学教育》分析了对高职院校工科生进行美学教育的必要性及主要途径。

(七) 河南省美学美育学会筹委会胜利召开

2015年7月27日下午,在省社科联领导的关心、推动下,酝酿了近一年的“河南省美学美育学会”筹委会在省社科联5楼会议室隆重召开。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副主席唐玉宏、黄河科技学院特聘教授鲁枢元先生出席并讲话。全省18个地市、23所院校及科研单位的30名代表共襄盛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尽快恢复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河南省美学学会,促进全省美学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提高我省美学研究的质量水平,打造中原美学新高地,为“中原智库”建设做出贡献。

七、伦理学(撰稿人:张宜海)

(一) 国内外伦理道德思想研究及其借鉴

一是国外伦理思想研究。杨伟涛《青年黑格尔道德自我观的伦理转向》认为,黑格尔构思作为有机体和整体的绝对伦理,主张将道德自我与伦理共同体结合,发扬成员间的尊重和“团结”精神,并以爱国心与民族自尊心的集体荣誉感,促进道德自我基础和道德自我观的社会伦理转向,社会伦理构成了黑格尔之后伦理学的主题和方法论特征。二是国内伦理思想的借鉴。占江《后现代主义思想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影响研究》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是西方众多社会思潮之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现代性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质疑和批判,提出了个性多样化、世界多元化、反对纯理性和科学至上

等,这些对我国道德教育的主体与客体、目标与内容、课程、模式和评价体系等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中,正面的影响主要是推动我国道德教育多样化发展和师生互动教育模式的盛行;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使得我国道德教育无所适从,不符合道德教育的价值统一要求。

(二) 伦理道德理论研究

一是马克思伦理研究。葛宇宁《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认为,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正义论,主要着眼于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评价而不是事实描述;其次,它是一种社会正义论,超越了传统正义理论的法权结构框架,对社会本身进行价值指认;再次,它是一种类正义论,认可人是类存在物,采取类哲学思维对正义进行规定;最后,它是一种历史辩证正义论,认为正义是一个逐渐展开和实现的历史过程。二是道德理论研究。蒋桂芳《现实与超越:道德不可偏废的两个维度》认为,否定道德的超越性,把道德原则仅仅局限于现实的利益和关系层面。会使道德原则因缺乏张力而软弱无力;离开现实性的基础,片面强调道德的超越性,会使大多数人难以认同和奉行,造成道德原则的虚无和无效。因此,坚持现实性和超越性统一的道德原则,既是道德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解决当前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本出路。三是道德意识理论研究。刘怀光《当代中国道德意识的文化意蕴及其新语境》认为,影响当代中国道德意识的文化因素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源头:有在日常生活层面仍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有起自西方现代性的外来文化;也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内生性的价值诉求。各个民族、国家道德意识间的差异和矛盾在全球化的场景中以一种更加突出的方式存在。现代性价值诉求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仍将是全球化中普遍道德意识的基础。四是道德观念研究。周武军《弱化与提升:新时期道德观念嬗变的趋势与评析》认为,新时期道德观念变化的趋势是宏观政治层面的愈益重视和明晰,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弱化,新兴的道德观念在提升。道德观念宏观叙事环境的嬗变,展示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应及其作用。

蒋桂芳《论道德与人的现实需要》认为,道德起源于人的各种需要关系,道德与人的需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讲需要必须考察是否合乎道德要求,讲道德要求和研究道德问题必须追问是否满足了人的需要。

(三) 伦理道德现实问题研究

一是伦理热点问题。厉有国《法治进程中党员干部权力伦理迷失透视》认为,矫治党员干部权力伦理迷失,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培育和强化党政干部的公共节操;重构社会价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规范党政官员的权力行为,建立有效的党政官员权力运行监管机制;理顺分配关系,创建分配正义。单玉华《金融风暴后的金融伦理反思》认为,反思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创伤,强化人们在金融活动中的信用准则、公平准则和责任道义感,提升金融活动中人们的伦理理性,是金融活动健康发展的必要环节。张晓敏《廉价药品短缺现象的伦理解读》认为,廉价药品的短缺反映了制药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廉价药品需求正当性与药品可及性不足的冲突以及廉价药品缺失与药企公共健康底线责任的冲突,凸显了企业行为的伦理悖论。二是道德存在问题研究。张宜海《公民道德动力不足的原因和对策》认为,公民道德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有:道德信仰迷失,道德价值观混乱;社会整体道德责任感弱化;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反差大;做好人可能有风险甚至付出代价等。解决公民道德动力不足问题客观要求:用科学的道德观引导人们的生活;利用制度的力量引导人们向善;通道德训练培养“道德人”;解决“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矛盾;创建德、利、福相统一的道德环境等。黄思记《论当前道德及道德教育的症结——兼论世俗化进程中认知的偏颇与失误》认为,造成当前我国的道德及道德教育的内在因素主要有:对待传统文化曾经的非理性的错误的态度导致道德的盲区和消极因素极度膨胀;政治运动对做人本分的消解;几十年来理性的缺失导致愚昧的滋长;改革开放关注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人们的道德和人格的同步提升。世俗化进程是20世纪下半期我国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中,认知的偏颇

与失误使道德及道德教育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将贵族精神与平民世界相对立,将知识和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相对立。徐化影《主体论视域下道德重建如何可能》认为,道德需要人们自觉进行主体的三维重建:道德理性的主体重建是道德重建的思想性前提;道德实践的主体重建是道德重建的现实性路径;道德互主体关系的主体重建是道德重建的社会性支撑。三是道德风险问题研究。李培林《基于声誉管理视角的旅行社道德风险防范研究》认为,深入分析旅行社道德风险的成因,探索声誉管理对企业道德风险防范的价值,提出我国旅行社声誉管理的策略建议,有利于旅行社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加强道德自律,防范道德风险,抑制败德行为。

(四) 伦理道德建设途径

一是高校道德建设途径。万是朋《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道德教育探究》认为: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高校道德教育面临新的困难与挑战,主要包括高校知识化的德育目标与生活化的德育目的相偏离,道德教育内容与大学生的道德需要相脱节,道德教育方法与大学生的主体性要求相矛盾。解决当前高校德育困境的主要措施在于着力构建生活化的德育目标和德育内容,不断创新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二是大学生伦理道德建设途径。武海燕《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网络伦理问题探究》提出加强网络伦理的法制建设;加强网络伦理的主体建设,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加强网络技术监督机制建设,弥补网络“漏洞”;加强网络伦理的内容建设,构建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生态环境等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对策,为规范高校大学生的网络行为、自身的发展和网络伦理的教育提供了参考。高芳放《道德教化与道德养成——当代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与重塑》认为,对大学生进行的道德养成教育应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使受教育者能够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行为能力和较高的品质。重塑当代大学生的道德品质,要从重塑大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自觉、道德自制着手。三是公民个体伦理道德建设途径。冯国锋《个体道德治理动力形成机制探析》认为,个体道德治理动力机制包括个体道德治

理内部动力机制、外部压力机制和外部引力机制。对于个体道德治理动力机制,只能通过创造条件改变相关因素来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促进个体道德治理动力机制的形成,而不能控制。四是职务伦理建设。蒋小平《职务犯罪侦查伦理内涵及培育路径》认为,应从规范确定:明确职务犯罪侦查伦理的表现行为、制度保障;保障职务犯罪侦查伦理的强制效力、教育引领;健全职务犯罪侦查伦理的培训形式、文化熏陶;促成职务犯罪侦查伦理的价值认同四个方面建构“四维一体”的职务犯罪侦查伦理培育路径模式。

结语

2015年,河南省哲学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布广泛,这主要是由于哲学学科自身学科较多的原因造成的。具体到每一个二级学科,较为集中的话题很少,却反映出河南省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之间缺乏较为密切的学术联系,没有形成学术集聚效应的事实。就此而言,现有的哲学学科平台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经济学

2015 年度河南省经济学研究综述

张占仓 李丽菲

2015 年,面对经济新常态,河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调中求进、改中激活、转中促好、变中取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强支撑、防风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全省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持续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十二五”规划顺利完成。按照发表文献分析,我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重要专题研究等五个方面将我省经济学研究进展情况进行概述。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

2014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以下简称《战略纲要》),2015 年 1 月 4 日正式发布。这是河南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重要讲话精神的再动员、再部署,是持续河南成功实践,完善提升思路举措,引领全省上下沿着正确方向奋力前行的再发动、再安排,是河南省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和行动纲领。喻新安等学者对《战略纲要》的意义、内涵等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 意义

《战略纲要》立意高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1. 顺应发展大势,是准确把握我省发展所处历

史方位,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系统部署。《战略纲要》在更高层面明确了认识新常态、把握大势,适应新常态、顺势而为,引领新常态、主动作为,以现代化的思维和方式谋划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有利于全省上下统一思想认识,积极抢抓机遇,科学应对挑战,努力保持和提升全省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态势。

2. 尊重客观规律,是河南沿着正确方向和轨道乘势前进的基本遵循。《战略纲要》坚持从省情出发,强调注重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大事要事,围绕走好两不牺牲、四化同步的科学发展路子,遵循规律、改革创新、破解难题。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清醒认识和把握,有利于河南在新的起点上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更高的阶段。

3. 注重继承创新,是对河南过往持续实践探索进行的系统总结、拓展和提升。《战略纲要》是对河南发展思路、丰富实践的系统梳理和完善提升,既系统总结近年来的实践探索,效不更方,把行之有效的思路举措持续下去,又因应形势变化,把握住新机遇、新挑战、新思路、新对策,不断完善提升。

4. 坚持承天接地,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促使中原更加出彩的使命担当。《战略纲要》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导河南实践,顺应亿万中原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把河南放在全国大局中谋划,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来定位,进一步明确了河南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找准了推进工作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河南具体化,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河南的要求,实现了中央精神与河南实际的有效结合。

5. 体现总体设计,是着力解决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战略谋划。《战略纲要》从着力解决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入手,找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点、矛盾关键点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对河南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进行系统的谋篇布局,进一步明确方向目标和路径举措,使河南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发展目标更加明确,发展方式更加科学,发展措施更加完善。

(二) 内涵

战略目标:宏伟远大,鼓舞人心,描绘了河南发展的美好愿景。《战略纲要》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两个维度进行了阐释。一方面从主要经济指标、四化发展、创新驱动、依法治省、社会事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对部分领域和区域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行了战略部署,强调在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上建成全国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中心;在信息基础设施上达到国内一流、与世界同步;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等等。《战略纲要》对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行了远景展望。强调到2040年左右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总体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新河南,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

战略方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指明了河南发展的根本方向。《战略纲要》从“三个必须”的高度,明确了河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指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科学思想方法,把干事创业热情与求真务实精神结合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

战略布局:站位全局,统筹协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在河南的具体化。《战略纲要》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精神,提出了以打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制度建设为内容的“四个河南”“两项建设”战略布局。

战略重点:科学把握,正确选择,明确了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意义的主攻方向。《战略纲要》强调要坚持四化同步科学发展的路子,聚焦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战略规划,重点对推动“一个载体、四个体系、六大基础”建设作出战略任务部署。

战略举措:激发活力,增创优势,汇聚起共推发展的强大正能量。《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了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大战略举措。

战略保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战略目标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战略纲要》从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五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三) 战略保证

《战略纲要》蓝图绘就,开启了河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1. 加强党的领导,凝聚发展合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关键在党。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把关定向,带好头、尽好责、领对路,在坚持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中搞好服务、优化环境。

2. 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发展共识。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和媒体格局深刻变化,贯彻落实《战略纲要》,要特别重视思想认识的统一。最大程度地汇集一切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3. 强化使命意识,明确责任担当。贯彻落实《战略纲要》,必须强化使命意识,敢于担当,义不

容辞肩负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4. 改进方式方法,转变工作作风。为科学贯彻落实《战略纲要》,必须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干部队伍状况,与时俱进地推动领导工作的观念、作风、体制、方式方法的转变,提升应对复杂形势的能力和水平。

5. 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动力活力。积极贯彻落实《战略纲要》,需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体制机制、推进依法治省,进而让一切推动发展的动力活力竞相迸发^①。

喻新安认为认清当前河南省经济发展形势,对于打赢稳增长、保态势攻坚战,促进河南经济迈上新台阶,意义重大。以《战略纲要》为标志,河南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就是“全面发力、赶超、提升”的阶段。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河南经济出现了新机遇、新优势、新目标、新布局、新结构、新动力这六个方面的新变化。这六个新变化,表明了河南经济发展的动态、情势和大势是向好的,反映了当前有困难也有光明前景、河南省发展总体态势没有改变的真实情形,也说明打赢稳增长、保态势攻坚战,实现河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备良好的条件。河南经济进入新阶段,已经和将继续呈现四个特征:高层次开放,高起点突破,高强度转型,高标准提升。河南经济呈现的四个新特征,深刻地揭示了经济调整期也是分化重组期、困中有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内在逻辑;清晰地说明了只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持续加力,实现经济增速8%以上及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年度目标是完全可能的。进入新阶段的河南经济发展,要从本省实际出发,坚持后发赶超战略。要清醒研判形势,认识增长速度正在换挡但下行压力较大,经济结构正在优化但调整阵痛显现,发展动力正在转换但新兴力量不够强大的现实情况,找准发力点,以滚石上山的精神和韧劲,打赢稳增长保态势的攻坚战^②。

二、“十三五”规划研究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胜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十三五”期间国家规划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未来五年,中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将稳步提升,在全球战略平衡中国际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我国全面融入全球化的宏观趋势明朗,我国国民经济服务化将迎来历史性浪潮,国家发展将加快改善民生的步伐,双创驱动将激发就业与发展新活力。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规划的灵魂,创新发展将历史性地走上民族进步的前台,改善民生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持续努力,在2020年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③。

(一)新形势

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对区域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不再是依靠要素低成本优势、依赖规模扩张外延发展的机遇,而是通过提升教育和人力资本素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机遇;不再是单纯依靠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加快发展的机遇,而是扩大内需、实现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机遇;不再是依靠简单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发展的机遇,而是发挥大国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机遇。

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区域发展的基本指向。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阶段性特征,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对区域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为地方发挥区域优势提供了新的机遇。“十三五”期间国家将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使城市群成为集聚人口和产业的主要平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意味着未来我国区域发展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通过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

极,为经济中高速增长培育广阔的区域空间。

国家宏观调控方式和指向的新变化为地方借势借力提供了新机遇。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国家宏观调控的新指向,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解决低水平、低端供给过剩和高水平、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要推动企业从过去重点追求数量扩张、满足人民群众“有没有”的需求转到着重强调质量效益、满足“好不好”的需求方面,要加快营造安全、便利、诚信的良好消费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政策环境。

放眼未来,河南从全局上可能出现几个非同一般的新优势:一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优势,它使河南可能在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方面由跟随者成为领跑者,通过乘数效应促进新产业在中原地区的集聚和加速发展。二是“米”字形高铁网络的优势。“米”字形高铁有助于资源、资本在中原的聚集以及城市经济带、城镇密集带、城市组团的快速形成,产生蛙跳效应,使中原成为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三是“一区三圈八轴带”的优势,这一新的空间布局能产生极化效应,带来巨大内聚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四是新的三大国家战略带来的优势,随着新的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原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将明显提升,腹地效应更加凸显,有利于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进程。因此,采取各种有力举措,培育厚植和充分发挥中原腹地新优势,不仅关乎未来五年河南发展的动力活力,还会对中原崛起的愿景产生深远的影响^④。

(二) 新理念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机遇,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创新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世界最新发展成果,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全面贯彻落实这些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被放在空前的高度,关键要解决未来中长期发展的动力问题。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促进全社会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破解社会公平正义难题。

李庚香指出“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的大转型时期,需要新境界引领,要如期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奋斗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战中干在实处、走在前面。五大发展理念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针对当前发展阶段提出的科学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彰显发展新境界^⑤。

(三) 新动力

河南省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繁重而艰巨。河南省传统产业比例过大,发展的动力在减弱;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动力还没有完全形成,动力转化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现实难题。因此,“十三五”期间,河南省要实现“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力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人均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领域和区域率先

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持续用好传统动力,加快培育新兴动力,着力打造“混合动力”,实现河南经济逆势增长。

在“混合动力”中,虽然传统增长动力减弱,但仍然是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主要支撑。由于以全面创新为内涵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还未最终形成,应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一方面要推动包括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模式业态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加快实现供给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还要挖掘传统发展动力潜力,不断拓展发展动力新空间、焕发传统发展动力新能量。因此,在原有发展动力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培育发展新动力,实现新老动力的平稳转换,成为“十三五”时期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⑥。

李庚香研究指出一是要着力提升传统动力。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经济发展的机遇期,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如何转换动力、形成合力,是国民经济顺利换挡、提质增效的关键。二是要着力用好新型城镇化动力。城镇化水平低是河南省发展的突出短板,也是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新型城镇化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既反映发展水平,更体现民生质量;既是发展结果,也是发展动力。三是要重视外生动力。根据商务部预测,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500亿美元。由于经济增长动力既有内生动力也有外生动力,河南经济要实现增速,仅仅依靠现有的增长动力、增长方式、增长思维与增长政策,是绝不可能自发实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因此,“十三五”时期河南要实现高速增长,不仅要深度挖掘内生动力,还要着力探索外生动力。“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为河南发展开放型经济打开了无穷空间。四是要着力用好“双创”动力。在培育新动力方面,“创业”和“创新”是一对孪生兄弟,“双创”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家大数据战略等是推进创业创新浪潮的重要抓手。李克强总理在河南考察时,对这个问题也作了重点强调,希望河南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走在前列。因此,我们必须抓住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这个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⑦。

中国从“需求侧”改革转向“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其核心思想就是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这就必然要求河南“十三五”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混合动力,而不是单一动力;而要实现混合动力的协同,达到两位数的增长,需要在简政放权、金融推进、国企改革、土地改革、创新能力提高等方面加强对混合动力的政策支持^⑧。

三、经济新常态研究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稳定崛起。从2002年起,新常态一词在欧美国家出现,主要形容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调研期间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2014年11月,北京APEC第22次会议和在澳大利亚的G20峰会上,中国经济新常态成为广泛关注的热词。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经济发展新常态确定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一) 国家层面

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等发生了趋势性变化。

张占仓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把发展速度适当调整以后务实迈向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的一种运行状态,与“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完全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年均GDP增长速度7%左右;二是产业结构排序成为三、二、一,第三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三是经济发展动力均衡多元,创新驱动成为主要动力;四是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五是改革活力显现;六是年均物价总水平控制在2%—3%的水平。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是一种主动的调整与转轨,是一次历史性跃升,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攀登过程。因此,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显示出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国民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发展信息化,科技

发展高端化,居民购物网络化,能源结构绿色化等^⑨。

(二) 河南层面

作为大国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区域在要素禀赋、发展阶段、约束条件等方面呈现较强的异质性,所以,各个经济板块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大省,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势必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呈现出特有的个性特征即区域特质。郭庚茂书记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河南与全国一样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同全国相比,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自身个性的一面。”科学研判新常态下的区域特质,对这些经济大省寻求新的突破,争取更大作为,实现后发赶超,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新常态下河南有别于全国的个性特征:一是靠能源原材料工业支撑增长的传统资源优势在减弱,但交通物流、产业集群等优势在上升;二是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在减弱,但生产要素保障优势并没有丧失;三是新常态下内需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动力转换没有完成,但投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市场、区位优势日益凸显;四是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全球总需求不振,出口拉动减弱,但承接产业转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机遇依然存在,通过转移替代扩大出口份额还有很大空间;五是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靠数量扩张和打价格战支撑的低层次竞争模式难以为继,但在电子商务、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方面与先进地区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有可能迎头赶上、抢占先机;六是特别要看到,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出台政策措施,为我们提升在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在高铁、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方面争取国家支持带来了很大机遇。

喻新安等人研究认为省委九届八次全会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决策部署符合中央要求、符合河南实际,是完全正确的;把新常态的变化转化为河南争取优势、抢占先机的机遇,“实现几何级增长”,是完全可能的;而要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实现稳增长的预期目标和持久的、健康的、更长远的发展,则需要我们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进行系统的谋划和扎实的工作。不仅要积极

适应,还要主动引领。为此,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化危机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在变化中抢占先机,在引领中提升地位,努力开创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⑩。

谷建全研究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河南省经济发展既面临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全国共性问题,也有自身特有的阶段性特征,既要看到差距,更要坚定信心。一是虽然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虽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三是虽然内需增势平缓,但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四是虽然企业经营困难,但产业转型步伐加快;五是增长动力不足,但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可见,当前我省稳增长、保态势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总体看,机遇大于挑战。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河南转型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转型发展是经济新常态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渐进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进一步意识到,当前河南经济既面临困难,也面临机遇,必须坚定信心,通过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11]。

张占仓认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是: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必须系统认识与领会这些主要特点,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河南省全省发展的切入点,坚持中高速增长的大方向,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有大作为,积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做好经济发展工作^⑪。

(三) 具体层面

李政新研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不断深化,河南工业经济也进入到增速不断下调、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增长动力寻求新倚重点的“三期叠加”状态,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已成为河南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工信部正式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致力于化挑战为机遇,抢占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实现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以德国工业4.0为代表

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迅速发展,工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不断加强。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工业制造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⑬。

宋伟研究认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河南省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期的总体态势并没有变,机遇大于挑战。面对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深刻变化,我省惟有迎难而上、应势而变,才能变中求胜、抢得先机,顶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为长期健康发展谋势蓄力。具体而言,制造业层面,我省应加快产品和技术升级,抢占高端消费品市场。服务业层面,我省应充分利用人口与市场优势,发展“互联网+”服务业。城镇化层面,我省应进一步聚焦重点区域,加快发展中心城市,抢占发展制高点^⑭。

此外,宋伟还提出新常态的实质是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经过持续量变积累实现了部分质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消费者发生部分质变,以低收入人群为主体的传统消费需求不断萎缩,以中产阶级群体为主体、注重质量、注重品质的新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并成为消费增量的主要来源。这种消费结构的深刻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不但对中国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产生新要求,由此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也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新常态下新需求崛起并已成为消费增量主体,呼唤新供给快速发展。但现实情况是供给结构并没有顺应需求结构变化而及时跟进,新供给不能满足新需求的快速增长,供需错配问题突出,这不但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适时提高,也使新需求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因此,在需求变化背景下发展新供给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方向^⑮。

四、新型城镇化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是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完善形成的。2002年,中

共十六大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把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五大基本内容之一,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全面丰富和提升了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2014年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我国新型城镇化作出顶层设计。可以相信,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撬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

(一)对城镇化的研究与认识

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呈现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其突出标志是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因而体现的是经济社会分工演进的长期过程。具体到特定区域或城市而言,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等方面的诸多不同,各区域板块间在发展功能上往往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作为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内在要求各区域板块的功能优化和完善,进而实现协调发展。推进城市各区域板块协调发展,是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城市区域板块协调发展的共性问题,要从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城市发展品位的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并超越现行行政管理区划的限制,进行更高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强化政府承担相应发展责任和市场有效配置经营资源的“双轮”。

张占仓等通过研究文献量分析、学术趋势分析、用户关注度分析,得出中国对城镇化研究积累深厚,对新型城镇化研究积累还非常有限,2013年刚刚进入学术研究爆发期,学术关注度和用户关注度都空前提高,对新型城镇化关键问题的认识相对一致的结论。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改革问题,研究提出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让能够并且愿意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点是盘活农村建设用土地资源,住房制度

改革的核心是让进城居民能够有希望买得起住房,城镇体系改革与创新的趋势是限制特大型城市 and 大型中心城市发展,推动全社会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城镇体系要均衡化发展。研究认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丰富,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已经进入学术爆发期,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与创新的方向是向质量提升转变,中国城镇体系建设均衡化势在必行^⑦。

赵书茂研究指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突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文化遗产为灵魂,彰显城市的特色和个性,以科学推进为总要求,实施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完善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四化”同步为途径,统筹城乡发展^⑧。

刘道兴强调片面的以“经济城市”单一理念指导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在较短时间内问题不大,甚至还会感到成效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问题就越来越暴露出来,城市过度拥挤、功能紊乱、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人们在城市生活紧张、焦虑、冷漠、无助,城市缺少文化,品位不高,没有特色,千城一面,“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上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成立“城市合作与发展组织”,组织力量系统研究人类的城市问题,通过了指导世界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人居议程》,这个文件对什么是城市下了一个定义,“城市是地球上人类集中居住的区域”,也就是说,城市是“人居中心”。这是一个城市以人为本的定义,是把市民放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设中心地位的定义,判断城市 and 一切城市建设活动好与不好的根本标准就是是否适宜“人居”,评选美好城市的根本标准就是“宜居”。省委九届八次全会通过的《战略纲要》提出了建设“人文城市”的新要求,这是我省城市建设理念的重大创新,也是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点睛之笔。当前我省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新市民涌入城市,城市规模正在快速扩张,怎样理清和打牢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提升城市建设文化艺术品位,把全

省城市建设成为生态宜居、和谐美丽、文化厚重、开放鲜活、催人奋进,具有中国气派、中原特色和地方风格的现代人文城市,让广大城市成为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的主要载体,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⑨。

(二) 发展举措

河南作为全国传统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城镇化水平低质量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典型意义,必须努力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场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新城镇化发展体制和机制。由于投融资机制的不健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遭遇严重的资金制约问题。由于政府的财政资金不足,难以满足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资金需求,因此必须探索新的投融资模式,以缓解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资金约束问题^⑩。

中共河南省委九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的《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牵一发动全身”、关乎全局的战略性任务。省政府印发的《河南省推进“三个一批人”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推动一批具备条件、有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加快一批城中村和城镇棚户区改造,加快一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力争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 100 万人左右,带动随迁人口 100 万人左右,实现 500 万左右已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善城中村和产业集聚区内 600 万左右居民居住环境,到 2020 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0% 左右。这是省委省政府对新形势下全省新型城镇化做出的安排和部署,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提升全省城镇基础设施综合承载能力^⑪。

赵书茂研究认为一是要努力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实施“一基本,两牵动,三保障”,突出产业为基、就业为本,强化住房、学校牵动,完善社会保险、集体财产权益、公共服务保障;二是要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重点是继续坚持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加快中原城市群建设,提升省域、市域、县域中心城市和中心镇

四级节点,打造“米”字形发展轴带,构建“一区、三圈、八轴带”的空间格局;三是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走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势在必行;四是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按照产业、村庄、土地、公共服务和生态规划“五规合一”的要求,编制修订完善新农村规划,因地、因时、因势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宜居乡村;五是创新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破解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资金保障、生态环境等体制机制难题,形成有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②。

张占仓、于英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1996—2012年年均增长率为1.46%,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6%。在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的背景下,切实保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粮食安全是我国新时期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且存在竞争。通过实证分析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负向作用,但东部负向作用显著,中部负向作用不显著,西部城镇化却能显著提高粮食安水平。城镇化进程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合理利用农业生产要素,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科学推进城镇化,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农情、粮情、城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③。

五、重要专题研究

(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党中央在治国方略上开拓提升出的新版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就和新境

界,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背景,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这样的基本问题为主线,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直面现实、承前启后、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共同为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基本动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撑,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绘就全面小康社会的宏图,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见,“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因此,对“四个全面”必须全面把握、全面坚持,不可偏离和偏废。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四个全面”的关联性、耦合性,注重统筹谋划、协同配合,做到同频共振、形成合力。还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系,只有始终坚持这样的统筹协调推进,才能把“四个全面”贯彻得更加自觉、落实得更加到位^④。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站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强调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推进我国从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这是我们党立足当前、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⑤。

(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面对经

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创业创新成为驱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标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全省重点工作推进落实座谈会上强调要打好稳增长、保态势攻坚战,就要自觉改革、开拓创新。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河南考察时,充分肯定了河南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希望河南在“双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实际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3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我省也紧随其后,出台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

面对十分紧迫的稳增长、保态势的战略任务,我们如何“领对路,抓对点”呢?张占仓认为就是要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为全省创业创新提供全力支持,以创业创新为动力,支撑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第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做好创业创新各项工作,需要强大的价值引导力、精神推动力、体制机制支撑力和创业创新者的意志力。因此,在社会价值观取向上,需要打造讲科学、重创新、崇创业、守规律的创新文化氛围,引导适合创业创新的青年人树立敢于创业、善于创新、乐于创造、勤于探索的价值观。第二,提供基本的资本保障。为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创业创新领域,为创业创新者提供较低的进入门槛,我们还需要在建设众创空间、搭建创新平台、推动众筹普及,特别是搭建“互联网+”的新平台方面加大力度,建设更多的创业创新基地、创业扶持基金及创业创新指导机构,为创业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本、平台和政策支持。第三,开展基本的创新训练。创新拥有自己的规律,比如说,35岁以下的青年人创新的成功率比较高,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精力充沛,敢想敢干,容易取得突破;在时代大变革时期,创新的进展比较快,因为这个时候社会对创新的需求更加旺盛;在国家推动实施“互联网+”和大数据战略的背景下,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现代化信息基础设施,创新的成本相对会比较低,起步比较快,成效比较显著^{②9}。

谷建全认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创新

创业的市场空间巨大。下一步,我们要按照走在全国前列的标准和要求,进一步保护创客的创新创业热情,拓展和加快发展众创空间,推动开放式创新创业发展,强化对创新创业的支撑,塑造创新创业品牌,努力把河南建成全国领先的创新之省、创业之省^{③0}。

事实上,在当今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大批高层次人才,谁就拥有竞争的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浙江时强调,要立体化地培育人才。特别是对高端的尖子人才更要爱护。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当前,河南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要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必须拥有一支高层次人才队伍。而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要吸引和集聚大批高层次人才,就必须根据高层次人才发展的需要,着力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只有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不断改善创新创业投融资环境,积极搭建创新创业载体和平台,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知识产权保护,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才能筑巢引凤,更好地吸引人才、聚集人才、留住人才,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③1}。

(三)创新驱动战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开宗明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本经济指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五年经济必须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底线是GDP年均增速不能低于6.5%。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上述目标,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圆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创新”^{③2}。

2015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这是我们党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任务和要求,放眼世界、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实现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大举措,对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重视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用最大的努力投入财政经费支持研发、鼓励全社会兴办各种科研机构、持续培育各种创新平台、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等,使全省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经过全省科技界的长期努力,中原大地不仅拥有占全球市场份额最高的盾构机,在全球超高压领域领先的输变电装备等大型工业装备,也拥有在“互联网+”领域处在前沿地位的传感器和跨境电子贸易,在全球处在垄断地位的超硬材料等高精尖产品^⑧。

李庚香等人研究认为要打好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水一战”,充分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加大创新资金投入支持力度,发挥多种促进创新创业基金的作用,完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政策;充分利用国家、省、市各级财政资金及金融资本、民营资本等,拓宽重大科技专项融资渠道,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设立重大科技专项配套资金;顺应“互联网+”,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发展互联网经济,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鼓励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积极推动企业与国内外同行、知名院校深度合作,引进或共建创新平台;支持各地区大力培育和建设一批新型研发机构,使之成为科技型企业孵化的创新载体,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支持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完善金融、税收、价格、财政、知识产权等管理政策,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⑨。

(四)“互联网+”应用研究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

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这为我们在信息化社会,如何搭乘信息化的高速列车,发展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经济抢占未来发展竞争的制高点奠定了科技基础。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8月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主持召开省委领导议事会,听取省发改委关于《河南省“互联网+”行动实施方案》等起草情况汇报,专题讨论研究我省推进“互联网+”发展问题,使“互联网+”在我省的推进进一步有了系统的方案。

张占仓研究认为“互联网+”的本质是在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把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公共基础设施,为全社会提供越来越便利的智能化信息服务,从而使信息资源的采集、传输、储存、开发和利用成为新的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创造财富的源泉,促进智能化社会建设,逐步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系统。正像农业社会必须有土地资源、工业社会必须有“铁公机”(铁路、公路、飞机)一样,在信息社会必须有“互联网+”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互联网+”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条件下未来发展的一个支撑体系,中国经济将在“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引领下,以创新发展为驱动引擎,不断融入新思维、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快速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生态,乘“互联网+”的时代东风,创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辉煌^⑩。

从已经试验和大量发展实例看,“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有效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重塑经济形态、促进提质增效,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加速拓展,构筑新常态下的竞争新优势;有利于重构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大幅度降低全社会的创业门槛和创新成本,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速推进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动力转变;有利于通过播撒互联网本身具备的低成本“分享”功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人民群众广泛便捷获取公共资源提供有效途径,最大限度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郭庚茂书记明确指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关乎全局,影响深远。

张占仓研究指出充分考虑我们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的基本省情,衔接省委省政府提出并正在努力推进的把农业做优、工业做强、服务业做大的重大部署,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建议考虑以下重点:(1)“互联网+”创业创新。当前,无论是全国,还是全省,经济发展上的头等大事是妥善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而中央高度重视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在“互联网+”行动计划中首推的“互联网+”创业创新,是最为有效和主动的策略。(2)“互联网+”协同制造。我们是制造业大省,面对中国制造 2025 的战略部署,以数字化、智能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整合国内外最新技术,持续立足于把工业做优的既定策略,务实推动工业创新发展和升级增效,进一步巩固工业大省的地位,是全省发展大局的需要。(3)“互联网+”农业。我省是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对农业的发展,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而对农业发展效益偏低问题,“互联网+”农业提供的机遇迎面而来。(4)“互联网+”电子商务。我们要充分发挥综合性交通枢纽优势,做大做强电子商务,特别是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行业电子商务、线上线下互动体验式电子商务等方面力争取得新突破,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实现跨越式大发展,把郑州由过去传统的以商品零售与批发为主的商都建设成为新的以电子商务为标志的国际化商都。(5)“互联网+”高效物流。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传统公路物流港、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全国唯一的“米”字形高铁中心等,我们还拥有在国家快速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中货运量与货运价值均居全国领先地位的郑欧班列、已经开通业绩增长迅速的郑州—卢森堡双枢纽、双基地空中“丝绸之路”等综合性交通枢纽优势,我们应利用“互联网+”带来的高效物流的技术优势,全方位提升采购、仓储、运输、配送、管理等物流关键环节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水平,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能化国际物流中心。(6)“互联网+”党政管理。我们最为重要的党政管理,也需要纳入“互联网+”行动计划,并以党政管理实现“互联网+”为动力,引导全社会进入“互联网+”新时代^③。

(五)“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该战略宣示:中国愿与沿线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高层推进的国际战略、超级国家战略,是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开展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先进行列具有深远、重大的战略意义、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视野广远、气势恢宏,涉及的区域辽阔,涵盖的问题复杂,是一种持续前行的国际行动与全球合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会越走越宽阔。由于中国是倡导者、组织者以及起讫点国家,该战略的确立必然会对重构我国三十多年来形成的地域发展格局——“三带一区”格局,起到关键性、本质性的作用。

作为内陆地区的河南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已成为全省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2014 年 12 月 25 日,中共河南省委九届八次会议通过了《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该纲要在“战略举措”条目中的第一条即为“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从中可以看出,融入的基本路子是:通过建设国际陆港,发展陆海联运、推动陆海相通,实现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通过提升郑欧班列运营水平,实现向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贯通;通过提升郑州、洛阳等主要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最终形成东联西进、营建枢纽、融通全球的战略格局。

关键是“行动”。在“三带一区”格局中,河南省在中部地区崛起的框架下,以中原经济区、中原城市群为载体,着力寻求南北方向中部六省以及省域周边邻近六省的开放合作。新的地域发展格局给河南省提供了广阔得多的发展空间。据此,王发曾给“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原行动”开列如下“清单”:(1)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三

大国家战略;(2)以更开阔的视野,完善提升科学发展载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乡体系、现代创新体系与现代市场体系;(3)建设中原城市群核心增长板块,强化其开放合作的综合实力;(4)组建大郑州都市地区,营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5)在合适位置建设国际陆港,组织与沿海港口的铁海、路海、空海联运;(6)以郑欧班列为主干,打通东、西方向通道;(7)提升主要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推进省域的就近城镇化;(8)利用信息网络的区位优势,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③。

宋伟研究指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是跨区域经济合作,通道是基础,经济合作是核心。首先,“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是跨区域合作,必须有超越国家界限的政策通道、基础设施通道。一方面,加强政策沟通,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共识,化解政策障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加强交通、能源、信息等通道建设,实现区域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同样是“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的基本条件。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是加强经济合作,其核心内容是贸易、投融资、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只有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的基础上,发挥各自优势,在贸易、投资、产业等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才能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可持续的共同繁荣。

《愿景与行动》对河南的定位聚焦在打造郑州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发挥郑州“战略核心支点”作用,实施“郑州—中原城市群—河南省—中原经济区”逐级拓展策略,打造“一带一路”战略核心腹地。河南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要把握好“聚力郑州”、“拓展全省”、“全面合作”、“风险防范”四个关键点。聚力郑州主要是集聚政策、通道优势,提升综合能力,抢占战略制高点;拓展全省即以郑州为龙头,以中原城市群为依托,向全省辐射拓展,带动各省辖市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全面合作即放眼全省,发挥优势,注重互补,优势产业“走出去”与高端产业“引进来”并重;风险防范即要正视并有效防范各类国际风险^④。

张占仓研究认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融

入全球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通过建立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实现长远睦邻友好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是21世纪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奠基之作。面对国内外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高度重视的新形势,参考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依托地区的做法与经验,结合河南省发展的实际,建议下一步的行动策略为:第一,制定河南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规划。第二,进一步打造郑州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地理中心的战略枢纽优势。第三,用信息化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⑤。

综上所述,2015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保增长、稳态势的一年,GDP最终实现6.9%增长,国民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历史趋势。河南省经济学领域积极研究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与河南省主动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对策与方法,全面实施《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以滚石上山的精神和韧劲,打赢稳增长、保态势的攻坚战,实现GDP增长8.3%的优异成绩,使全省“十二五”规划完美收官。在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经济学界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行系统调研,全面研究与讨论全省“十三五”规划,取得重要共识,为制定河南省“十三五”规划出谋献策,成效显著。在经济新常态研究领域,河南省继续发挥最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论述的优势,进一步结合国家、地方与基层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积极可行的政策建议,为全省经济社会稳增长、保态势、增优势做出积极贡献。在新型城镇化研究领域,河南省发挥基层经验丰富、面临的实际问题复杂、参与研究学者众多的优势,继续发表了一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对当地有重要决策应用价值的新作,在建立健全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进展较大。在相关重要专题研究中,学界积极作为,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方面,明确提出必须全面把握、全面坚持,不可偏离和偏废的重要观点。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研究中,激励青

年人敢于创业、善于创新、乐于奉献等观点影响较大。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研究方面,更加重视人才作用的发挥,在理论界呼声比较高。在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中,河南省委省政府出手快捷,在3月份全国两会之后,随即与腾讯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对全省推进“互联网+”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全省经济理论工作者,结合实际认真研究“互联网+”在农业、制造业、第三产业和党政管理领域的具体应用,特别是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技术进步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信阳市在应用“互联网+”方面成效明显。在研究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河南发挥郑欧班列、郑州—卢森堡双基地货运航线、郑州跨境电子贸易等优势,初步形成陆上、空中和网上三条“丝绸之路”,发展优势凸显。2015年12月,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郑州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郑州开放发展的“国际范”,对河南省进一步发展将产生长远的战略性影响。

参考文献:

- ①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河南迈向现代化的总体设计和行动纲领[N]. 河南日报,2015-1-9(05).
- ②喻新安. 认清新变化 把握新特征 谋求新发展[N]. 河南日报,2015-9-9(13).
- ③张占仓. 我国“十三五”规划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预期[J]. 中州学刊,2015,11(11):5-10.
- ④喻新安 孙德中. “十三五”河南如何开拓发展新境界[N]. 河南日报,2015-12-7(05).
- ⑤李庚香. 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N]. 河南日报,2015-11-12(15).
- ⑥李庚香. 打造“混合动力”推动河南“十三五”加快发展[N]. 河南日报,2015-12-22(12).
- ⑦李庚香. 着力打造河南“十三五”发展的“混合动力”[J]. 中州学刊,2015,12(12):11-14.
- ⑧河南社科联课题组. 河南“十三五”经济增长混合动力与政策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2015,23(10):1-14.
- ⑨张占仓.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J]. 河南科学,2015,1(1):91-98.
- ⑩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经济新常态下的河南应对[N]. 河南日报,2015-1-23(06).
- ⑪谷建全. 判清形势 积极作为[N]. 河南日报,2015-9-11(09).
- ⑫张占仓. 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全省发展的切入点[N]. 河南日报,2015-2-16(09).
- ⑬李政新. 新背景下河南工业转型发展取向[N]. 河南日报,2015-6-19(11).
- ⑭宋伟. 应势而变 抢占先机[N]. 河南日报,2015-9-16(09).
- ⑮宋伟. 新常态下的需求、供给与改革[N]. 河南日报,2015-12-25(11).
- 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区域板块协调发展战略研究——以郑州市为例[J]. 中州学刊,2015,12(12):24-28.
- ⑰张占仓 蔡建霞 陈环宇.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进展与改革方向[M]. 中国城市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⑱赵书茂. 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J]. 河南科学,2015(6):1039-1043.
- ⑲刘道兴. 努力建设“人文城市”[N]. 河南日报,2015-2-6(09).
- ⑳何慧.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投融资模式研究[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2):52-53.
- ㉑赵书茂. 提升河南省城镇基础设施 综合承载能力的初步思考[J]. 中国工程咨询,2015(11):28-30.
- ㉒赵书茂.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探究[J]. 宏观经济管理,2015(11):82-88.
- ㉓张占仓 于英超. 城镇化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粮食科技与经济,2015,4(2):12-15.
- ㉔喻新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意义[N]. 河南日报,2015-3-4(09).
- ㉕李政新 白玉. 人才优先战略,河南如何推进[N]. 河南日报,2015-12-9(06).
- ㉖张占仓. 创业创新 支撑发展[N]. 河南日报,2015-9-16(09).
- ㉗谷建全. 推动“双创”走在全国前列[N]. 河

南日报,2015-10-9(04).

②⑧谷建全. 为人才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N]. 河南日报,2015-6-3(09).

②⑨耿明斋. “创新”——实现百年目标的基本推动力[N]. 河南日报,2015-11-12(15).

③⑩张占仓. 创新驱动 创造未来[N]. 河南日报,2015-11-16(01).

③⑪河南省社科联课题组. 以改革创新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N]. 河南日报,2015-10-30(05).

③⑫张占仓. 积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N]. 河南日报,2015-6-17(05).

③⑬张占仓. 推进“互联网+”构筑竞争新优势[N]. 河南日报,2015-8-14(10).

③⑭王发曾. “一带一路”战略重构地域发展格局[N]. 河南日报,2015-5-29(06).

③⑮宋伟 梁丹. 科学谋划、准确定位,全面融入“一带一路”[N]. 河南日报,2015-7-9(05).

③⑯张占仓.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需求与地方策略[J]. 区域经济评论,2015(6): 81-83.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

2015 年度河南省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

杨朝永

2015 年是 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的第三年,也是司法改革攻坚克难的一年。这一年中,理论界与实务界秉持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积极研究,勇于探索,在刑事诉讼法学若干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贡献了丰富的智识资源。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 CLSCI 共发表论文 1521 篇。^①其中,刑事诉讼学科 130 篇,约占论文发表总数的 8%,在 13 个法学学科中排名第 5。^②以上述 130 篇刑事诉讼法学论文进行分析后发现,2015 年该学科基本沿袭了以往的选题方向、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本文拟萃取上述 130 篇论文之精华,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刑事诉讼程序完善、证据裁判规则、审判制度改革等四个方面进行成果归类,对其中的学术洞见进行梳理与综述,以期深度挖掘该学科之年度学术贡献。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是对过往理论研究成果、实务改革探索的认同与提升,形成了顶层设计者、实务操作者、理论研究者的互动与合力。本部分研究主要包括“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内涵、“以审判为中心”与以庭审为中心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的相关诉讼制度改革等。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起诉活动面向审判、服从审判,同时发挥审判在认定事实

实、适用法律上的决定性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逻辑延伸,含法律适用的和程序监控的审判中心,要求确立法院司法解释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以及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落实“以审判为中心”,需采取必要工作措施,实现“三个面向”要求;逐步推进法律适用和程序监控的审判中心;推进司法体制和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以务实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向刑事司法的“线型结构”发起冲击。可操作的改革包括控诉、审判和诉讼程序“三个面向”,即控方证明责任的有效履行、法院审判的严格把关,以及庭审实质化。^③有学者认为,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比当前司法机关诠释“以审判为中心”内涵更为丰富,要使审判变成真的审判,需要起诉状一本主义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④也有学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对侦查中心主义的纠偏、对案卷中心主义的矫正、对诉讼阶段论的检讨,应推进庭审实质化,发挥审判的关键性作用。^⑤有学者主张,以审判为中心必然意味着以庭审为中心和以一审为中心,而以审判为中心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原则以及我国的案卷移送制度并不矛盾。^⑥

(二)“以审判为中心”与以庭审为中心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通过“庭审中心主义”得以实现,即通过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发挥庭审防止错判、保护无辜的功能。^⑦也有学者建议,有必要建构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实现直言词原则的庭审方式,合理定位庭前会议功能,调整定罪与量刑并重的庭审内

容,在诉讼制度层面实现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实质化。^⑧

(三)以“审判为中心”的相关诉讼制度改革

有学者认为,应从四个方面进行相关诉讼制度的改革:保证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完善辩护制度、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完善证人出庭制度、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及保证侦查、审查起诉质量,为公正审判奠定坚实基础。^⑨有学者主张,首先应当在宏观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关系上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在审判阶段做到“以庭审为中心”,保护被告方的对质权,法院不能脱离庭审来进行事实认定。其次,应当在打造坚实的第一审的基础上,确立第一审在事实认定方面的权威地位,同时合理界定和调整第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确保第一审在整个刑事程序体系中居于“重心”地位。^⑩也有学者认为,应辩证看待审判中心主义的理性回归,对侦查中心主义适当抑制,并以此为视角探索两者有效衔接、良性互动的制度构建,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完善职务犯罪证明标准,合理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配套制度,建立新型侦诉、侦辩关系,推动职务犯罪侦查转型发展。^⑪还有学者提出,应在维持慎诉制度基础上,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⑫

二、刑事诉讼程序完善

本部分的研究主要包括庭前程序、庭审程序、冤错案件预防纠正机制、指导性案例、刑事被告人人权和律师辩护权保障、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和境外追赃机制、刑事和解、刑事强制措施等。

(一)审前程序研究

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庭前会议的整体适用率较低,召开庭前会议的表面理由与法律规定趋于一致,而庭前会议的议题溢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庭前会议立法所预设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未来应该在充分考量诉讼主体实际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按照对抗式的诉讼理念对庭前会议的相关程序设置进行必要的改革。^⑬有学者对美国刑事诉讼案件过滤机制的类型、成因和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有利于全面与客观地认识我国刑事诉讼案件

过滤机制。^⑭

(二)庭审程序研究

有学者主张,实现庭审实质化,需适度阻断侦审联结,直接、有效地审查证据,完善庭审调查规则,加强释明权的运用,改革裁判方式,推动二审审理的精细化。为适应庭审实质化要求,应改善庭审准备、加强辩护权保障、推动案件繁简分流以及建立、完善司法责任制。^⑮有学者认为,应该以兼顾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效率三种价值的实现为指导思想,重构基于刑事程序违法的发回重审制度。^⑯对话量刑在减少立法严罚化的负面效应、改变死刑舆论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⑰有学者横向比较美国的辩诉交易和德国的简易程序等快速审理程序在适用案件的范围、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和审理方式,深入剖析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规范,以期为未来速裁程序的科学立法提供国际经验。^⑱

(三)冤错案件纠正机制和指导性案例研究

关于冤错案件纠正机制。有学者指出,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现状,克服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应着眼于程序裁量中的即时无罪化策略、无罪化机制的制度完善、司法体制等程序外阻力的消解策略。^⑲有学者认为,应赋予那些被生效裁判确定有罪者一些必要的权利,明确刑事误判的认定标准,改变“以自我纠错为中心”的刑事再审体制。^⑳有学者提出,为防治法官错判,可采用新型的司法责任制取代原有的错案责任追究制。通过改革法官遴选制度,去司法的行政化,结合高校法律教学改革,以提升法官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增强法官独立审判和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㉑也有学者建议,完善我国的刑事错案救济机制除了更新司法理念和改革完善相关的程序制度外,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在错案发现环节上,建立独立的机构并重视科技手段的运用和民间力量的参与。^㉒

关于指导性案例制度。有学者认为,中国现行的指导性案例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判例制度的雏形,需要进一步完善。^㉓当前司法改革提出了完善案例指导的要求,也为案例指导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宏观条件,需要有的放矢地解决实践中暴

露的问题。^②有学者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同案”并不存在,司法实践当中普遍存在的乃是“相似案件”(实质上的“异案”),真正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其实并非“同案不同判”,而是“类似案件不类似处理”。^③有学者认为,美国高层级法院的先例在不同低层级法院的效力并不一样,联邦法院的先例在州法院及州法院的先例在联邦法院的被遵循情况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这些运行实践的复杂性为思考中国裁判制度改革提供了实证的和技术的视角与借鉴。^④有学者指出,创制型案例的裁判面临“无法可司”的尴尬和规则缺失的困境,创制型案例裁判文书中呈现出“无法可司”与“合法性修辞”的二元裁判结构,“合法性修辞”是解决“无法可司”的实践经验与方法。^⑤

(四)关于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和律师辩护权

关于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人权持有的主体仅限于刑事被追诉人,不存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人权进行权衡的问题,人权也不受所谓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多数人利益的权衡。^⑥有学者指出,参鉴沃伦法院的成败得失,在合理确立法官的功能定位时追求实现个案正义,又能够在寻找改革的契机缓和个人权利与公共安全的冲突,以及为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创造条件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⑦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在恪守严格解释的前提下,反对不利被告的解释,坚持有利被告的解释。^⑧有学者指出,念斌被再度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缺乏达到法律要求的新证据。应当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立案及确定犯罪嫌疑人程序,完善既判力法则,有条件地确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还应当完善司法监督和司法救济制度。^⑨

关于律师辩护权。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律师带有“表演”性质的辩护活动并非以说服裁判者接受其辩护意见为目标。解决律师辩护“表演化”的关键是继续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刑事审判制度乃至司法制度,还应针对辩护律师构建起特殊的保护机制和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质量控制标准与机制。^⑩有学者通过比较法的视野,认为律师庭外言论可能引起“律师-客户特权”,“言论自由”和“公正审判”的关系,律师违约和侵权责任,以及诉讼效率

等问题,其根源可能是中国刑事司法的诉讼规则、司法权威、言论规制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本身存在问题。^⑪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庭严重地滥用了驱逐辩护律师的权力,应当完善法庭驱逐辩护律师的程序机制,并妥善解决辩护律师被驱逐后引发的被告人辩护权之保障问题。^⑫有学者建议,完善死刑复核程序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确立指定辩护、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享有的具体权利和强化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监督中对律师发表辩护意见的程序保障,切实加强该程序中辩护权的保障。^⑬

(五)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和境外追赃机制研究

有学者认为,加强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风险控制,首先必须实现立法指导思想从“重人轻物”向“人物并重”转轨的革命性变革,同时要注意遵循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加强权利保障的力度,维持诉讼架构的平衡;建立货币化标准,严格限定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维护生效没收裁定的权威性与安定性,废除直接撤销制度;加强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检察监督。^⑭有学者主张,特别没收程序应充分重视利害关系人在没收特别程序中的作用,合理确定利害关系人资格,保障利害关系人程序上与实体上的参与权。在证明问题方面,明确利害关系人不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对象上应区分不同情况处理,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⑮有学者指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应限于财产权益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联邦无辜所有者抗辩事由,将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以取得财产权益的时间为标准分为事前取得抗辩事由与善意取得抗辩事由两种,并明确规定这两种抗辩事由的成立条件。^⑯

关于境外追逃追赃工作机制。有学者建议,应提高在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失踪、资产流转踪迹已被掩盖等情况下的调查和取证能力,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和细化逃往境外人员自首的特殊认定标准,建立统一和科学的犯罪资产没收制度,用好反洗钱情报和调查机制,从源头上打击和预防向境外非法转移资产活动。^⑰

(六) 刑事和解研究

有学者认为,刑、民事责任惩罚性与补偿性的部分融合等特点决定了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通常具有民事责任对刑事责任形成影响带有普遍性,刑、民事责任转化带有单向性,以及对轻罪可以影响定性、对重罪只能影响量刑的特点。^④有学者指出,法国公诉替代程序包括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赔偿受害人损失等一系列替代措施。其演变蕴涵了近年来欧洲“自然演进型”的司法改革观,是对传统“理性建构”的有益补充,值得关注。^⑤有学者考察1970年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辩诉交易中被告人的有效辩护权的判断标准演进过程,指出联邦、各州的刑事司法实践对放弃有效辩护权以及放弃主张无效辩护的权利是否适当尚未达成一致。^⑥

(七) 刑事强制措施研究

关于逮捕审查程序。有学者主张,应对现行的逮捕审查程序进行全面改革,逮捕审查应从采取指控式审核转向综合式评估,从行政化的准司法程序逐渐迈向控辩式的司法程序;与此同时,为了兼顾保障诉讼的价值目标,也有必要对轻罪案件羁押控制的策略做出重大调整,以全程性速审程序的构建取代行政考核管理。^⑦有学者认为,应构建“诉讼化”的侦查构造,维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以实现逮捕目的的回归;在逮捕目的指引下,明确审查逮捕权的性质,形成司法化的逮捕审查机制;在理清刑事政策作用边界的前提下,以逮捕目的为标准重置逮捕要件。^⑧

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有学者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开展实证研究,指出该制度既有对权利保障予以促进的良性效果,但同时也存在诸如审查范围过窄、裁量空间有限以及审查方式单一等不足,以及制约该制度的深层次问题。^⑨有学者指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并未在根本上改变以往缺乏司法审查的制度安排和“一押到底”的司法实践。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确立过程中,改革举措的落实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司法权力博弈和司法生态。^⑩也有学者认为,调整工作绩效考核标准与强化执法风险防范、合理配置审查主体

权力、细化和丰富审查程序规则以及多举措提升检察建议的可接受性,是完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有效路径。^⑪有学者认为,未成年人案件羁押率并不是越低越好,应针对未成年人不同性质的行为,明确国家责任,改变过窄的司法保护模式,尤其对于社会危害性很大的校园欺凌问题,应采取更有进取心的司法干预措施。^⑫

关于指定监视居住制度。有学者提出,指定监视居住制度的改革完善,应以彻底消除羁押化倾向为目标,明确监视方式强制性的权力限度,对权力主体和执行方式进行调整,并容忍较低比例的危险性结果的发生。^⑬

三、刑事证据制度

本部分研究主要包括证据学基本理论、证据裁判规则、调查取证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

(一) 证据学基本理论研究

关于证据学的内涵及定位。有学者认为,证据学应被称为“实质逻辑”,“实质逻辑”就是证据学的学科定位。^⑭也有学者认为,应在走向独立的“证据法学”与深入规律的“证据学”之基础上,形成一种“事实认定一体化”研究范式,从而更加自信且坚定地迈向整合的“证据科学”。^⑮有学者对中国时下的证据法学概念、体系、方法进行了反思,分析了英美证据法理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⑯有学者借助价值结构研究刑事证据法的价值问题,认为刑事证据法的价值结构是由客体价值、主体价值和价值评判标准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以兼顾原则和权衡原则予以价值整合。^⑰

关于证据制度体系。有学者指出,实现证据制度体系的优化应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遵循证据适用规律,在立法论层面上优化证据规则设置,消除妨碍证据制度优化适用的不合理因素,从而实现证据制度体系的优化运作,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⑱有学者认为,在现行诉讼制度下,证据能力规则难以将应排除的证据彻底阻隔在事实认定过程之外,只能通过多种措施并举,以促进其实效。^⑲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有学者提出,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乱象,一是通过法律规范明确赋予被告人与不利于己的证人当庭对质

的权利和申请法庭强制传唤有利于己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二是通过司法解释,免除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提供不利于被告人证言的义务,但在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自愿要求提供证据时,应当传唤其出庭作证;三是在证据法中确立传闻法则,以排除证人非在当下法庭上所作的传闻陈述。^⑤有学者对《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解释为亲属证人“免于强制作证的权利”,如其已在审前向控方作证,且符合出庭作证条件,经法院通知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法院非但不能强制其出庭作证,还应将其庭前书面证言予以排除。^⑥有学者认为,借鉴域外立法普遍采取的亲属拒证权“证言豁免”模式,应放弃“出庭豁免”模式,从体系定位、主体范围、实质内容、程序保障等方面重构亲属拒证权。^⑦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模式是一种职权启动的模式,从长远来看应逐步走向诉权驱动,短期内应当构建最低限度的诉权行使和诉权表达机制。^⑧

关于电子数据。有学者认为,收集电子数据实际上是实质意义上的搜查,有必要从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的对象、范围、程序的启动、搜查的程序和方式、违法搜查扣押的救济等方面构建我国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程序,规范电子数据搜查扣押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⑨

关于专家辅助人。有学者认为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证据属性,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审查判断应遵循三大特殊规则,专家辅助人与律师在庭审质证环节须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分工。^⑩

关于侦查实验结论。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将侦查实验改造成为一种控、辩、审三方均可实施的司法证明手段,以此为基础,完善实验规则,并建立证明规则、见证规则以及专家辅助人出庭规则等相关的制度规范。^⑪

关于口供。有学者针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依赖现象,认为刑事裁判合法性重塑与口供治理的协同推进,将会改变既有治理主体与被治理者的关联方式,对现行封闭式刑事司法治理模式产生冲击,进而促动中国刑事司法治理发生转型。^⑫

关于过程证据。有学者认为,过程证据作为一

种记录特定诉讼行为过程事实的证据,需要确定相应的审查判断规则,适度引入实证审查程序,完善相应的证据能力规则,确立过程证据与结果证据的相互印证规则。^⑬

关于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有学者指出,作为英美法系主要国家普遍确立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有必要引入我国,在证据种类上将其归入被害人陈述,并通过多样化的被害人影响陈述方式和判后答疑,提高被害人提出影响陈述的积极性。^⑭

(二)证据裁判规则研究

关于证明标准。有学者认为,我国“排除合理怀疑”的主体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在审判阶段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可能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予以积极探索解决。^⑮有学者提出,我国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应努力实现认定案件事实符合客观真相的要求,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确定性的程度。为保障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效运用,还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⑯有学者从证明标准的适用程序范围和待证要件范围以及“剩余怀疑”的风险分配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如何完善我国证明标准的配套制度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⑰

关于证明模式。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直接证据为核心的验证模式和完全使用间接证据的体系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与不足。^⑱有学者主张,应以“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探析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的关系,推动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理论体系的协同发展,促进量刑证明的规范化。^⑲

关于证据不足的裁判规则。有学者主张,以事实基础和表现形式为标准,证据不足无罪判决可分为完全意义的、形式意义的和实质意义的三种类型,并提出了相应的救济机制。^⑳有学者认为,“从无罪”并非疑罪从无适用的唯一后果,“从轻罪”、“从轻刑”亦符合该原则的基本要义。疑罪从无既非当下防范冤假错案的唯一出路,亦非祛除刑事司法顽症的万能良药。^㉑

关于推定。有学者指出,推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其是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刑事法律体

系是否严密,以及国家法律是否具备解决特定犯罪案件司法证明困难的能力。^③

其他问题。有学者主张,对待转基因食品应该采取“无罪推定”的态度,如此才有可能对转基因技术有进一步了解,也才有可能进一步接近事实的真相。^④有学者认为,近年来有关“印证”的研究仍需寻找替代性的模式理论来说明我国刑事证明方法所面临的转型问题。^⑤有学者指出,我国立法、司法对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采取的真实性审查方式忽略了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相关立法应予完善。^⑥

(三)调查取证程序研究

关于辩护律师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问题。有学者认为,实务界关于不允许人证信息告知、核实的主张,违背立法原意。但律师不得通过核实证据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事实改变供述或串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骚扰、威胁或加害被害人、证人,辩护律师不得告诉相关被害人、证人的身份、住址等个人信息。^⑦

关于人身搜查。有学者通过分析美国联邦法院判决的裸身搜查典型判例,揭示其控制人身搜查的程序性原则与司法裁量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对策。^⑧

关于讯问。有学者认为,为了有效抑制非法讯问,需要从扩大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适用范围,实现讯问主体与讯问场所管理主体的分离等几个方面完善监控式讯问机制。^⑨也有学者指出,因亲缘于权力主导模式,加之我国的侦查讯问环境,我国讯问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难以发挥,所以有必要向权利保障模式转型,实现其功能的多元化。^⑩

关于监听。有学者主张,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应沿着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构建渐次推进。首先,发展宪法上隐私权对监听侦查的防御功能;其次,通过不同层级法院许可令的构建,创设程序性正当程序的控权机制;再次,通过廓清犯罪调查的一般需要与超越法律执行一般需要的特别需要之间的界线,建立隐私期待的适当性和“特别需要”原则这两个实体性正当程序审查标准。^⑪

关于测谎。测谎权力来源的理据证成测谎正当性的根基,而且测谎的正当性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被测人“同意测谎”标志着测谎的“合道德性”,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鉴定的法律规范是测谎正当性的法律体现。^⑫

关于诱惑侦查。有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不得诱使他人犯罪”规定应定位为效力规定,侦查人员如果违反该规定实施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应产生相应的程序法律后果。^⑬也有学者指出,我国诱惑侦查应采用最为严格的分离式混合控权模式,即无论是违反诱发他人产生犯意的主观标准,还是僭越客观标准,即侦查人员使用了过度且令普通人难以抵御的诱惑手法,均属违法。^⑭

关于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我国现有的侦查权程序性控制表现为以内部自律的科层制控制为主、外部他律的分权式控制为辅的基本制度格局。我国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远景应该是建立合乎我国国情的司法审查模式,使侦查权的控制走向彻底的法治化和专业化。制度近景则是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后盾,通过与检察监督的衔接,建立审前程序中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审判程序中以法院为中心的三阶层控制模式;并通过与案例指导、国家赔偿、司法建议等制度的配套运行,形成制度合力,倒逼侦查方式和技术的改善,进而促进制度远景目标的实现。^⑮也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就证据取得禁止与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国虽采取的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立场,但显然与德国学说和实务见解相背离。^⑯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披着个人权利保障外衣却包裹着国家权力本位的规则,长远来看需要社会性结构因素的调整。^⑰有学者主张,非法证据排除的实体、程序问题应一并审理,裁决时机颠倒实体结论与排除结论的先后顺序等问题需要从理念、规范和制度运行规则上予以解决。^⑱有学者建议,未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应摆脱证明力的羁绊,以证据能力为标准,明晰非法证据的范围,从主客观两方面构建

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以对证据能力的规制为目标,构建独立、前置的排除程序;以证据能力为核心,推进非法证据证明的实质化。^⑧有学者指出,通过司法解释构建覆盖面广、刚性的排除法则,并通过指导性案例渐进地发展精致而实用的例外法则。^⑨也有学者认为,对重复供述有必要提倡一种以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是否继续产生影响的判断为核心的继续效力排除模式。^⑩有学者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运作进行专题考察,有益启示主要包括:重视宪法规范的引领作用;实现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明确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的界限;充分认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构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健全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机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看待非法证据排除率及对诉讼结果的影响。^⑪也有学者指出,近年来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在理论基础方面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受到限缩。^⑫还有学者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哈德逊诉密西根州”案后实质性地限制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转向,初步建立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向,转变的方向与美国相反,但殊途同归。^⑬

四、审判制度改革

本部分研究主要包括刑事司法权配置运行机制、司法责任制、主审法官制度、司法机关人财物统管、司法公开等。

(一) 刑事司法权配置运行机制研究

关于刑事司法权配置。有学者对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提出建议,应当正确处理党委、纪委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理顺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关系;推进司法体制去地方化影响的改革;探索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法官、检察官分类管理;统一刑罚执行体制。^⑭有学者认为,需要在厘清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分离的理论、制度、实践、政策等依据的前提下,探索实行“两权适度分离”的制度设计。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由司法机关“内部混同管理”模式向“适度分离、自治管理”模式,再向国家司法委员会

“统分结合现代管理”模式跨越。^⑮

关于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设立的巡回法庭在行政上是最高法院的组成部分,在审判管辖权上相当于高级法院。^⑯有学者建议,应借鉴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的巡回法庭制度,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组织体制,根据设立巡回法庭的目的设计具体的制度,重视巡回法庭配套措施的完善。^⑰有学者主张,在选择巡回法庭的设立地域时,应考虑司法改革的长远进程以及交通等因素,在巡回法庭的设立数量上则应考虑区域面积、案件数量、人员编制等因素。巡回法庭应灵活通过上提管辖权、指定管辖等方式,确保对跨行政区域重大案件的二审或再审管辖权。在案件类型方面,巡回法庭可以审理的案件不必限于跨行政区域的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应赋予巡回法庭较大程度的独立审判权,但同时也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制约。^⑱

其他问题。有学者指出,新《刑事诉讼法》构建审前阶段以检察机关为中心的程序性救济模式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应当契合人权保障的时代要求,从监督型救济模式向司法型救济模式转变,使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相得益彰而不互相侵扰。^⑲有学者主张,将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导入到刑事诉讼,在协同的路径选择上,控审之间和审辩之间应采用不同模式,控审协同受审辩协同的制约,审辩协同处于中心地位。^⑳有学者认为,中国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改革应立足域外经验,尽可能在“司法官独立”与“质量评估”之间作策略性调和,在既定政策框架下确立更符合司法规律的改革路径。^㉑有学者建议,应激活我国法律程序内的进程调控功能,将诉讼及时性要素纳入司法审查,在法律程序内对背离及时性的诉讼进程状态予以调控。^㉒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制定公共政策,不仅违背了司法权的行使方式,而且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相悖,应该放弃现行的司法解释方式,在改革现行两审终审制的情况下确保其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㉓

(二) 司法责任制研究

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官责任制度的结果责任模

式、程序责任模式、职业伦理责任模式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产物,都有各自得以存在的制度空间,也都有相应的局限性和实施障碍。^[95]有学者主张,不应以主任检察官责任制代替检察官责任制,主任检察官与业务部门负责人的设置与职能区分应尽可能合一,检察官责任制应与检察长负责制相协调实现合理授权,检察权运行机制的设置和管理应当细化与科学化。^[96]有学者建议,未来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需要在转变政策实施型司法模式的基础上,疏离政策实施型司法与行政审批制之间的紧密关系,构建起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独立相协调的办案机制。^[97]有学者指出,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在明确了责任主体、适用时间、监督主体、责任形式等要件后,最终达成仍需明细科学的错案标准和健康的制度环境的配合。^[98]

(三)主审法官制度研究

关于主审法官制度。有学者认为,必须对审判权主体、审判权运行机制和审判权配套机制进行重新定位与设计。^[99]有学者指出,主审法官遴选制度改革势必要根据其一般规律、法官职能以及法官员额制等相关的司法改革措施,在面临的困境中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100]

(四)司法机关人、财、物统管研究

关于法官选任机制。有学者认为,“有限集中,分层授权”是既可解决上述问题,又能兼顾地方法院法官任用机制改革基本出发点的有效改革方略。^[101]也有学者指出,我国初任法官选任机制逐渐呈现出“相马”和“赛马”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当前司法改革方案中试图建构的省级统管的一元化选任模式可能在推行中遭遇严重障碍。^[102]关于省统管地方法院财政改革。有学者主张,应以实现法院财政的充分化、非外部化为基本目标,关照和解决中国基层法院的财政收入在经费来源、收入性质、财政保障水平、保障体制等方面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弊端。^[103]

(五)司法公开研究

有学者主张,应借鉴英美法系国家以模式转型为目标的“接触型”司法公开改革,不断扩大法院系统司法公开的范围、构建双层民意反馈机制、加

强资源整合和部门联动、提升司法危机公关能力和出台全国法院新媒体适用规则,以建立司法与公众的互信,实现我国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宏观司法战略。^[104]有学者指出了目前中国法院的庭审直播存在的问题,就健全庭审直播的体系,完善庭审直播的规则,提升庭审直播的水准,加强庭审直播的实效提出了完善建议。^[105]有学者认为,我国新闻报道中对涉罪人员姓名“以公开为原则”的现行做法值得肯定;禁止对未成年涉罪人员实名报道但不能过于绝对;实名报道涉罪公众人物的做法应当坚持;应当谨慎确立不当公开涉罪人员姓名的行为责任。^[106]

五、其他问题

本部分研究主要包括检查制度、职务犯罪、刑诉法再修改、刑事诉讼与公民、家庭、社会的关系、刑罚执行、刑事诉讼主管与管辖等。

(一)检察制度研究

有学者指出,在“确保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在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和办案方式盲目引入法院的合议制工作机制,造成“检察官法官化”;二是排斥、否定检察官独任制,造成“检察官手足化”;三是固定检察官的办案类型,导致“检察官专门化”。^[107]有学者就完善刑事司法检察权提出建议,一是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修法”方式,强化侦查起诉阶段的律师辩护权,以“诉讼构造”贯穿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二是以刑事诉讼法理的“释法”方式,参照大陆法系检察权理念,解释、践行我国刑事司法的检察权职能。^[108]有学者认为,新刑诉法对部分检察权的行使进行了诉讼化改造,在法律框架内构建刑事检察听证程序是该制度发展和完善的根本路径。^[109]有学者认为,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推行,需要实现检察管理的扁平化、集约化和专业化,需要从法律上形成主任检察官资格准入、管理监督、考核评价及执业保障机制。^[110]还有学者指出,应通过对检察管理相关内容的革新,为检察权的公正行使提供高素能的主体、高效的决策机制、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科学的物资保障机制。^[111]

(二)职务犯罪研究

有学者提出,应分析当下中国的腐败犯罪的生

成原因,为制定反腐败对策提供科学的依据。^⑫也有学者主张,中国需要在查处腐败中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而保持查处腐败的常态并取得反腐败的长效。^⑬

(三) 刑诉法再修改研究

有学者认为,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应着眼于打造充分体现宪法精神与人权保障优先的刑事诉讼制度,真正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推行普遍有效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契合中国国情的陪审制度,并着力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难的问题。^⑭

(四) 刑事诉讼与公民、家庭、社会的关系研究

有学者认为,推进公民参与司法应当注重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领域全面推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⑮有学者指出,未来刑事诉讼将对家庭更为宽容,并在相关制度设置上更具实质性和合理性。^⑯有学者以影响性诉讼案件为标本,通过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度、美誉度以及互动性的量化评估,比较公众与基层司法官的认识差异,反映出理性选择的背后是违反司法规律导致的司法公信力不彰。当前的司法改革,需要努力弥合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坚守法治理念和尊重司法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形塑公众与刑事司法的良性关系。^⑰

(五) 刑罚执行研究

有学者主张,我国应设立刑罚执行法官,使其负责自由刑变更执行措施的审理及撤销,并对刑罚执行进行监督。^⑱有学者建议借鉴美洲一些国家已经建立并实施的羁押巡视制度,引进中立的“社会公众”作为外部监督主体,从而更有效实现监督目的,促进被羁押人权利保障。^⑲

(六) 刑事诉讼的主管及管辖研究

有学者认为,环境领域的执法向刑事司法的移送以及刑事立案环节都存在严重的“断裂”,应构建行政监督、检查监督、民主监督有机结合的监督机制。^⑳有学者指出,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管辖权条款规定过于保守,不利于我国应对复杂的国际挑战和保护自身利益,有必要对其予以重构。

注释

①CLSCI为“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China Leg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文中数据参见中国法学创新网, <http://www.lawinnovation.com/>, 2016年8月3日访问,下同。

②其他部门法学发表篇数大致为:民法267,刑法237,法理198,经济法158,宪法120,行政法学101,商法80,民事诉讼71,法制史62,国际公法44,国际经济法34,国际私法19。

③参见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④参见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⑤参见叶青:《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若干思考》,载《法学》2015年第7期。

⑥参见张吉喜:《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⑦参见闵春雷:《以审判为中心:内涵解读及实现路径》,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⑧参见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⑨参见陈光中、步洋洋:《审判中心与相关诉讼制度改革初探》,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

⑩参见魏晓娜:《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⑪参见龚举文:《审判中心主义与职务犯罪侦查的理论辨析及其制度构建》,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

⑫参见谢小剑:《论我国的慎诉制度及其完善——兼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

⑬参见左卫民:《未完成的变革——刑事庭前会议实证研究》,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⑭参见王禄生:《美国刑事诉讼案件过滤机制及其启示——以地方重罪案件为实证样本》,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

⑮参见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⑯参见袁锦凡:《我国刑事程序违法发回重审

制度研究——反思与重建》，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

①⑦参见周振杰：《日本裁判员审判中的对话量刑及其参考价值》，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

①⑧参见李木森：《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研究——与美、德刑事案件快速审理程序之比较》，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

①⑨参见徐阳：《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及应对》，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②⑩参见李奋飞：《刑事误判纠正依赖“偶然”之分析》，载《法学家》2015年第4期。

②⑪参见金泽刚：《法官错判的原因与防治——基于19起刑事错案的样本分析》，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2期。

②⑫参见詹建红：《刑事错案救济机制的西方经验及其借鉴——以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为参照》，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2期。

②⑬参见何家弘：《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1期。

②⑭参见秦宗文、严正华：《刑事案例指导运行实证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4期。

②⑮参见岳彩领：《同案同判：一个虚构的法治神话》，载《法学》2015年第11期。

②⑯参见林喜芬：《美国法院遵循先例的运行机制及启示》，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②⑰参见岳彩领：《从“无法可司”到“合法性修辞”——论创制型案例裁判的经验与方法》，载《法学》2015年第11期。

②⑱参见易延友：《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4期。

②⑲参见刘磊：《美国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的困境与反思》，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

③⑰参见邢馨宇：《有利被告的当下中国程序话语——兼及《刑诉》相关规定之评价》，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

③⑱参见龙宗智：《念斌被再度确定为犯罪嫌疑人问题法理研判》，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1期。

③⑲参见李奋飞：《论“表演性辩护”——中国律师法庭辩护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

③⑳参见杨先德：《刑事司法中律师庭外言论法律问题探讨》，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

③㉑参见陈学权：《法庭驱逐辩护律师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

③㉒参见陈学权：《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2期。

③㉓参见邓立军：《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潜在风险与控制》，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

③㉔参见陈卫东：《论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

③㉕参见吴光升：《论未定罪没收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8期。

③㉖参见黄风：《建立境外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法学》2015年第3期。

③㉗参见李会彬：《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新探——以刑、民事责任转化原理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③㉘参见施鹏鹏：《法国公诉替代程序研究——兼评“自然演进”型的司法改革观》，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5期。

③㉙参见祁建建：《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有效辩护权》，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

③㉚参见马静华：《逮捕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刑诉》的实施为背景》，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

③㉛参见董林涛：《我国逮捕制度之目的回归与制度重构》，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6期。

③㉜参见胡波：《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施情况实证研究——以某省会市十二个基层检察院为对象的考察和分析》，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3期。

③㉝参见林喜芬：《分段审查抑或归口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改革逻辑》，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③㉞参见张云鹏：《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路径》，载《法学》2015年第1期。

③㉟参见张栋：《未成年人案件羁押率高低反

思》,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

④⑨参见马静华:《公安机关适用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的实证分析——以一个省会城市为例》,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2期。

⑤⑩参见裴苍龄:《论证据学的学科定位》,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

⑤⑪参见郑飞:《证据科学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走向》,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⑤⑫参见施鹏鹏:《跨时代的智者——密特麦尔证据法学思想述评》,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5期。

⑤⑬参见喻名峰:《刑事证据法的价值结构》,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⑤⑭参见张栋:《中国刑事证据制度体系的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⑤⑮参见纵博:《我国刑事证据能力之理论归纳及思考》,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

⑤⑯参见易延友:《公众有权获得任何人的证言》,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

⑤⑰参见李奋飞:《“作证却免于强制出庭”抑或“免于强制作证”——《刑诉》第188条第1款的法教义学分析》,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⑤⑱参见谢登科:《困境与突破:我国亲属拒证权制度反思》,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

⑤⑲参见胡星昊:《从职权启动到诉权驱动——论证人出庭模式之转变》,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4期。

⑥⑰参见骆绪刚:《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程序的立法构建》,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6期。

⑥⑱参见李学军:《专家辅助人制度研析》,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⑥⑲参见韩旭:《论侦查实验笔录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⑥⑳参见李训虎:《口供治理与中国刑事司法裁判》,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⑥㉑参见陈瑞华:《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⑥㉒参见张吉喜:《论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

⑥⑳参见杨宇冠:《“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中国适用问题探讨》,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1期。

⑥㉑参见肖沛权:《排除合理怀疑及其中国适用》,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6期。

⑥㉒参见李昌盛:《排除合理怀疑等于内心确信吗?》,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4期。

⑥㉓参见褚福民:《刑事证明的两种模式》,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

⑥㉔参见吕泽华:《定罪与量刑证明一分为二论》,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

⑥㉕参见姚显森:《论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的特殊救济》,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⑥㉖参见王星译:《反思疑罪从无及其适用》,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⑥㉗参见陈瑞华:《论刑事法中的推定》,载《法学》2015年第5期。

⑥㉘参见胡家祥:《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思辨——“无罪推定”还是“有罪推定”》,载《法学》2015年第12期。

⑥㉙参见周洪波:《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⑥㉚参见冯俊伟:《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⑥㉛参见龙宗智:《辩护律师有权向当事人核实人证》,载《法学》2015年第5期。

⑥㉜参见吴玲、张德森:《美国警察无证裸身搜查的法律控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

⑥㉝参见马静华:《非法讯问与监控式讯问机制——以公安机关侦查讯问为中心的考察》,载《法学家》2015年第6期。

⑥㉞参见董坤:《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发展路径》,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⑥㉟参见曾贇:《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⑥㊱参见邵劭:《论测谎的正当性》,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5期。

⑥㊲参见艾明:《训示规定抑或效力规定:“不得

诱使他人犯罪”的规范性质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5期。

⑧4参见程雷：《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⑧5参见詹建红、张威：《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⑧6参见艾明：《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禁止——以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5期。

⑧7参见左卫民：《“热”与“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

⑧8参见王树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适用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

⑧9参见杨波：《由证明力到证据能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困境与出路》，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5期。

⑨0参见马明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构困境——基于内部视角的反思》，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

⑨1参见吉冠浩：《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以重复供述为切入的分析》，载《法学家》2015年第2期。

⑨2参见熊秋红：《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

⑨3参见吴宏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当代命运》，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

⑨4参见王景龙：《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转向——以“哈德逊诉密西根州”案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

⑨5参见陈光中、魏晓娜：《论我国司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⑨6参见徐汉明：《论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分离》，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⑨7参见顾永忠：《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之我见》，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2期。

⑨8参见贾宇：《陕甘宁边区巡回法庭制度的运行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

⑨9参见纵博：《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背景、功能及设计构想》，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2期。

⑩0参见詹建红：《程序性救济的制度模式及改造》，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参见亢晶晶：《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兼谈我国控辩审关系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⑩1参见施鹏鹏、王星辰：《论司法质量的优化与评估——兼论中国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改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1期。

⑩2参见郭晶：《刑事司法进程的四种调控模式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⑩3参见丰旭泽：《论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模式的转型》，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

⑩4参见陈瑞华：《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⑩5参见龙宗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关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⑩6参见杜磊：《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探索》，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⑩7参见宗会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的价值证成与规范运行》，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3期。

⑩8参见叶青：《主审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羁绊与出路》，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

⑩9参见姚莉：《比较与启示：中国法官遴选制度的改革与优化》，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

⑩10参见左卫民：《省级统管地方法院法官任用改革审思——基于实证考察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⑩11参见王禄生：《相马与赛马：中国初任法官选任机制实证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

⑩12参见左卫民：《中国基层法院财政制度实证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⑩13参见王禄生：《英美法系国家“接触型”司法公开改革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

6 期。

⑪④参见何家弘:《法院庭审直播的实证研究》,载《法律科学》2015 年第 3 期。

⑪⑤参见高一飞:《论媒体报道涉罪人员姓名的规则》,载《现代法学》2015 年第 2 期。

⑪⑥参见万毅:《检察改革“三忌”》,载《政法论坛》2015 年第 1 期。

⑪⑦参见封安波:《论我国检察权的“三层级”结构——基于《宪法》与《刑诉》衔接的考量》,载《法学家》2015 年第 4 期。

⑪⑧参见刘国媛:《刑事检察听证制度的“理”与“法”》,载《法学评论》2015 年第 1 期。

⑪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重点课题组;谢佑平;潘祖全:《主任检察官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1 期。

⑪⑩参见向泽选:《检察管理与检察权的公正行使》,载《政法论坛》2015 年第 1 期。

⑪⑪参见何家弘:《中国腐败犯罪的原因分析》,载《法学评论》2015 年第 1 期。

⑪⑫参见何家弘:《宽严相济与中庸反腐》,载《法学家》2015 年第 5 期。

⑪⑬参见左卫民:《背景与方略:中国《刑诉》第

三次修改前瞻——基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思考》,载《现代法学》2015 年第 4 期。

⑪⑭参见陈卫东:《公民参与司法:理论、实践及改革——以刑事司法为中心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⑪⑮参见肖仕卫:《刑事诉讼如何对待家庭?》,载《清华法学》2015 年第 2 期。

⑪⑯参见胡铭:《司法公信力的理性解释与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

⑪⑰参见张亚平:《法国刑罚执行法官及其启示》,载《比较法研究》2015 年第 4 期。

⑪⑱参见赵珊珊:《中国监狱适用羁押巡视制度研究——以美洲国家经验为例》,载《政法论坛》2015 年第 5 期。

⑪⑲参见赵旭光:《“两法衔接”中的有效监督机制——从环境犯罪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切入》,载《政法论坛》2015 年第 6 期。

⑪⑳参见宋杰:《我国刑事管辖权规定的反思与重构——从国际关系中管辖权的功能出发》,载《法商研究》2015 年第 4 期。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2015 年度河南省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

李世宇

2015 年,新一轮司法改革在顶层规划下深层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民诉法解释”),也于 2015 年 2 月 4 日正式施行。相较于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 2011、2012 年修法刺激下呈现出的繁荣局面,新民诉法解释未能在学术论文产出上激发期待中的井喷效应。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 CLSCI 共发表论文 1521 篇。^①其中,民事诉讼法学科 71 篇,约占论文发表总数的 4.67%,在 13 个法学学科中排名第 8,^②与 2014 年的 86 篇相比,数量上有所回落。^③研究队伍中,名家比肩、新秀纷呈,但实务部门依然行者寥落。

圈定上述 71 篇民事诉讼法学论文进行分析后发现,2015 年该学科在选题方向、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上整体沿袭了一贯的低调保守风格。新民诉法解释的筹备及实施,促使学科研究热点在以往分散的整体态势下有所聚焦。传统基础理论如诉权、既判力等,在为解构与建构修法变化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因问题指向的时代意义而反哺自身,理论体系因之更加丰满。研究方法上,在文本诠释、规范分析扎堆的拥堵局面下,出现了部分实证研究、跨部门法研究、政策解析的上乘之作。

本文拟萃取上述 71 篇论文之精华,从民事诉讼基本原理、诉讼程序、证据制度、特别程序、执行程序五个方面进行成果归类,对其中的学术洞见进行梳理与综述,以期深度挖掘该学科之年度学术贡献。

一、基本原理研究

该类论文约计 15 篇,占学科论文总数的 21.1%。内容上包括诉权与既判力理论、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司法改革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 诉权与既判力理论研究

诉权、既判力是传统民事诉讼法学两大极具恒常性和延展性的基本理论,历史上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民事诉讼法学之时代发展。立案登记制、第三人撤销之诉、公益诉讼等新制度适用中的争议和混乱,促使学者们在这两大古老而抽象的理论中找到了新的研究兴奋点。

关于诉权理论,吴英姿教授提出,肩负时代使命的诉权人权论是迈向基本权利范畴的诉权观。私法诉权说完成了诉权的权利化改造,公法诉权说将诉权从私权关系上升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诉权人权论则超越民事权利与诉讼权利,突破诉讼法框架,为人权的司法保障及宪法诉讼奠定根基。诉权人权论要求诉权入宪,人权性质意味着诉权具有绝对性,只能经行使消耗,不可放弃不可否定,不得为其附加条件,这决定了诉讼目的论应界定为“公正解决纠纷”。^④唐力教授提出,应通过程序机制合理界定审判权与诉权,充实诉权实现之程序制度,适当强化法院对诉权实现之程序保障义务,保障当事人之程序基本权。^⑤王晓认为,判断诉权滥用应遵循严格的认定标准,审查主观恶意、行为失范和诉的利益缺失等要件,避免阻却和妨碍诉权行使。结合其危害性及具体情形,体系化、多层次地综合运用行政、民事、刑事追责机制予以惩戒。^⑥

关于既判力理论,张卫平教授提出,裁判效力是民事诉讼存在的基本保障和前提,作为一种规范效果的一事不再理实际上是基于两种基本规制的作用——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和禁止重复诉讼的制度规范,既判力客观范围的界定和重复诉讼的判断都与诉讼标的理论有关,但两者有各自不同的重点和制度构成,属于不同的命题范畴。^⑦我国尚未在规范层面对既判力相对性原则予以明定化,导致第

三人权益程序保障方面存有重大缺陷,实践中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混乱。将既判力制度化,需要明确既判力客观范围的原则及其例外、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及其例外、既判力标准时。根据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判决在没有扩张正当性根据的情形下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判决损害第三人利益时,第三人可以提起一般诉讼。既判力相对性原则不仅有助于纠纷之终局解决,同时也能够为案外第三人提供程序保障。^⑧齐云提出,诉权、诉讼标的、诉讼系属,法律审和事实审的区分均受到罗马法中的“证讼”影响,其关键内容为对讼争事项之确定,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诉讼法上的既判力理论和一事不再理原则。^⑨

(二) 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该类论文共7篇。其中,基本原则部分涉及辩论、检察监督、支持起诉、诚实信用等内容,基本制度方面则针对陪审制度和公开审判制度进行了探讨。

基本原则研究。陈贤贵认为,辩论主义要求课以当事人具体化义务,具体化义务立足于主张责任,由宣示性规则、实现程度规则、免除规则及效力规则等构成,其正当性在于促进诉讼、集中审理,防止滥诉和突袭,我国具体化义务初具制度外形,但缺乏可供良性开展的逻辑前提及关联制度。今后应确立约束性辩论主义原则,规范阐明义务及完备审前程序。^⑩陈钢教授提出,支持起诉原则源于苏联法上的社会干预理论,当下面临转型必要。应以社会管理参与权为基础,将其修改为社会参与诉讼原则。^⑪张卫平教授指出,基于检察监督的各种限制性条件和风险,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应当是选择性的。中心是审判监督程序,重点是事后监督而非审判程序的过程监督。^⑫巢志雄认为,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在具体内容、类型化适用、创设其他程序规范等方面存在过于泛滥、随意和轻视法律方法的问题。法国民事司法实践的必要性、相关性、正当性适用要求,对我国有参考价值。^⑬

基本制度研究。张嘉军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尽管在顶层推动下高调复苏,但当前仍然在陪审员选任条件、陪审案件范围、

实际参审人员构成等方面存在缺陷,“陪审专业户”、“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问题未有实质改观。未来应回归陪审制度初衷,优化陪审员构成,注重普通群众、年长者比重的调整,取消学历资格限制,改变“随机抽取”机制。陪审案件不应限于“社会影响较大”,应处理好专业性新型案件与普通案件的人员选择问题。改造陪审员参与庭审以及合议模式,逐步建立由陪审员单独认定事实的制度,避免法官对陪审员的不当干扰和控制。^⑭高翔提出,我国民事审判公开将对当事人公开与对社会公开混同起来,存在一元化倾向。对当事人公开的权利基础是听审请求权和公开审判请求权,而对社会公开的权利基础是司法知情权。对象及其权利基础差异决定了公开内容的差异,权利冲突时,听审请求权及隐私权保护处于优位。构成审判公开制度结构二元构建的制度逻辑。^⑮李喜连通过实证考察后发现,网上公开的民事裁判文书,在事实认定、论证说理、判决主文等核心内容上存在缺陷。^⑯吴如巧提出,近年来美国媒体对民事诉讼制度不断抨击,如陪审团已“失去控制”,责任认定毫无原则可循,损害赔偿裁判屡创新高,其中多数报道曲解事实,在不同角度影响了公众认知以及诉讼结果。^⑰

(三) 司法改革研究

王亚新教授提出,“省级统管”意味着省级以下各级法院的经费支出不再依靠同级地方财政,而改由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及专项资金等予以补充。改革达成预期目标,取决于方案的内容构成及实施方式,涉及筹资来源、预算案的编制、预算的执行、预决算的审议批准程序等内容。^⑱傅郁林教授认为,本轮改革涉及体制、机制、程序改革等环环相扣的各个方面,审判人员分类和法官员额制当前争议最大、困难最多。员额制应当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颠倒逻辑顺序,将触动利益的人事关系改革置于明晰岗位权限责任之前,会引起一场无序的利益混战。改革全面铺开之前,应认真研究审判辅助人员与员额制法官之间的职权责界分标准,以作为审判人员改革的基础。^⑲

二、诉讼程序研究

该类论文约计40篇,占学科论文总数的57.7%。内容上包括诉讼启动、普通程序、上诉审程序、再审程序、公益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 诉讼启动

关于立案登记制,张卫平教授指出,立案登记制意味着要将现行受理体制由管控转向开放,未来只有将实体判决要件(诉讼要件)的审理置于受理后的诉讼阶段,才能真正实现立案登记制。这要求对相关裁判制度、诉讼要件、诉讼费用等制度进行调整。^{②1}陈亮也认为,我国将原告资格定性为起诉要件,导致了起诉要件的高阶化设定与实体审理的前移,不仅为诉权的行使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而且还剥夺了当事人的陈述权,导致了诉讼实践中的逻辑矛盾。^{②2}推行立案登记制,滥诉的预防显得尤为重要,而诉讼要件具有过滤无意义诉讼的功能。应以改革为契机,将原告资格要件从起诉条件中剥离出去,定性为诉讼要件。在当事人诉权保障与滥诉预防之间的适度平衡。段文波教授提出,根据诉的评价位阶理论,起诉制度之本质在于法官如何评价诉之成立要件。就权限配置而言,起诉程序大致可以分为登记簿制、事前审查制与期日制三种。大陆法系通用期日制,起诉由法院审查诉状之必要记载事项和有效送达诉状组成,法院与原告之间的关系由案件受理简化为诉状审查。我国应当向着期日制方向发展。^{②3}

关于合同案件的管辖问题,肖建国教授提出,当前不同级别和地区的法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方法,司法解释规定的特征履行地规则内容烦琐容易引发争议,一些法院转而采法定履行地规则,导致两种规则在实践中同时发挥作用。条件成熟时,法律应摒弃特征履行地规则,改采更加简单明确的规则来确定合同案件的管辖法院。^{②4}曹志勋指出,在现行程序法和实体法两套合同履行地规则中,应优先适用程序性规则,慎重对待统一履行地规则,并且考虑在协议管辖中对消费者的保护是否足够。应诉管辖在立案实质审查制下有适用可能,法院在向被告送达文书后不应继续依职权审查一

般地域管辖问题,答辩期届满时适用答辩失权规则,对于法院就案件无管辖权时可以依职权移送管辖的规定,应基于目的性解释限缩在被告提出管辖异议时。为防止管辖异议中间上诉制度被滥用,管辖异议可与一审实体问题并行审理。^{②5}

(二) 普通程序研究

关于诉讼请求变更,许尚豪指出,当前民事诉讼的理论和实践中找不到变更诉讼请求的明确条件。诉讼请求项目上的替换与追加,既可能是因社会生活事实变更,也可能是因原告对事实的主观认识有所改变。同一程序能够容忍何种程度的变动,取决于所持观念是规范维持,还是纠纷解决。^{②6}

关于庭审方式改革,章武生教授提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阶段的不当划分,导致法官在争点模糊的情况下审查了大量没有必要审查的证据,法庭辩论的宝贵时间被挤占,相当比重的复杂案件审理终结后事实仍然不清。^{②7}段文波教授认为,我国以苏联为样本的阶段性庭审构造致使庭审各阶段功能重复与界限不清。英美法系因陪审制而实行集中审理,分为审前和庭审两个阶段;又因证据分离主义将事实主张与证据调查分置于前述两阶段。大陆法系之德日采口头审理方式之证据结合主义,又因实行辩论主义将庭审区分为口头辩论与证据调查两个阶段,以区别诉讼资料与证据资料。我国采用并行审理方式,宜参照德日庭审构造,对调现行庭审两阶段,激活法庭辩论并提高以争点为中心的法庭调查的效能。^{②8}

关于法律文书,张卫平教授提出,应建立法定化的庭审笔录制度,使庭审笔录真正成为证明庭审程序合法与否的法律文书,改变庭审程序空洞化、虚无化现象;同时还应书记官制度,笔录制作主体应是相对独立于庭审法官的公证官。^{②9}曹志勋提出,我国既有判决书的结构和说理存在诸多不足,如事实部分不应以事实判断和认定为功能,而应借鉴德国经验,从功能上转换为强调记载和证明的本案事实部分,注重对程序性事项的记载。判决书理由部分应当同时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内容,加强事实说理和回应争点,并在必要时引用其他说理资料。^{③0}

关于行为保全,周翠教授认为,法院应两阶层审查保全请求权与保全理由,申请人对此均应主张与证明,但证明标准只需达至优越盖然性。法院在对保全理由审查时应遵循比例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在保全裁定的内容、担保事项、庭审与否以及是否提起本案主诉等方面,拥有裁量权限。对于家事与非讼程序,还应考虑“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既判力方面的特殊性。^③

关于程序救济,段文波教授提出,程序正义既是发现真实的手段,也是判决正当化的源泉,以此为前提的程序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强化当事人权到试图以充分的程序保障作为判决效之基础,再到以程序保障作为民事诉讼目的,关注重心各有不同。程序保障论要求从期日、期间、送达、主张举证、证据调查、上诉程序以及调解程序等各个层面重建民事诉讼制度。^④潘剑峰教授指出,现行民事程序权利救济机制体系存在救济缺位或过剩、救济对象模糊、救济标准混乱以及救济路径混同或错位等问题,需要在对应性原则、比例原则和效益原则的指导下,逐步建构救济多样化、救济力度有层次性和不同救济手段具有协调性的民事程序权利救济机制。^⑤韩静茹通过比较诉讼程序、非讼程序、执行程序中权利救济机制的不同配置方案,提出应以适度救济原则、必要性原则、比例性原则、及时救济原则、平等救济原则等为指引理念,依循救济机制与程序类型、救济机制与权利性质之间的关系原理,对民事程序权利救济机制予以系统性、全面性的矫正和优化。^⑥

关于调解问题,叶肖华提出,零判决是大调解机制和调解优先政策引发的高调解率之极致表现,人为修饰和加工的零判决与无讼理念不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零判决因其诉讼虚无主义、法治理念虚化和解纷方式错位等不当倾向,不应作为司法实践追求之目标。反思零判决和高调解率,应注重制度运营者和制度利用者的视角融合。^⑦周建华指出,法国现代调解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依附型调解和社会自治型调解混合的模式,而逐步过渡到社会自治型调解已成为调解改革的基本方向。^⑧

关于判例制度,叶榭平指出,英国法律从判例

发展而来,遵循先例使英国法官成了法律规则事实上的创造者。先例判决中的判决理由具有拘束力,但事实上由审理后诉的法官决定判决理由,此为法官造法之契机。先例的多样性既是法官选择先例时面临的难题,也是法官发展法律的机遇。法官也可以通过规避先例,探寻法律原则的例外,使判例法适应社会的发展。^⑨

(三) 上诉审程序研究

该部分研究涉及上诉审撤诉、发回重审、上诉审和解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上诉审中达成和解协议能否阻却一审判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第一批指导性案例2号“吴梅案”作出了否定回答。郑金平指出,给付判决主文承载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债的性质,债之请求权为生效判决强制执行力之实体根据;判决之债及请求权消灭,执行力随之消灭。当事人在判决后和解,以承认判决存在为前提,但目的则在于以债的协议方案替代判决方案。协议之债(新债)与判决之债(旧债)构成债的更新关系。当事人一方申请执行生效判决,另一方以协议为依据提出异议,法院应区分情形处理:若协议已履行,应认定协议之债替代判决之债,原判决执行力予以排除;协议无效及被解除、撤销的,新债自始不成立,原判决继续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期间,或发生争议而诉讼结果尚未确定,被执行人提供担保的,可暂缓执行原判决,待协议履行期限届满或诉讼结果确定再作相应安排。以此解决生效判决与和解协议效力竞合难题。^⑩关于上诉审中的撤诉,林剑峰提出,撤回上诉不等同于上诉审中之撤诉,处分权原则的完整性要求在撤回上诉制度之外单独设定上诉审的撤诉制度。基于平等原则、诉讼经济等因素考量,应在撤诉要件与撤诉的法律效果方面限制原告在上诉审中的撤诉。^⑪关于上诉审中的发回重审,占善刚提出,二审法院对可撤销的一审判决原则上必须自行裁判,发回重审仅为例外,且不应取决于合目的性裁量。为保障当事人的审级利益,无论以程序违法还是判决不当为由发回重审,均须同时满足案件有必要在一审法院由当事人进一步作言词辩论这一前提条件。^⑫

(四) 再审程序研究

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特殊纠错与救济机制,再审制度的运作深层地蕴含着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既判力与再审诉权、司法独立与检察监督等基本价值的冲突,故而程序路径的合理选择至关重要。林越坚认为,监督者的信息劣势导致寻租型和机会型监督申请引发监督虚化,催生前置审查者与后续实体审理者的道德风险。再审程序优化是实现诉访分离、导访入诉等关键目标的重要前提。必须着力提升监督者的信息能力,尽快选择能够强化激励的程序路径。^[40]李浩先生指出,2012年民事诉讼法删除了“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这一存在5年的再审事由,目的在于防止救济过度 and 诉讼拖延。但实证研究发现,该类再审事由在诉讼实务中却未真正消除。对管辖错误进行再审的积极意义在于消除和防范地方保护,解决管辖规则适用中的疑难问题和统一管辖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为平衡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需要从三方面进行优化:设置短的申请和审查期限,作出提审裁定后中止实体审理,建立飞跃申请再审机制。^[41]

(五) 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公益诉讼在2012年修法时确立,新司法解释对其进一步予以细化。2015年,该类研究主要围绕原告适格、审理对象、审理规则和审理程序展开探讨。

关于原告适格问题,郭雪慧提出,职能相关性原则要求担当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组织的职能与宗旨必须与公益诉讼标的具有联系性。有能力性原则要求人力、财力、专业鉴别能力、举证能力等方面的基础和条件。对年限要求是衡量组织的公益活动经验、信誉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监督有权行政机关是否提起公益诉讼、是否合法正当地进行公益诉讼为合适。应当按照损害公益行为影响区域或后果影响区域分层次协调;在适用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优先、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居次的前提下,确立适格原告可以联合起诉、组成公共原告的原则。^[42]高琪认为当下更为紧迫的需求是如何加强符合适格要件限制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能力。德国环境利他团体诉讼的经验表

明,仅仅放宽原告适格限制,增强社会组织的资金和组织能力还远不足以保障制度设计初衷的实现。^[43]

审判规则和程序设计方面,黄忠顺认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既不能绝对对立,也不能简单合并。通过实体或程序赋权方式,给公益性诉讼实施权主体以私益性诉讼实施权,或者给私益性诉讼实施权主体以公益性诉讼实施权,可以实现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有机融合,据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团体诉讼制度。^[44]张忠民指出,环境公益诉讼的审判对象(诉讼标的),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所代表的普遍的环境公益与被告所体现的具体的环境私益之间的诉争,决定了法院在审判中的目标指向和作用范围。环境公益诉讼应建立二元制的审判对象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识别标准,分别解决起诉主体资格问题以及侵权责任、行政责任等实体性问题。^[45]蔡学恩提出,专门环境诉讼独立于传统三大诉讼,该机制包括诉讼主体的扩大化、诉讼目的明确化、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特定化、程序机制的针对性以及在责任承担中增设大规模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救济基金等内容。^[46]孟甜提出,实证资料显示,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信访等规范化途径解决环境纠纷的实践效果差强人意。上述机制的制度供给与实践运作存在背离现象,制度设计、制度激励、制度实践等环节有待完善。^[47]

(六) 第三人撤销之诉

我国对于第三人撤销诉讼的一个重要共识是,诉讼提起应以案外第三人受到原判决约束为必要条件。然而,不受判决拘束之案外人的权益可能受判决损害,另诉未必能够获得救济,且该类案外人因初次就系争事项进行诉讼而难以适用再审程序。严仁群教授指出,美、德、法不受判决拘束者均可提起撤销之诉,我国应扩大第三人撤销诉讼的适用主体和适用范围,放宽损害要件,设置一般债权人起诉的特别要件,废弃预决效力的规定。^[48]许尚豪指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存在难立、难审等问题,原因在于当前过于集中在“诉”的层面,忽略了其从程序功能角度属于特殊再审申请的实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整程序应分为程序审查与实体审理两个

阶段,类似于再审程序的事由审查与实体审理程序。^{④9}郑金玉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定构成要件中,原告主体适格问题同时呈现程序要件与实体要件特征,实践中“原裁判错误”这一要件之适用有复杂化倾向。法院应以原告的权利依据为中心,综合判断“原告主体适格”、“权益受损”和“原裁判错误”三项实体要件。为规范程序运行,减少裁判的随意性,应重视构成要件与程序阶段、裁判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合理安排各个要件的审理顺序。^{⑤0}胡学辉提出,我国民事诉讼法为第三人分阶段地规定了救济措施,第三人撤销之诉应与各种救济程序协调配合,并坚持“防止过度救济”原则、“及时行使救济权利”原则、“事前救济优先于事后程序启动”原则和“内部救济优于外部救济”原则。^{⑤1}

三、证据制度

该类论文共计 10 篇,占学科论文总数的 14%。内容涉及专家辅助人、品格证据、共同危险行为、举证责任、鉴定费用、证据保全程序、预决效等问题。

新确立的专家辅助人制度,意在弥补当事人质证能力不足,排除法官就鉴定意见或专业问题的认识障碍。新民诉法解释的补充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模糊的缺陷。李学军提出,专家辅助人之意见具有证据属性,专家辅助人的资质不以“诉前确认”为依据;专家辅助人的意见以出庭为前提;某些意见只能有限采用。专家辅助人与律师在庭审质证环节须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分工。^{⑤2}

汪诸豪指出,以品格证据弹劾证人因涉及到品格证据的特殊可采性规则而需特别关注。美国证据法允许使用证人的不诚实品性来攻击证人证言的可信性,证明品性的具体方法受到法律规制;允许以名声和意见证言证明不诚实品性,但以具体行为或先前定罪记录证明则受到严格限制。美国规定对我国证人弹劾规则的创设具有借鉴意义。^{⑤3}

任重提出,共同危险行为司法裁判的不统一部分源于对《侵权责任法》第 10 条的误读,该规定应被界定为诉讼规范。民事诉讼法有实质和形式之分,实质民事诉讼法规范同样存在于其他法律文本中。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存在与民法脱节的现

象,对民法中诉讼规范的忽视正是重要表现。将诉讼规范理解为请求权基础或叠加要件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且在结果上贬损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以诉讼规范为视角,在民事诉讼法中建立法律推定的一般规则,将逐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相关疑难。^{⑤4}

占善刚教授认为,鉴定费用属于裁判费用以外的其他诉讼费用,是鉴定人履行鉴定义务的必要对价。在鉴定的证据法构造中,鉴定人、当事人分别与法院产生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鉴定人与当事人之间并不发生法律关系。鉴定人应当向受诉法院而非当事人请求给付鉴定费用。鉴定费用最终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由当事人负担。^{⑤5}应制定专门的民事诉讼费用法律,厘清鉴定费用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关于鉴定费用预交、负担、给付的科学设计。

叶自强研究员认为,我国举证责任理论中较有影响的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忽略了“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这个极为重要的节点。从起诉、提供证据到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证据行为发生系统——提供证据行为。举证行为包含提供证据和对证据加以说明两个行为。提供证据行为对应提供证据的责任,该责任在原被告双方间转移。说服行为对应的说服责任则不可转移,由法官或陪审团的认定与判断形成结果责任。^{⑤6}

关于预决事实在后诉中的效力,大致有两种模式:英美法系的争点效和大陆法系的公文书证据模式。我国长期以来缺乏书证真实性判断的明确规范,新民诉法解释首次确立了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判断规则。段文波教授提出,确定判决中的事实认定对后诉的效力,学说上有预决力、非预决力及证明效三种观点。我国承袭苏联法“预决性”的概念躯壳,以免证效力为内实,本质上系法定证明效,该规定损害了法官认定事实的独立性,褫夺了后诉当事人的接受裁判权,且有违程序保障的基本要求。判决书可作为书证,对后诉法官认定事实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宜由法律硬性规定其证明力强弱。今后应废除已决事实免证效力,将已决事实评价放归法

官自由心证评价。^⑦张海燕教授也认为,我国应正确适用推定并充分发挥其在书证真实性认定中的积极作用。例如,适用推定判断公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当事人可以推翻报道性公文书证的实质真实推定却不能推翻处分性公文书证的实质真实推定;可适用推定判断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但应限制当事人滥用私文书证形式真实的异议权;不应适用推定判断私文书证的实质真实,因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范畴。^⑧曹志勋提出,“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具有预决效力”的规定无法得到传统既判力理论的支持。预决效力不同于既判力的事实排除效和公文书的证明力规则。为达到扩大既判力的目的,应当提起独立的中间确认之诉。比较法上虽然存在扩张既判力范围的主张,但存在标准模糊、缺乏可预见性以及可能无谓浪费诉讼资源的弊端,也不适合我国现有发展程度。^⑨

占善刚教授认为,证据保全与保全程序虽均有保全之名,在性质上却迥然不同。证据保全乃预先进行的证据调查程序,保全程序乃暂时、假定地确定私权的程序,目的在于保障将来强制执行中顺利实现当事人的私权。证据保全参照适用保全程序的规定乃错误立法。应立足于证据保全本质作相应的制度安排。^⑩

四、特别程序研究

该类论文共计3篇,占学科论文总数的4.2%。内容上包括担保物权实现程序、精神病人民事强制住院程序、仲裁市场竞争等。

新确立的担保物权实现程序立法简略,实践中操作混乱,毋爱斌提出,该程序应以形式审查为原则,在审查中应保障担保人、债务人的陈述权。经该程序作出的许可拍卖、变卖裁定在性质上为“对物之执行名义”,法院只能对该裁定指向的特定担保财产进行拍卖、变卖。审查过程中,如担保物权的有效成立、担保物权实现条件等实体问题出现争议,应由争议主体提起诉讼予以解决。^⑪

赫振江提出,受近年来出现的非精神障碍患者被强制住院事件影响,2011年的《精神卫生法》、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均设置了强制住院程序。对存在危害自身或他人危险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

民事强制住院,依据的是警察权与国家监护权。民事强制住院涉及公权力的行使与相对人之人权保障,是否强制住院应由法院而非精神病科医生决定。《精神卫生法》下民事强制住院程序应采用非讼程序进行重新构造。^⑫

张圣翠教授提出,仲裁可被视为一种服务商品而可成为市场竞争的对象。我国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了仲裁服务市场处于地区分割的不竞争状态,同时排除了临时仲裁竞争和大量有仲裁能力公民的市场准入与竞争。加强仲裁市场竞争能有效改善政府职能和降低财政负担、提高仲裁服务者的竞争力、提高仲裁公信力等。应树立仲裁主要为私法性质程序法的理念、移出《仲裁法》中大部分的仲裁机构规则、引入临时仲裁制度和修订仲裁员资格条件规范。^⑬

五、执行程序研究

该类论文共计4篇,占学科论文总数的5.6%。内容上包括执行异议之诉、审执分离、拍卖制度研究。

民事执行中,国家公权力介入私人权益的实现过程。民事执行追求迅速、高效地实现债权,难免出现侵害法益的现象。新民诉法解释第304-316条为执行异议之诉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指引。丁宝同认为,作为大陆法系传统下的一项具有相当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制度方案,执行异议之诉尽管在我国形成了初级程序规则,但尚有诸多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有待解决。^⑭郑世保提出,执行检察监督和执行救济在纠错对象、证据负担等方面存在差异。针对私益的错误执行行为,应由当事人首先提起执行救济,在执行救济无法达到目的时,执行检察监督在当事人申请下启动,此时救济序位应是“申请救助说”;而针对公益的错误执行行为,则可以立即启动检察监督,此时救济序位是“主动参与说”。^⑮

关于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洪冬英指出,审执分离是渐进过程,需要从机制到体制加以设计。机制在于解决审执既分离又衔接的运行方式,体制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组织架构。基于当前现状,应以分离为原则合一为例外。基于执行程序内在的司法性要求,虽然审执区别要求建构分离体制,但两

者的共通性强调分离之下的衔接。必须完善执行机关及人员的科学配置,颁行单独的强制执行法。^⑥

司法拍卖改革率先提出司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离与制衡关系命题,新民事诉讼法对司法拍卖制度做出了微妙调整。汤维健教授指出,司法拍卖制度历经从法院自行拍卖到委托拍卖、从拍卖权力集中行使到拍卖权力分离与制衡、从拍卖场所分散化到拍卖场所统一化、从现场拍卖到网络拍卖等一系列的发展演变,司法拍卖的市场化成为改革的基本方向。今后应致力于消除司法拍卖多种模式并存的非统一格局,由此提升司法拍卖的公平、效率性以及公众的信赖。^⑦

注释:

①CLSCI为“中国法学期刊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China Leg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文中数据参见中国法学创新网, <http://www.lawinnovation.com/>, 2016年8月3日访问,下同。

②其他部门法学发表篇数大致为:民法267,刑法237,法理198,经济法158,刑事诉讼130,宪法120,行政法学101,法制史62,商法80,国际私法19,国际经济法34,国际公法44。

③2009年至2015年,CLSCI法学期刊发表的民事诉讼论文篇数(法学论文总数),以及民事诉讼法在论文发表总数中所占比率之数据分布如下:2009年59(1406),4.08%;2010年74(1431),5.17%;2011年99(1435),6.9%;2012年93(1412),6.59%;2013年71(1357),5.23%;2014年86(1557),5.5%;2015年71(1521),4.67%。

④参见吴英姿:《论诉权的人权属性——以历史演进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⑤参见唐力:《司法公正实现之程序机制——以当事人诉讼权保障为侧重》,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

⑥参见王晓、任文松:《民事诉权滥用的法律规制》,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5期。

⑦参见张卫平:《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

事不再理”》,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⑧参见张卫平:《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根据、例外与制度化》,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⑨参见齐云:《论罗马民事诉讼法上的证讼》,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⑩参见陈贤贵:《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研究》,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

⑪参见陈刚:《支持起诉原则的法理及实践意义再认识》,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⑫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实施策略研究》,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

⑬参见巢志雄:《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现象、问题与完善——兼以法国民事诉讼的理论争论与实务判例为参照》,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

⑭参见张嘉军:《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证分析与制度重构》,载《法学家》2015年第6期。

⑮参见高翔:《民事审判公开对象二元区分论》,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5期。

⑯参见李喜莲:《网上公开之民事裁判文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

⑰参见吴如巧:《美国媒体视野中的民事诉讼》,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5期。

⑱参见王亚新:《“省级统管”改革与法院经费保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

⑲参见傅郁林:《以职能权责界定为基础的审判人员分类改革》,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

⑳参见张卫平:《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

㉑参见陈亮:《诉讼要件抑或本案要件?——美国关于原告资格定性之争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

㉒参见段文波:《起诉程序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㉓参见肖建国、刘东:《管辖规范中的合同履行地规则研究》,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5期。

㉔参见曹志勋:《民事地域管辖制度释疑——兼对〈民诉法解释〉规则的述评》,载《法学家》2015年第6期。

②⑤参见许尚豪、欧元捷:《诉讼请求变更的理念与实践——以诉讼请求变更原因的类型化为切入点》,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②⑥参见章武生:《我国民事案件开庭审理程序与方式之检讨与重塑》,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②⑦参见段文波:《我国民事庭审阶段化构造再认识》,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②⑧参见张卫平:《论庭审笔录的法定化》,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②⑨参见曹志勋:《对民事判决书结构与说理的重塑》,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③⑩参见周翠:《行为保全问题研究——对〈民事诉讼法〉第100-105条的解释》,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

③⑪参见段文波:《程序保障第三波的理论解析与制度安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

③⑫参见潘剑锋:《论建构民事程序权利救济机制的基本原则》,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③⑬参见韩静茹:《民事程序权利救济机制的建构原理初探》,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5期。

③⑭参见叶肖华:《零判决现象的反思与批判》,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

③⑮参见周建华:《法国现代调解的发展:传承、借鉴与创新》,载《法学家》2015年第2期。

③⑯参见叶榭平:《遵循先例原则与英国法官的审判思维和方法》,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

③⑰参见郑金玉:《和解协议与生效判决关系之债法原理分析——兼论“吴梅案”的规则解释》,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4期。

③⑱参见林剑锋:《设定与限制:论民事上诉审中的撤诉》,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

③⑲参见占善刚:《民事诉讼发回重审的理由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

④⑰参见林越坚、刘青青:《博弈论视角下民事再审监督机制的程序优化》,载《法学》2015年第3期。

④①参见李浩:《删而未除的“管辖错误”再审——基于201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④②参见郭雪慧:《论公益诉讼主体确定及其原告资格的协调——对〈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

④③参见高琪:《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限制——以德国利他团体诉讼制度为借鉴》,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3期。

④④参见黄忠顺:《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融合——兼论中国特色团体诉讼制度的构建》,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④⑤参见张忠民:《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审判对象》,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

④⑥参见蔡学恩:《专门环境诉讼的内涵界定与机制构想》,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3期。

④⑦参见孟甜:《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视》,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2期。

④⑧参见严仁群:《不受判决拘束者之事后救济》,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④⑨参见许尚豪:《程序审查与实体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二阶程序结构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2期。

⑤⑰参见郑金玉:《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践运行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年06期。

⑤①参见胡军辉:《论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周边程序的协调》,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08期。

⑤②参见李学军、朱梦妮:《专家辅助人制度辨析》,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⑤③参见汪诸豪:《美国法中基于品格证据的证人弹劾》,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⑤④参见任重:《民事诉讼视野下的共同危险行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

⑤⑤参见占善刚:《民事诉讼鉴定费用的定性分析》,载《法学》2015年第8期。

⑤⑥参见叶自强、叶蓁:《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理论的两个假定前提》,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1期。

⑤⑦参见段文波:《预决力批判与事实性证明效

展开:已决事实效力论》,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

⑤⑧参见张海燕:《推定在书证真实性判断中的适用——以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立法为借鉴》,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⑤⑨参见曹志勋:《反思事实预决效力》,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

⑥⑩参见占善刚:《证据保全程序参照适用保全程序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1条第3款检讨》,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

⑥⑪参见毋爱斌:《“解释论”语境下担保物权实现的非讼程序——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197条》,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⑥⑫参见郝振江:《论精神障碍患者强制住院的

民事司法程序》,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

⑥⑬参见张圣翠:《我国仲裁市场竞争法律制度的困境与突破》,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

⑥⑭参见丁宝同:《执行异议之诉:比较法视野下的谱系解读》,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4期。

⑥⑮参见郑世保:《再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和执行救济的序位关系》,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⑥⑯参见洪冬英:《论审执分离的路径选择》,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2期。

⑥⑰参见汤维建:《论司法拍卖市场化改革及其完善》,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社会学

2015 年度河南省社会学研究综述

牛苏林 张 侃 闫 慈

2015 年河南省社会学界在城乡发展与流动融合、人口老龄化与养老、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乡村治理与三农问题、组织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一些研究在全国社会学研究中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

一、城乡发展与流动融合研究

(一) 城镇化与城乡发展问题研究

城镇化与城乡发展问题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对当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进行了反思,认为传统的城镇化并没有让进城务工人员真正成为“城里人”,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移动。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资源有限的农业大国现状,让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并不是最佳选择。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探索更适宜我国现状的城镇化道路,就近城镇化就是途径之一。通过发展产业支撑、推进农业现代化、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打造新型居住环境、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可以促进就近城镇化的实现。^①有学者对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行为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政府行为中大包大揽、与民争利、重建轻管、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政府需要更新观念、转换体制、调整利益,进一步加强学习、注重服务、强化监督、主动创新,以真正推动城镇化的良性推进。^②有学者对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失地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需要有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制度保障其基本生活。政府需要从完善法律

制度、提供基本就业服务等方面做好失地农民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③有学者对河南省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数整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2013 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河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步入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同时研究又指出在不同的地市,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可能并不相同,产生的原因也不同,任何一项超前发展对城镇化健康发展都可能会有一定影响。^④城中村改造也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有学者就针对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郑州市的城中村改造进行了一个村民满意度调查,研究基于郑州市 1425 份城中村村民的调查样本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计量模型,从村民满意度的视角对郑州市城中村的改造效果进行评价,分析得出:村民对城中村改造的整体评价为“一般”,其中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最高,对社会保障和收入状况的满意度次之,对就业安置的满意度最低;从影响因素的显著性看,对总体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是居住环境和就业安置,其次是社会保障,最不显著的是收入状况。此外,村民的性别、年龄和所受的教育水平等个性化特征对满意度也存在影响。^⑤城镇化的推进在给农民带来巨大外部冲击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民原本的生活。有学者就针对目前农村婚姻市场的变革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指出 2010 年前后,农村社会离婚高发,离异的女性几乎都能很快再嫁,并且享受婚姻市场所带来的好处更多;而男性在离婚之后却很难再婚,他们无力支付

再婚的成本。这种特殊的“重返光棍”现象彰显了在农村婚姻市场又一个层面的深刻变革。^⑥

(二) 农民工问题研究

农民工问题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界研究城镇化问题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有学者在系统梳理以往农民工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元研究的层面,对农民工进行类型学上的划分。研究基于农民工生活结构的分析,把农民工放置于由流出地和流入地共同构成的场域中,建构了由“流出地脱嵌”和“流入地嵌入”两个维度构成的分类框架,把农民工分为两栖群体、移民群体、打工群体、无根群体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农民工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转化路径,无根群体的日益增长是城乡二元结构屏障引起社会流动渠道梗塞的结果,极具消长、变动与转化的张力。研究最后指出,通过制度变迁引导农民工转型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思路在于疏通移民群体的增长路径和无根群体的消解路径。^⑦有学者从社会质量的视角对提高农民工收入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关于提高农民工收入的研究,可以运用社会质量理论的四个条件性因素,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来展开。农民工收入水平不高制约社会经济保障机能,对农民工工资的拖欠削弱了社会的凝聚,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了社会包容性发展,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阻碍了其权能的实现。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应努力落实农民工就业保障,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增强社会凝聚力,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包容体系,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农民工的增能和赋权,加快农民工收入增速。^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是目前农民工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和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和“90后”的农村劳动力,也称第二代农民工。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到的教育程度较高,务农经历较少,而外出动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日益变大,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流。有学者以郑州市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指出,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差异、劳

动时间、流动时间等基本社会特征显著影响了他们的收入状况。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随着劳动时间和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而增长;单纯从事体力劳动在收入上处于劣势地位;而教育和性别对他们的收入影响不显著,说明现阶段郑州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多集中在一些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男女同工行业中。^⑨有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调研分析,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普遍不高,收入满意度最低。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不高影响了其市民化进程。其原因在于现行制度不完善、城乡文化的断裂及新生代农民工遭受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排斥,必须从现行制度、用工单位、民间组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个方面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⑩

(三) 城镇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与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也是当前社会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成果丰硕,各研究也都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学者对人口流动的家庭化和社会融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指出,流动人口的家庭化和社会融合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家庭化程度与社会融合程度成正比。流动家庭的家庭结构类型比较单一,实际上就是单人家庭、核心家庭和一对夫妇户等三种形式。从家庭数量看,本质是家庭的占流动家庭的一半以上,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程度还比较低。在流动人口逐渐趋于家庭化和长期化的同时,流动人口以低层次的非正规就业为主,居住以租房为主,社会交往以原有亲朋网络为主,社会保障以原有保障为主,社会融合的程度处于较低水平。^[11]有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困难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制度障碍、经济障碍、价值冲突与社会歧视等。应通过深化各项制度改革,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构建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加强劳动执法检查,健全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12]有学者从收入和消费的视角来分

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十八地市青年农民工调查样本,分析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消费及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与影响。研究指出,2013年调查样本农民工月均收入低于2011年河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青年农民工个人外显性消费呈现炫耀性特征,而集体消费则处于被抑制状态,收入水平低、消费支出短期化倾向导致农民工阶层固化,不利于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高收入水平、引导农民工理性消费,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有效途径。^⑬有学者则从农民工市民化对其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的视角来进行研究,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同工同酬的根本措施;农民工市民化能改善收入状况,释放消费潜力。为此需强化政策措施建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⑭有学者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条件和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市场经济对人口流动的引导、社会体制对流动人口的保障、个体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的适应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基本前提,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满足个体及其子女发展诉求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动力。在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存在着差异性选择规律、阶段性融入规律和互构性接纳规律。政府相关部门及全社会应当从改革完善居住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强流动人口对生活社区和工作单位的归属感等方面,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进行操作化设计,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推进流动人口的真正市民化。^⑮有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转向进行了分析,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网络,按其存在形式可分为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传统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由于具有高同质性、弱社会互动性和内倾性特征,并不能在社会互动与融入过程中提供创造性的支持,单纯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会造成城市融入的“内卷化”。因此建构社会理性导向下的城市社会正式支持网络,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秩序规范与异质性社会资源,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⑯也有学者以河南省为例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

在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利益、观念不断分化的大背景下,由于人口管理理念的滞后和信息统计的缺失,加上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足、公共资源供给有限等原因,我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必须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健全流动人口法规制度,完善流动人口信息平台,转变流动人口工作观念,保障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促进流动人口心理融入。^⑰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上,还有学者对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问题,^⑱返乡农民工子女农村社会融入问题,^⑲社会工作介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⑳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还对农民工流动中产生的临时夫妻现象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临时夫妻”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是与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分不开的,是传统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某些变化中的一部分。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制度压力与社会流动导致的社会距离拉大而产生的情感压力,使农民工产生了“临时夫妻”这一越轨行为。^㉑

(四)农村“三留守”问题研究

随着快速城镇化的推进和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多,农村“三留守”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这让对“三留守”问题的关注提升到了国家层面。社会学界也在这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留守老人方面,有学者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村留守老人普遍存在收入水平低、医疗保健不健全、生活孤独、缺乏精神慰藉等问题。要通过健全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加快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等措施,使留守老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㉒留守妇女方面,有学者从社会服务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留守妇女是农村社会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社会各界对她们生存状况高度关注。目前,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较大,且安全感缺乏,她们渴望改善这种状况。但由于政府对留守妇女服务的滞后性

和社会各界对其提供的实质性帮助不足,所以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有恶化之趋势。因此,开展留守妇女社会服务意义重大。对留守妇女的帮扶和救助应强调政府之责任,构建留守妇女社会服务机制,完善留守妇女社会服务网络,开展农村留守妇女关爱行动,将留守妇女社会服务落到实处。^②还有学者从社会支持网络的角度来分析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明显地存在缺位现象,为留守妇女构建个人支持网络、自助团体支持网络、社区支持网络,可以有效增强留守妇女的自助能力,改善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③留守儿童方面,有学者撰文指出,随着大批农民工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正日益成为庞大的群体,如不能及时解决这一群体存在的问题,不仅会危及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会给农村的教育以及社会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关系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解决好留守儿童问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④

二、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研究

(一)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体系的一般性探讨

有学者从“积极福利”的视角对应对人口老龄化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吉登斯运用现代性理论,从制度、主体与行动三个维度系统论述了“积极福利”的思想。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方面,它启发人们制定如下措施:组织专家走进社区开展健康巡讲活动,培育和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意识;推广并普及“积极老龄化”观念,培育积极能动的老年主体;通过大众传媒宣传以及出版健康类图书,普及公民健康知识,改变其日常行动。^⑤有学者对河南省的城镇养老服务体系进行了深入调研分析,研究发现了河南省城镇养老服务目前存在的供需矛盾,并分析了这些供需矛盾存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观点以及具体政策措施。^⑥

(二)对不同养老方式的研究

对不同养老方式的利弊、得失的探讨一直是养

老问题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涵盖了现存的所有主要养老方式。有学者从宏观上对中国农村的养老方式演进进行了研究,研究通过对农村养老方式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发现当前农村养老方式中存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区养老不完善、机构养老不规范以及缺乏亲情关怀等问题。研究指出,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方式。^⑦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是目前最主要的两大养老方式,从不同视角对其的探讨也比较多。社区居家养老方面,有学者指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资金政策,主张投入的多元化,既强调政府资金的投入,又倡导社会资金的参与;然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政府资金投入总量偏小,各级政府资金负担构成不合理,社会资金参与不足。究其原因,在于政府资金预算规划性不强,政府引导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社会化程度不高。考虑到公平与效率,应当完善政府资金保障机制来充分发挥居家养老服务资金政策的作用,如将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优化政府资金投入结构,形成稳定的资金投入比例,建立规范的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和加强政府对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社会化的引导等。^⑧有学者对河南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进行了研究,研究基于郑州市郑纺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状况,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切入点,在了解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存在的人员资金不足、政府管理缺位等问题,最后从资金来源、政府管理、队伍建设、扩大宣传和数字化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措施。^⑨还有学者专门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进行了探讨,研究指出,当前我国“失独”老人养老中存在着经济保障不到位、制度安排不合理、心理关怀不够多、生活照料不够细、主动融入需增进等问题,应该构建“失独”老人养老服务社会支持体系,整合各方资源,建立与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失独”老人养老服务社会支持体系。^⑩机构养老方面,有学者专门对机构养老的认识误区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现在有片面夸大机构养老的支撑地位、将机构养

老等同于市场化养老、重数量轻结构等方面的认识误区,因此在养老机构的建设上我们需要正确认识机构养老服务的功能;合理界定三类养老机构的目标消费群体;重视养老机构的数量、规模、质量和价格;完善并落实养老机构优惠扶持政策。^②有学者对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对河南省X县的实地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发展中面临着国家扶持政策难落实、行政审批难、设施设备简陋、专业和非专业养老护理员普遍缺乏、管理不规范、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存在不公平竞争等问题。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政绩考核评价办法不科学、政策设计本身不科学、配套措施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建议将社会养老服务等民生保障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制度设计本身的科学性、完善配套机制、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政府多部门与社会力量协同监管、建立健全与养老护理员相关的各项制度、明确区分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功能范围,以促进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快速发展。^③

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

(一)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方面,有学者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进行了探讨,分析指出当前,公平与效率仅仅是提升我国社会保障能力的一种方式,而非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前进的根本目标。由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各个层面支撑下已经颇见成效,随着百姓生活品质的提高,也逐步稳定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令我国早日步入真正的文明、发展的现代社会。^④还有学者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指出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两个主要方面,但现阶段,我国的农民工不享有失业保险的保障权,在失业期间他们很难得到当地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帮助,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农村。农民工因其亦农亦工的双重身份很难在城镇与农村的医疗保险中达到平衡,同时农民工也不享有工伤保险保障权。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需要从加强法制化、提高农民工教育水平、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和提高用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等几个方面来推进。^⑤

(二) 社会福利

有学者对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析,研究指出,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奠基于他对现代性的分析。就现代性、风险和福利国家的关系而言,现代社会中外部风险向人为风险的转变,导致福利制度陷入困境。福利国家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施“积极福利”。这一构想包括三个方面:在制度上,建立一种“积极的福利社会”;在社会主体方面,培育“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在行动上,强调合理的日常生活行动。^⑥有学者从理论上对福祉、福利与社会福利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厘清,文章指出,福祉、福利与社会福利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它回应了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然而在实际研究中,福祉、福利与社会福利三个概念极其相似,导致了这三者之间出现了混用和滥用现象,从而严重影响了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文章认为,这三个概念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关系:社会福利是最基础层次的概念;福利是中间层次的概念;而福祉是最高层次的概念。由福祉、福利与社会福利组成的概念框架说明现代福祉、福利与社会福利制度是层次性、整体性和全面性的。^⑦

(三)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教学的研究、社会工作在不同类型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探讨和志愿者服务研究这三个方面。在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教学方面,有研究者指出,我国社会工作机构需求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着错位,主要表现为“机构需求”与高校学生就业取向的错位,机构对专业人才类型及专业方向需求与培养的错位,机构对专业人才能力、素质需求与培养的错位。建议从高校人才培养、机构、政府三个方面入手解决问题。高校方面应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机构方面应增强社工职业吸引力,政府方面应规范社工职业的相关制度。^⑧还有学者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困境进行了反思,该学者以郑州市轻工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为例,指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面临实习专业性不强、实习经费不足、指导老师的实务能力欠缺和实习基地建设滞

后等方面的困境,需要加强实践教学的专业性、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指导教师的专业能力、建设有效的实习基地。^③关于社会工作在不同类型社区建设中作用的探讨,有学者探讨了社会工作者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认为社会工作者具有对农村社区留守儿童心理、学习方面的辅导作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的作用;普及科学知识、反对迷信、邪教的作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生活的作用;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④有学者对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进行了研究,指出少数民族在其民族特征、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这一群体利益诉求的特殊性,使得对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人口流动背景下,民族社会工作亟须关注与研究。该研究从优势视角出发,以河南省郑州市B清真寺及其周边民族社区为例,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提出了建议。^⑤在志愿者服务研究方面,有学者对志愿服务成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指出志愿服务成效评估是志愿服务供给程序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检验志愿服务成效的重要工具。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志愿服务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对于促进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多元化发展,促成志愿服务动力机制和长效发展机制的建立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是依据平衡计分卡、“3D”“3E”和“APC”等相关理论的指导,遵循科学合理、可操作性、普遍适用、精简全面等基本原则而设置的,并通过专家打分法,按照一定程序加以运用。^⑥

四、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研究

(一) 家庭抗逆力研究

家庭抗逆力的研究是日渐兴起的一个较新的研究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的视角。有学者对家庭抗逆力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性的研究,指出家庭抗逆力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抗逆力或单个家庭成员的抗逆力,代表着从问题焦点、缺陷视角向能力基础和优势视角的范式转变。不同的家庭抗逆力定义下其构成要素也是不同的,家庭抗逆力研究的源头

在于对家庭压力、家庭脆弱性和应对、调适的研究,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系统和家庭沟通与问题解决历程“三系统说”或正向思考等“十因素论”是家庭具有的影响家庭抗逆力的保护和恢复性因素。家庭抗逆力的历程有两历程说、四阶段论和五阶段论。学者根据自己对家庭抗逆力的研究建立了一些模型、保护性机制和测量方法。目前研究的方向是家庭抗逆力本土理论及模式的建构、对家庭抗逆力的测量和评估,研究的难点是家庭抗逆力各要素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⑦有学者对养育罕见病儿童的青年家庭抗逆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养育罕见病儿童的青年家庭的抗逆力主要存在以下五种类型:拓展升华型、内部均衡型、动荡型、挣扎型及放弃型;这五种类型又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精英带动型”和“资源/制度制约型”;家庭抗逆力得以发挥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家庭内部精英人物和家庭本身组织结构、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调整;家庭抗逆力发挥的主要阻碍除了个体人格特质、家庭结构与关系要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来自资源和制度的制约。目前的家庭抗逆力呈现出结构制约下的个体行动主动性和策略性行动明显的特点。^⑧

(二) 有特殊需要儿童与弱势儿童研究

有特殊需要儿童方面,有学者对残疾儿童融合教育进行了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残疾儿童实行随班就读的融合教育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目前我国融合教育存在理念不到位、社会福利政策不够完善、社会服务专业化程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融合教育的健康发展。基于此,应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融合教育的成功经验,努力完善我国融合教育制度。一是转变理念,营造融合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二是以政府为主导,持续推动政策创新。三是以需求为本,提升社会服务水平。^⑨弱势儿童方面,有学者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辨析,分析指出,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目标、手段及方式上一直存在观点的对立,这其实是思维套路化的表现。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其根本在于仁爱之心。如果丧失了根本,一切所谓的救助之法都会出现偏差,救助工作就会在两

端中循环。只有回归救助之本,才会有切实可行的救助办法。^{④6}

(三) 儿童教育的社会学研究

有学者对河南幼儿园教育的小学化现象进行了社会学上的考察,研究指出,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不仅体现在常见的“教学内容”方面,还体现在较隐蔽的“行为规范”方面,两者发生在幼儿园的不同阶段;幼儿园的性质和家长的学历、家长小学化的教育需求以及他们支付的教育成本等因素对小学化的程度影响显著,说明政府教育职能的旁落、幼儿园教育市场化以及家长非理性的教育需求是导致小学化问题的深层原因。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政府在幼儿园教育资源的分配和发展方向上起主导作用;幼儿园应细化各阶段的教育目标,使其具有差异性和连续性,杜绝同质化;打破以往幼儿园单纯适应小学的衔接惯例,改单向衔接为双向衔接。^{④7}

(四) 青年研究

青年研究方面,有学者对80后青年的社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基于全国12个城市3000多个样本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80后”青年的社会认同处于“转型期”,存在“断裂”现象与内群体偏好效应。其社会认同主要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较大,受人口学变量及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较小且具有差异性。^{④8}有学者从制度文化的视角对青年的政治信任建构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青年是具有先进思想观念的群体,比其他社会群体对先进制度文化的诉求更加强烈。如果内在的制度文化的观念不变化,那么外在的制度也难以动摇。因此,要用科学先进的理念做制度文化的内核。新时期,青年思想的开放性是一把双刃剑,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由于青年价值观具有不稳定性,容易将一切西方文化奉为先进方向,使其思想易受不良文化诱导,导致错误的行为判断。创新条件下的制度文化,不仅可以增加青年对制度变革的认同,还可以扭转青年对制度文化错误的价值判断,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持续变革的制度条件下,形成对新制度的认同和遵守,维持政

治信任。^{④9}

五、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

(一) 社会治理综合研究

社会治理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学者梳理了“社会治理”从提出到作为党的重要施政纲领的过程,归纳了“社会治理”的内涵和特征。^{⑤0}社会事业的扩大开放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驱动器”。有学者认为,要从“协同治理”视域出发,在确立政府、社会、市场边界的同时,实现主办、经营和运行方式的多元化,推动三者的交融与互动,从而推动社会事业扩大开放。^{⑤1}有学者在总结近年来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问题,因此要统筹经济社会转型与社会事业转型发展、社会事业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事业改革与自身开放、社会事业开放与民生保障等方面全面协调发展。^{⑤2}有学者指出,应将社会协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发展方向。^{⑤3}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同治理机制,用以深化改革、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⑤4}有学者针对当前社会治理方式存在的治理手段、理念、执行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并作出合理建议。^{⑤5}有学者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出有利于我省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⑤6}有学者则通过建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体系,对河南省各地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进行评估研究。^{⑤7}就当下社会背景来看,有学者强调要更多地采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即“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去解决社会矛盾,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⑤8}有学者还特别针对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宗教治理提出建议,政府应采取多层次功能替代的策略治理和完善基督教。^{⑤9}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有学者提出必须高扬法治精神,使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扩大社会参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⑥0}

(二) 城市治理研究

社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深入群众的基础。有学者提出要利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思想加强社区建设,既可以

促进经济发展,又加强构建和谐社区。^①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全新、高效的管理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和部门所认同并引入自己的社会管理体系中。有学者以郑州网格化管理为例,研究如何优化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②并强调要借助网格化微单元的优势,在网格内组建居民微社团,开展集体行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从而形成一种微自治机制。^③

(三)农村治理研究

农村作为中国最基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会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中国的社会治理状况,有学者提出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择取,必然受制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政策变化,具有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特色特征。^④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社会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的专政管制阶段,中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适应“阶级斗争”治村的组织建制,体现了“以法治村”的治理理念。^⑤就今天而言,有学者指出要注重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建立起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制,建构起多元主体参与的、运转良好的农村社会协同治理运行机制。^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社会组织出现并在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其已然是新农村建设中一支生力军,成为我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载体。^⑦有学者则通过数据分析,说明近20年以来,我国在三农问题研究中农村社区研究的比例还不够高,但逐渐显示出立项数增多、研究范围扩大等趋势。^⑧

(四)社会工作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社会工作凭借其专业化、职业化社会服务的专长,成为协同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沿力量,要构建社会工作协同政府实施社会政策、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四大机制”,最大化地发挥其力量。^⑨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化解社会矛盾、调节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社会各界应创造条件,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⑩有学者认为当前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依然遇到很多阻力,

必须要改革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建构合作治理网络,促进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实现高效的社会治理。^⑪针对目前政府购买服务所出现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要从购买社会服务的路径选择及协同创新机制建构方面着手,以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需求。^⑫除此,还有学者对近几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进行研究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分析。^⑬

(五)其它研究

有学者通过分析农村庙会研究农民的闲暇生活方式,认为庙会对于农村社会交往、社区认同与凝聚起到巨大作用。^⑭有学者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妇女发展情况进行研究。^⑮有学者分析当前社会利益矛盾呈现出的阶段性的新变化新态势进行研究。^⑯有研究表明食品安全报道的负效应对我国的政治和谐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需从加强媒体的自我约束、完善社会监督、健全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加以防范。^⑰我国既有的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依然存在不足,有学者提出要建立新机制适应时代发展。^⑱有学者则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对受暴妇女的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对有效解决妇女家庭暴力问题大有裨益。^⑲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弱势心态泛化现象不断加重,影响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阻碍科学的社会治理,将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潜在威胁。有学者就此提出要建立完备客观的参照指标、构建公平公正体系及全社会范围内提升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教育,能有效矫正弱势心态泛化,保证整个社会有序、健康、稳定发展。^⑳有学者全面分析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的演化趋势及现实危害,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㉑在当前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有研究指出一旦二孩生育政策放开,城镇“80后”将成为二孩生育的主体,较易生育反弹形成生育堆积。^㉒“二代现象”作为转型中国的独特现象,是社会转型中家庭教育的过度退位与社会教育滞后补位的结果,研究表明要创新社会管理以迎合后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㉓有学者基于2014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的分析,提出网络舆情事件的特点及治理之

道。^④有学者则通过网络突发事件这一新型突发事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具有启发意义的应对策略。^⑤还有学者提出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队伍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培养高素质的官方意见领袖,引导草根网络意见领袖,提高网络意见领袖社会责任意识。

六、乡村治理与三农问题研究

(一)农村土地研究

农民作为土地的主要利用者,其土地意识不仅对土地的利用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谐社会建设、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战略进程。有研究表明通过归纳和梳理农民土地意识概念与维度划分方法、农民土地意识状况与影响因素,可以看出农民土地意识对于实现农民自身发展、促进我国现行农地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和推动和谐社会构建及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⑥同时,当前农民土地意识主要呈动态多元的特点,且农民市民化意愿并不强烈。农民土地意识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力量主要在其土地价值意识和依赖意识对其市民化意愿的负向影响上。而土地产权意识对其影响并不显著。^⑦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国家相关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将会进一步提升。农村土地流转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有研究就从风险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些潜在风险进行科学分析,构建农村土地流转防控体系的路径及相关保障措施,以规避和化解风险。^⑧由于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因此深化土地改革、围绕农民土地承包权构建农民社会保障长效机制,才能为构建土地流转后农民社会保障提供制度支撑。^⑨研究表明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最大困境是资金不足、筹措困难。搭建一个农民社会保障的长效机制,为农民社会保障提供充足、稳定的资金来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⑩

(二)文化观念研究

以“政府主导、合村并点、农民上楼”为表现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有研究表明,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在旧宅拆

迁补偿、新房建设和节约建设用地处置方面匹配程度较差,农民入住新型农村社区意愿和实际入住率均较低。^⑪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民身上所具有的诚实、憨厚、守望相助等传统特质正在快速弱化,中国人的民族性中最具根性的温和、含蓄、内敛的特质在农民身上正逐步消解,有学者认为民族性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建构与解构的双向互驱关系——民族性以内敛而持久的文化性力量建构着社会秩序。^⑫乡村文化中,性是一种有缺口的禁忌。有学者通过分析性的研究原点,从乡村社会的语境中来探讨性所经历的话语演变,以及性对于乡村社会的意义,使得乡村社会的性建构成为一个从价值层面到规范层面、从规范层面到实践层面的综合体系。^⑬

(三)其他研究

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是党中央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提出的重大战略。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的实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但持续存在的流失现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学者提出,由大学生向基层干部的角色能否成功转变,是影响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的主要原因。^⑭在传统乡村社会里,对农民而言,集市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生活圈。有学者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日趋衰微的集市恢复其社会功能,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所面临的危机。^⑮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有学者强调要破解农村转型困境,必须协调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二者良性互动的镶嵌中寻求农村社区良性治理的方案。^⑯扶贫开发是当前农村治理中最为关键性的问题,其中扶贫互助组织发展出现偏离扶贫目标的“名实分离”现象,是扶贫开发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困境,有学者就此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⑰

七、组织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

组织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已然成为近年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就组织社会学来说,有研究表明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

存在较大张力,这是造成扶贫互助社“名实分离”的深层原因,地方政府应将扶贫互助社纳入科层体系加以控制。^⑨有研究表明消费主义引导下的消费模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导致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的掠夺,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消费生态化是针对消费主义的弊端而提出的新的消费理念,用生态文明的理念规范人们的消费方式,倡导适度消费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⑩有学者则从符号学角度出发,研究了消费观和社会整体价值观转向的问题。^⑪有学者在婚姻文化视角下,依据加里·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探讨河南商丘地区乡土社会婚姻与家庭问题。^⑫还有学者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行研究,指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 ①郭玲.中国就近城镇化:基本内涵、存在问题与建设路径[J].改革与战略,2015,11:131-134.
- ②何泽军.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地方政府行为优化的困难与突破[J].决策探索,2015,7(下):34-35.
- ③岳红伟.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研究——基于转移再就业视角[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22-28.
- ④董晶,高畅,张少凯,李玲,张宁,郭正磊.河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5,35:258-263.
- ⑤王娟.基于村民满意度的城中村改造评价——以郑州市1425份村民调查样本为例[J].规划师,2015,S2:268-271.
- ⑥宋丽娜.“重返光棍”与农村婚姻市场的再变革[J].中国青年研究,2015,11:84-90.
- ⑦朱磊,雷洪.论农民工的分类及其转型[J].社会学评论,2015,5:78-87.
- ⑧蒋占峰,王永亮.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提高农民工收入研究[J].青年学报,2015,1:49-52.
- ⑨沈洁.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郑州市为例[J].青年学报,2015,1:43-48. am
- ⑩康绍霞.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调查分析——以河南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5,16:118-119.
- ⑪周福林.中部地区人口流动家庭化和社会融合状况研究——以河南为例[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0:6-11.
- ⑫赵排风,王可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J].河南农业,2015,1(下):12-13.
- ⑬王萌.收入,消费与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河南省的调查分析[J].青年学报,2015,1:53-56. am
- ⑭高中建.市民化:解决农民工收入、消费问题的路径选择[J].青年学报,2015,1:57-62.
- ⑮高中建,陈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条件与过程[J].中州学刊,2015,8:74-78.
- ⑯刘二鹏,高中建,乐章.从乡土倚重到社会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转向[J].人口与社会,2015,3:59-66.
- ⑰郭玲.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探讨——以河南省为例[J].中州学刊,2015,2:86-90.
- ⑱李微.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问题浅析[J].决策与探索,2015,10(下):35-36.
- ⑲穆建亚.返乡农民工子女农村社会融入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2015,8:72-74.
- ⑳刘伟.社会工作介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6:82-85.
- ㉑徐京波.临时夫妻:社会结构转型中的越轨行为——基于上海服务业农民工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15,1:55-59.
- ㉒赵排风.健全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问题研究[J].学理论,2015,4:133-135.
- ㉓李建玲.留守妇女社会服务之思考[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63-65.
- ㉔蒋占峰,代伟杰.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的社会工作构建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7:206-207.
- ㉕朱开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探究[J].学周刊,2015,1:220-221.
- ㉖苑国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积极福

利”的启示[J]. 绥化学院学报, 2015, 11: 1-3.

②⑦“河南省养老服务需求基线调查”课题组. 构建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养老服务体系——以河南省五地市为例[J]. 社会工作, 2015, 2: 71-86.

②⑧王红艳. 中国农村养老方式的演变及应对措施[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5, 4: 94-97.

②⑨张歌. 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政策效果分析——以上海为例[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 75-82.

③⑩张晨寒, 牛乐政. 河南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探索——以郑州市郑纺机社区为例[J]. 社会福利, 2015, 2: 59-63.

③⑪冯庆林. 探讨“失独”家庭养老服务社会支持体系的合理建构[J]. 社会福利, 2015, 11: 34-38.

③⑫李伟. 关于机构养老的认识误区、理性原则及完善对策[J]. 城市问题, 2015, 1: 67-74.

③⑬李伟. 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河南省X县为例[J]. 理论月刊, 2015, 8: 148-153.

③⑭茹洁. 探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J]. 才智, 2015, 17: 356.

③⑮茹洁. 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5, 12: 220.

③⑯苑国华. 制度、主体与行动——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探析[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 4-7.

③⑰秦永超. 福祉、福利与社会福利的概念内涵及关系辨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15, 9: 112-116.

③⑱栗志强. 错位: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机构需求”与“高校培养”——基于郑州市的研究[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5, 6: 66-70.

③⑲康绍霞.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困境与反思——以郑州轻工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为例[J]. 农业网络信息, 2015, 3: 128-130.

④⑩杨柳. 社会工作者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 人民论坛, 2015, 1(中): 154-156.

④⑪运奕帆, 运乃东. 优势视角下民族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以河南省郑州市B清真寺及其

周边民族社区为例[J]. 赤子, 2015, 19: 217-218.

④⑫张明锁, 张慧颖, 郑玉英. 志愿服务成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J]. 青年探索, 2015, 3: 29-35.

④⑬纪文晓. 从西方引介到本土发展: 家庭抗逆力研究述评[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 29-41.

④⑭纪文晓. 养育罕见病儿童的青年家庭抗逆力分析[J]. 青年研究, 2015, 5: 69-77. PHamPHam

④⑮行红芳. 残疾儿童融合教育的实施困境与发展策略[J]. 中州学刊, 2015, 11: 87-90.

④⑯殷轲.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的基本问题辨析[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5, 2: 107-109.

④⑰杜利娜, 蒋美华.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问题的社会学审视——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数据分析[J]. 学海, 2015, 5: 39-43.

④⑱赵明, 高中建. 我国“80后”青年的社会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5, 5: 120-123.

④⑲高中建, 陈丽莉. 制度文化视角下的青年政治信任建构[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5, 3: 20-21.

⑤⑩王伟玲. 试论社会治理的内涵与意义[J]. 长江丛刊·文学艺术及文化, 2015, (12): 106-107.

⑤⑪殷轲. “协同治理”与社会事业开放[J]. 中州学刊, 2015, (8): 65-68.

⑤⑫纪德尚. 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5, (2): 69-72.

⑤⑬杨军剑.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协商刍议[J]. 河南社会科学, 2015, (2): 32-35.

⑤⑭孙寅生. 论社会发展的协同机制[J]. 求实, 2015, (1): 62-69.

⑤⑮邹慧君.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治理方式创新若干问题探析[J]. 行政与管理, 2015, (5): 37-40.

⑤⑯蔡清伟. 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研究[J].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6): 43-35.

⑤⑰祁海军.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以河南省为例[J]. 学习论坛, 2015, (8): 73-77.

⑤⑱殷轲.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探析

[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5, (4): 76-79.

⑤⑨韩恒. 多层次功能替代: 政府治理基督教的策略分析[J]. 宗教社会学, 2015, (第三辑): 265-282.

⑥⑩韩洪涛, 高娟. 试论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创新[J]. 学习论坛, 2015, (7): 12-14.

⑥⑪杨晓季. 社会治理创新下的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J]. 商, 2015, (37): 54.

⑥⑫宋芙晖.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优化研究——以郑州市为例[J]. 领导科学, 2015, (23): 56-57.

⑥⑬孔娜娜. 网格中的微自治: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J]. 社会主义研究, 2015, (4): 90-96.

⑥⑭蔡清伟. 倒逼与深化: 中共农村社会治理模式选择变迁的逻辑分析[J]. 理论观察, 2015, (5): 47-48.

⑥⑮蔡清伟.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社会管制的镜像分析及其现实启示——基于中共对“阶级斗争”认识的视角[J]. 理论观察, 2015, (3): 77-78.

⑥⑯李小妹. 农村社会协同治理运行机制的整合创新与逻辑建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 53-57.

⑥⑰王小军. 农村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以河南省兰考县农民合作社为例[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5, (1): 16-18.

⑥⑱于波. 农村社区研究回顾与变迁分析——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分析[J]. 创新科技, 2015, (12): 26-29.

⑥⑲纪德尚. 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问题研究[J]. 社会建设, 2015, (1): 60-67.

⑦①杨国平. 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与社会组织的发展[J]. 公共治理, 2015, (2): 53-55.

⑦②郭风英.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与困境[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5, (4): 156-160.

⑦③陈俊豪.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路径与协同创新机制建构[J].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 59-62.

⑦④高芙蓉.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研究综述[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 41-47.

⑦⑤徐京波. 传统庙会与农民闲暇生活方式——以胶东 P 市为例[J]. 民俗研究, 2015, (4): 141-147.

⑦⑥周全德.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妇女发展的理性思考[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5, (3): 1-4.

⑦⑦顾绍梅. 我国社会利益矛盾呈现新态势新趋势[J]. 宁夏社会科学, 2015, (6): 61-65.

⑦⑧原鹏. 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负效应及社会风险[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5, (3): 46-49.

⑦⑨程昆. 论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的完善与创新[J]. 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 2015, (6): 105-124.

⑦⑩刘洋.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妇女家庭暴力问题介入对策分析[J]. 法治与社会, 2015, (30): 158-159.

⑦⑪蒋占峰, 董现聪. 社会稳定视角下弱势心态泛化现象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5, (11): 167-171.

⑦⑫陈冬仿. 社会转型中基层社会矛盾的成因与化解途径[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5, (1): 88-90.

⑦⑬薛君. 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的“80后”生育意愿[J]. 当代青年研究, 2015, (6): 92-95.

⑦⑭姜士伟.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与社会管理创新[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5, (3): 58-61.

⑦⑮殷轲. 网络舆情事件的特点及治理之道——基于 2014 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的分析[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5, (4): 60-65.

⑦⑯张侃. 网络突发事件的产生与应对[J]. 重庆社会科学, 2015, (6): 67-73.

⑦⑰杜小峥. 网络政治空间意见领袖的影响分析[J].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1): 73-76.

⑦⑱石方军, 张应阳. 农民土地意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5, (5): 31-36.

⑦⑲蒋占峰, 张应阳. 农民土地意识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河南省的实证研究[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6): 718-723.

⑦⑳郭少华.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风险研究[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5, (1): 61-64.

⑨⑩吕化周. 农民土地承包权: 农民社会保障长效机制的核心[J]. 开发研究, 2015, (4): 169-172.

⑨⑪吕化周.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构建农民社会保障长效机制[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2015, (3): 36-41.

⑨⑫张颖举, 吴一平. 已建新型农村社区农民入住意愿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6): 59-66.

⑨⑬刘军奎. 农民观念与行为变化的民族性透视——基于对甘肃省东南部 L 村的考察[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 (4): 71-83. PHam.

⑨⑭宋丽娜. 乡村社会的性: 一种有缺口的禁忌[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5, (2): 52-56.

⑨⑮侯金超.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现象研究[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 87-91.

⑨⑯徐京波. 集市: 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以胶东 P 市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 43-47.

⑨⑰聂飞.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现状检视及构建进路[J]. 理论导刊, 2015, (7): 74-89.

⑨⑱陆汉文, 岳要鹏. 社会化生计视角下扶贫互助组织“名实分离”现象及其生成逻辑——以川东 Z 村扶贫互助社为例[J]. 学术论坛, 2015, (3): 97-103.

⑨⑲陆汉文, 岳要鹏. 政农关系视角下扶贫合作组织名实分离的过程与逻辑——基于 Y 县扶贫互助社的分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 (4): 38-42.

⑨⑳徐京波. 从消费主义到消费生态化: 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建构路径[J]. 学习论坛, 2015, (12): 62-65.

⑨㉑闫文君. 论消费社会的能指漂移与价值观转向[J]. 贵州社会科学, 2015, (8): 10-15.

⑨㉒宋烨. 婚姻文化视角下的河南商丘地区乡土社会婚姻与家庭问题研究——加里·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J]. 品牌, 2015, (10): 259-260.

(作者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管理学

2015 年度河南省管理学研究综述

翟运开

所谓管理,是指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活动,是他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管理学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需要产生的,它的实质是探求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管理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河南经济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正在实现由以传统农业为经济主体向以新型工业为经济主体的重大转变。河南目前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五大经济体,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社会程度迅速提高,市场不断扩大,企业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以适应新的经营环境。正确的认识和审视管理学的发展趋势,解决管理学理论基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河南省管理学的完善与发展,对于更好的把握机遇,实现河南经济的新腾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中国知网文献总库为数据来源,通过文献搜索和翻阅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主要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方面介绍分析 2015 年度河南省管理学界的研究动态。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管理学的基础性学科,研究领域包括管理科学、工业工程、工程管理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在近几年的发展中,相关的研究深度不断深入,研究内容也不断细化,研究成果丰盛。2015 年度我省管理学科与工程学术研究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省内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及专

家在该领域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多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管理科学发展态势与主要研究成果

管理科学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在 2015 年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创新能力提升、高速公路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医院管理等。方晓波通过分析实地调研和统计年鉴的数据,指出了高新区企业比例小、外向程度低、研发投入不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规模小、政府投入少、服务能力较弱等河南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建设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促进产业技术联盟,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建设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促产业技术联盟,推动协同创新发展;培育创新性服务机构发展,提高对企业的服务能力;创新机制体制,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提升高新区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何亚辉在分析河南省高速公路货车运行情况和现有货车通行计费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高速公路上货车行驶时长分布,分析了河南省高速公路上货车收费适宜的优惠时长和优惠时段;通过货车在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上运输成本的分析,提出了基于高速公路通行能力的错时收费费率及可实施错时收费的路段。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郭敬以河南省 18 个地市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层模糊综合评价理论,对河南省公共服务满意度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建

议。目前,我国处于教改和医改的关键时期,如何通过院校教育和毕业后继续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来提高临床医生的岗位胜任力,是当前医学教育工作者比较关心的问题,白国强对如何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二) 工程管理发展态势与主要研究成果

工程管理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完善,2015 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程风险管理、工程建设管理等方面。

卢一心在文章中运用了全过程理论体系进行了风险的识别、风险的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对策和风险监控措施,拜访了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经理及相关人员,获得了第一手案例资料,运用改进的未确知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开展了全过程的多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靳轲等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窗口模型对河南省农村基础设施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现阶段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政策的方向应该逐步细分;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饱和的地市,应把重点放在管护措施和整体协调运作方面,提高农田水利设施的利用率;对于基础设施还需要发展的地市,应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 and 建立相应的管护措施,提升农田水利设施整体协调运作水平。只有多方面结合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提高改革效率,才能提高河南省总体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绩效。

(三) 物流工程发展态势与主要研究成果

最近几年,物流工程的发展非常迅速,发展势头强盛。在 2015 年,我省学者对物流工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跨境物流的海外仓储、物流人才的建设以及我省物流业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在物流产业中,仓储在物流运作的整个过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近几年跨境电商和国际物流快递的发展,海外仓库的发展对跨境物流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鲁旭等在海外仓库的研究中发现,无论是跨境电商平台,还是国际快递物流企业,都频频在海外仓方面发力,认为外贸 B2C 正

在快速步入“海外仓库时代”。外贸 B2C 海外仓库的出现,简单地看,只是跨境 B2C 物流节点上的一个变化,但其再造的外贸流程却有非同一般的效果及市场价值。外贸 B2C 海外仓库具有再造效果,首先,突破了直邮模式的产品限制,其次,改变了一般贸易的海外渠道再次,弱化了寄售贸易的代销功能在,最后,拓展了向跨境 O2O 发展的空间。外贸 B2C 海外仓库还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可以促进外贸的品牌化发展,有助于实体企业的产品创新,同时,有助于跨境电商生态圈的建设。

物流工程的发展必然离不开人才建设,人才建设为物流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狄卫民等学者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物流人才的支撑,物流人才的培养则是高等院校的一项重要职责。目前,河南省的多数高校均已开设物流管理或物流工程专业,但它们的培养模式大同小异,尚未很好地结合自身优势定位人才培养方向,还不能高效对接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多元化物流服务需求。为此,狄卫民在分析河南省高校物流人才培养中现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物流人才培养策略,主要体现在明确目标定位,加强高校师资教学质量,提高物流人才的实践能力等。

作为中原经济大省,我省对一带一路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物流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省经济的发展速度。左江涛等结合河南省地域特点分析了河南省物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在对我国物流业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河南省物流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最后,着重对河南省物流业的发展做出了合理的展望。在分析了河南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为物流业提供无限空间的同时,也向河南省物流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河南省物流产业面临物流信息化不够全面,物流产业形态不够完善等许多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在之后的发展中,物流业要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向质集约式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调整来适应新常态。

李金峰等认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影响,而且具有随机性和灰色性,宜用灰色关联理论

来分析河南省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通过对物流因素与 GDP、经济因素与货物周转量的关联度排序得知,位于首位的指标分别为货物周转量和社会消费品总额。物流业的发展能够形成新的产业形态,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扩大物流需求,提供产业支持,促进物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并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灰色性,会随着时期的变化而改变。如固定资产投入、运输长度、货运量等也会对货物周转量产生影响,因此,要想提高河南省的整体物流水平,还需从各个方面着手努力。

(四)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发展态势与主要研究成果

2015 年度关于该领域研究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扩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系统的设计、信息管理理论研究等。

在信息系统设计方面,刘志怀等针对煤矿井下高压供电系统普遍存在漏电保护的选择性、短路保护无法可靠实现选择性、多级过电流保护时限配合难以实现及故障定位困难等问题,提出了一种煤矿井下高压电网分布式综合信息系统方案。该系统基于以井下控制器为核心的新型多级分布式 EtherCAT(Ethernet for Control Automation Technology)协议网络(主要由分布式保护信息系统与监控信息系统两部分构成),实现了各测控装置的时钟同步,具有完善的电网监控功能,可有效完成漏电保护的选择性,短路保护的选择性,多级过电流保护的时限配合及故障的快速定位与处理。测试结果表明:系统性能稳,实时性能满足监控与保护的实时性要求。王全国等对水产养殖监测的技术路线、系统设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通过利用基于 ZigBee 技术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实现水位、水温、溶解氧、PH、浊度等水体环境的信息进行自动化采集与存储的信息系统设计。通过该系统的应用必将为获取精确的水产养殖环境和水产养殖信息提供有力的支持,进一步推进当前精准农业的发展。傅文骏等提出了构建基于 B/S(Browser/Server)结构

的输水工程安全信息监测系统。该系统使用 Phalcon 高性能框架,结合地理信息,利用工程渠道沿线典型场景采集的数据,运用可视化界面对工程安全状况进行直观展示。同时系统结合数据查询、统计和对比,可有效对渠道典型场景处工程建筑做出安全评估,为输水工程安全监测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臧贺藏等基于视频监控、物联网传感器和网络通信等技术,初步设计开发了作物远程感知系统。在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该系统实现了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关键环境因子、作物长势以及视频图像等参数信息的实时采集,从而提高了获取数据的效率和准确性。它具有功耗低、成本低、扩展灵活等优点,初步试验表明了该系统的合理性与实用性。该系统的构建和运行,为作物长势进行实时跟踪监测与综合分析以及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刘晓娟等介绍了郑州市园林绿地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的过程,系统开发平台为 Map Info 公司的产品 Map X 组件,开发环境为 Microsoft 公司开发的 Visual Basic。用 Auto CAD 矢量化扫描的郑州市地图获得电子地图,加载在 Map Info 中进行管理,属性数据采用 Access 数据库,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通过关键字建立关联。实现了地图漫游、放大、缩小等基本操作,测距、查询和专题图生成等功能。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但是在大多数的高等院校一般采用的是基于 Web 端的传统信息管理模式,对于那些分散在校外进行实习的毕业生,由于不能够及时获取教师在校园网上发布的消息,因此给学校与指导教师在进行管理这些分散学生时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尚志会等为了解决这一情况而开发的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在 Android 客户端主要是使用组件来现应用程序中的所有功能。对于本系统服务器的搭建主要是采用 MVC 框架,用 Servlet 技术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并将符合的数据封装成 JSON 格式反馈给 Android 客户端。结果表明,所有的功能也都基本达到预期的效果,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及发展前景。王新刚等针对公众对于住房保障信息的需求,设计并实现了一个互联网城市住房保障数字地图系统。系统采用基于 SOA 架构的 Web GIS 技术,

集成地理数据库、Web 地图服务、RIA 等技术。详细探讨了系统功能设计、地理数据库设计和 Arc GIS 程序设计。通过 Flash Builder、Python、Java Script 等程序设计,实现了浏览器端住房保障地图制图、信息查询和更新维护等应用。时雷等以 Java 语言作为开发工具,使用 My SQL 数据库软件,运用 MVC 设计模式,建立了由信息浏览、数据查询、系统管理和信息反馈 4 个模块构成的农作物信息管理系统。系统中的数据全面且种类多样化。系统初步建成后,以河南省小麦信息数据作为管理对象,对系统的功能进行了测试和试运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信息管理理论研究方面,王宜慧指出供应链管理就是通过供应链中的信息系统,实现对供应链的数据处理、信息处理、知识处理等过程,把数据转化成信息,信息再转化成知识,最后实现企业的价值。当前供应链信息管理所研究的范围包括信息分类的研究、牛鞭效应的研究、信息失真可能引起的风险问题和信息共享等研究。闫文婧认为信息化产业革命正席卷全球,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广泛的计算机网络互联带来了新经济革命,世界正走进信息社会。各国都已深知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企业信息化就是指从企业规划或计划、生产、营销等整个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逐步提高企业集约化经营管理程度,使信息对企业的贡献达到较高水平的过程。另外,企业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基础,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 2014 年度的研究相比,我省本年度在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面。关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面,我省引入了更多的新技术应用于各个行业,如煤矿、输水工程、农作物、园林等,促进了我省信息化管理的进程。与此同时,工程管理和科学的管理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延续之前的研究方向。而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领域,我省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经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总结,以期能为我省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可借鉴之处,为今后的研究工作起到很好

的指导作用。

二、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与时代化的管理理念对企业以及其它盈利组织的发展进行经营决策,并与盈利组织能否长久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工商管理是组织日常工作活动、对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技术经济管理等组织内部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也是降低资源浪费、提高组织经济效益、提升组织的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随着对外开放的范围越来越广,河南省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省内各种类型企业发展势头迅猛。企业的各项管理内容具体包含了企业内部的发展运营管理、财务核算、人力资源以及发展战略和技术运营管理等。当然还有具体的项目发展管理,并且也直接包含了对企业软性发展的建设层面,像企业文化、社会文化获得等等。不过,通常工商管理的形式都是直接通过日常运营过程中的数据开展更为科学和有效的分析来进行,从而以此来真正保障企业本身能够向明确的方向发展,同时在整个过程中,也需要结合相应的针对性措施,来促使企业方面能够获得更加迅速、便捷的发展目标。在此时期,如何加强企业管理以保障河南经济的发展质量是今后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2015 年度,省内各单位也相继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

在企业管理方面,雷真指出企业必须利用多种方法对企业经济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此来获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他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制度不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不科学、企业组织缺乏灵活性等企业经理管理模式普遍存在的具体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企业管理理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刘焕洲提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企业的运营和管理决策构成了巨大冲击。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企业的决策树发生变化,大数据是继云计算技术发展后的又一项技术创新。其收集、存储和分析

处理数据的能力非常强大,对企业的管理决策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在财务管理方面,张小兰认为如何更好的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当中的风险进行预判,尽可能的对中小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的认识,并且提出相应的防范和解决措施,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将针对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现状进行分析,并且在财务管理制度、人员素质、财务管理经验、风险预警系统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孙平从企业自身发展出发,介绍了全面预算管理与企业内部控制的相互作用、相互协同的关系,并指出全面预算管理可以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有利于企业内部制度控制的实施,帮助企业规避风险,使企业业绩实现量化,促使企业实现战略目标。

在人力资源方面,韩海军指出随着现代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薪酬体系建立与健全中,应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并将其作为今后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战略管理和发展的重要课题。他主要对绩效薪酬比重较少、薪酬和考核没有密切联系、单位薪酬存在激励问题等现代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的概况、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薪酬体系的建立与健全、绩效工资制度、激励作用的发挥方面的措施。王文政提出:企业员工培训应力避三个误区:①不能期望通过一个宏大的培训计划的实施而毕其功于一役;②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追求培训内容与形式的高精尖大;③不能脱离相关因素而单一要求培训效果立竿见影。企业员工培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时期培训形成的员工素质静态标高,不可能适应企业快速发展与员工个人职业生涯上升的动态要求。孙朝晖,赵凌霄通过构建人力资源部门绩效考核理论模型,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应对平衡计分卡考核体系构建进行详细探讨,为了保证人力资源管理评定指标分配的权重更加贴近实际,准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探讨,以期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提供参考。更多还原。

三、图书馆、情报学与档案管理

作为管理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河南省在图

书馆、情报学与档案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2015年度,河南省各单位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共有80余篇,其中关于图书馆学的有55篇,关于情报学的有14篇,关于档案学的有12篇,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河南省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管理领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学的研究是2015年度的研究热点之一,研究范围广泛,对于图书馆管理、图书馆联盟建设和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管理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 关于图书馆管理的研究

图书馆管理是将图书馆的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地配置,使图书馆的日常工作能够井然有序的开展。对于图书馆管理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图书馆服务,研究的方向主要有图书馆的服务模式、读者违规的处理方式和针对特殊人群的服务方式。任红娟对一种新兴的阅读模式——真人图书馆,与图书馆的关联关系、图书馆的差异、图书馆服务对接的条件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杨丽萍对高校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认为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在用户需求上存在不足,因此提出了移动图书馆服务导航系统及复合型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以期为我国移动图书馆发展在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客户端利用需求方面提供参考。张婷婷分析了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的表现形式,阐述了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用户需求所展现出的主要特征,进一步提出了应对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用户的相关原则和对策,最后,对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服务模式做了初步的研究。苏杰对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创新应用措施进行了分析。李娟认为现有的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供给研究成果对于培育社会公共图书馆服务意识、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供给机制都产生着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政府服务转型的不断深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不断完善,图书馆服务供给中的社会力量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相应研究成果也将更具现实指导意义。娄亚奇从研究方法、服务模式和实践等方面对我国手机图书馆的研

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手机图书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魏虹分析了我国全民阅读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原因,阐述了公共图书馆在推广全民阅读中的作用,对公共图书馆推广全民阅读的服务模式进行了探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推广策略,以期为提高人们的阅读水平和综合素质提供借鉴。郭玮对“泛在化”模式在图书馆中的现状以及发展策略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以求对图书馆建立信息平台资源的共享服务提供一定的帮助。林锦钊从高校图书馆开展学校课题服务的过程进行分析,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当前开展课题研究的特点,分析了图书馆在为科研课题组提供课题研究服务的作用和服务模式以及传统服务模式的缺陷和困难,提出了采用图书馆员加入课题组全程服务的嵌入式课题服务模式,全面深入地为主题研究提供专业的信息服务模式。张庆伟在分析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现状基础上,以鹤壁市图书馆服务工作为例,从贴心服务、基层服务、网络服务、特殊服务、特色服务、文化服务及提升服务水平等方面构建多维度的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潘霞分析了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服务工作的发展趋势、服务工作的对策,并以洛阳市图书馆为例,探讨当前公共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对文献用户的服务工作。

对于图书馆技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数字图书馆技术、物联网技术和RFID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探讨。王雅睿认为数字图书馆是当前资料信息共享的重要形式,得益于数据资源和服务优势,因此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道路上,壮大这两项优势就成为主要选择。而编制联机编目中心无疑是实现这一选择的主要方式。高真探讨了RFID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发展状况,并指出RFID技术改进了图书馆传统的工作方式,具有自助借还、方便读者定位图书等优点。在享受该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其同样也存在费用、不稳定等一些弊端,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未来图书馆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刘红霞从物联网技术基础出发,分析了物联网技术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物联网技术在图书资料管理中应用的必要性,并对物联网应用于图书馆的结构体

系进行研究,最后对现有技术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王昶分析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的特点,总结了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及实现的策略,希望以此加快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图书馆数据库,研究的方向有数据库的维护、数据库的版权、数据库的建设等内容。张振吉认为数字化是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总趋势,数据库的建设与维护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图书馆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的重要方面。高峰认为在公共文化机构存在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开放存取数据库、自建数据库和商业数据库,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它们分别涉及不同的版权问题。图书馆需要规划好资源整合的版权策略,包括强化版权意识,注意保护被整合的数据库的知识产权;充分利用版权例外,最大限度实现资源整合;加强与数据库商的协商,利用约定许可规避整合的版权风险;加强版权法规建设,赋予公共文化机构更多权利以利资源整合;在整合中注意保护自身数据库资源的知识产权等,从而推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徐翠艳以纳米新材料数据开发共享平台为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行业数据库的建设背景、建设意义、建设步骤,为以后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丁岚总结了目前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的建设现状和问题,问题主要包括:①数据库建设缺乏统一领导,重复建设现象严重;②数据库向社会开放度小,利用率低;③数据库检索方法单一;④数据库缺乏特色且建设具有盲目性。针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本文对高校图书馆数据库建设提出了措施和建议。

对于图书馆形象,研究的方向主要有图书馆形象塑造等方面。王建红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无论是社会 and 高校,都对图书馆提出了塑造外部形象和内部形象的新要求,其中内部形象的塑造更为重要。张鹏[®]介绍了图书馆形象及其作用,并通过对图书馆形象的塑造路径和传播途径的分析,探讨了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的方法。认为图书馆应以形象塑造为基础,吸引更多公

众关注和利用图书馆资源,在全社会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对于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的主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等。薛岩认为文献资源共享和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平衡是现代图书馆建设过程中要注重的问題,一方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兼顾公众的利益。只有合法合理地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各种侵权行为,才能激发知识生产者的创造热情,创造出更多的智力成果,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吉宇宽指出在云服务交易模式下,图书馆失去了与云服务商平等协商购买资源的权利,更不可能复制作品和永久保存数据库等汇编作品,其文献信息服务将受到限制和威胁。阻止作品在线交易中以“接触权”替代“复制权”、构建“先租后购”作品交易模式,是保障图书馆信息资源永久收藏的可行选择。

对于图书馆文化建设,王钱林认为高校图书馆的文化建设必须走大众化之路,才能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步调一致。并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高校图书馆如何实现化大众,提供了整合图书馆的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之转型、文化建设的多样性等三种路径。李一男对图书馆文化的内涵以及建设图书馆的意义进行了介绍,并对当前我国在图书馆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李春红探讨了新技术条件下尤其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合法性危机与图书馆的功能拓展问题,指出高品质与创新型的图书馆文化建设是图书馆突破传统模式谋求功能拓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周海霞阐述了大学文化建设的内涵,探讨了高校图书馆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参与大学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对于图书馆史的研究,原小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60余年,中国的图书馆史料汇编,代表了当代国内图书馆史料整理的主要成就,也反映了国内图书馆史的研究状况。大体而言,我国当代的图书馆史料汇编经历了“文革”前的初步发展、“文革”时期和80年代的顿挫与恢复、1990年以来的较大发展

三个阶段。中国图书馆史料整理与图书馆史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应该引起学界重视,推进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图书馆史料汇编,其中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2. 关于图书馆联盟建设的研究

图书馆联盟是将联盟内各成员图书馆资源集中起来并实现共享,各成员能够获得资源援助从而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同时也可以将自身的优势资源共享出去。孙婉从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在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区域发展不均衡、人员素质偏低以及资金的短缺等因素影响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的发展。袁红霏以郑州龙子湖高校园区为例,主张通过集团采购等方式降低文献信息资源的采购成本,协调各馆的馆藏学科门类,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方式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从整合馆藏资源、降低资源采购成本等方面对龙子湖园区内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的必要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构建龙子湖高校园区图书馆联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胡海鹰以河南省图书馆为例,以公共文化服务为视角,从规划设计、服务合作、数据共享、平台搭建等多个方面,就图书馆联盟建设进行了实践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可行对策。张晓桦主张异质性图书馆联盟是改变社区文化服务低水平的最佳路径,而协同是促进异质性图书馆联盟可持续发展、实现高水平社区文化服务的有效机制,并通过界定目标和利益两个核心变量,解构了复杂的联盟协同理论,并依据目标冲突、一致和利益分离、耦合不同组合形成4种协同路径,为社区文化服务中异质性图书馆联盟的协同设计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但是,在组建图书馆联盟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系统地研究找到解决的办法。马育敏主张在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中,要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加强内部协调、加强统一平台建设,以促进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侯爱花认为在联盟过程中知识产权共享以及知识专有性之间的冲突,对运作和持续发展图书馆联盟造成了阻碍,冲突主要体现在图书馆联盟组建时期与外部环境的

冲突,联盟运行时期的知识产权标准和资源投入程度的冲突,以及联盟结束时期的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的冲突,分析此类冲突以制定相关策略。孟祥凤通过介绍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联盟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手段,提出图书馆联盟建设数字资源共享平台的必要性,并从共享平台服务架构、体系结构、资源共享模式和共享模式框架四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的方法和关键技术。南楠认为图书馆联盟的信息安全保障已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综合了技术、管理、资源、法律等多方面因素,提出了有效的信息安全规则,构建出了一个融合多种技术、具有扩展性的信息安全保障制度,为高校图书馆联盟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体系。

3. 关于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对于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研究。韩姗姗、韩迟认为数字信息存储是高校数字图书馆最理想的存储模式,数字信息检索是目前图书馆最理想的检索方式,而互联网数字技术能够促进高校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轩红分析了智慧型图书馆必须具备的特征,列举了高校图书馆如何建设智慧型图书馆的具体途径,阐述了新时期高校图书馆智慧化发展的方向。祁雨江认为数字图书馆建设需要解决定位、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等问题,以及解决数字图书馆、IT 业界“云服务”技术和数字出版业“云出版”技术的无缝对接。

对于数字图书馆中出现的问题的研究。龚义年主张针对数字技术和传统版权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立法机关根据有关理论,构建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的的基本原则,明确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设置一个新的平衡版权各方利益的合理使用制度,以确保版权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数字图书馆文化传播功能的充分发挥。周艳丽分析了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建议。李丹分析了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包括完善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健全共享法规体系、建立资金投入保障体系等解决措施。蒋丽敏对当前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进行调查,探讨我省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优化配置策略。

对于数字图书馆运行模式的研究。李云华、李新广主张个性化推荐是解决数字图书馆资源“既多又少”矛盾的有效途径,分发模式是个性化推荐研究的重要内容,并研究了数字图书馆资源个性化推荐所涉及的各种分发模式,给出了分发模式的执行流程和形式化定义,提供相应实例。马骏以美国克利夫兰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为例,分析了协作型、集中分布型和创业发展型三种创客空间的构建模式,深入分析其构建理论和应用实践,具体包括其创客空间的规划策略、建设过程、服务内容、服务评价等方面,最后从保障机制、创客文化、服务策略和人员培训 4 个方面总结克利夫兰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成功经验,以期对我国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提供参考。

对于数字图书馆的评价研究。臧振春等针对非公益类数字图书馆经济评价,通过对传统 B-S 计量模型的扩展,引入信息熵理论,并考虑多阶段循环投资的情况,运用“ $VALUE = NPV + V$ ”,对该项目价值进行计算,得到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粗略判定一个数字图书馆在初始阶段的可行性以及在运行阶段当前最优规模的确定,对传统期权计量中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在投资过程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后,臧振春等又从实物期权博弈理论出发,建立在市场不确定条件下的对称双寡头模型,通过动态博弈的逆向归纳法,求解出了企业数字图书馆项目的最佳投资时机。吴楠楠等从三标度法出发,建立优先判断矩阵,将定性定量相结合,用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促进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和完善。

对于新技术在数字图书馆的应用研究。首先,对于微平台的应用,徐黎娟分析了图书馆应用微信平台的服务模式,设计并构建了基于微信平台的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系统,在开发模式下实现系统的信息接受与回复功能,并集成热点查询、馆藏书目查询等多个服务子模块,以此让用户可以轻松获取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与服务。司姣姣分析了微时代下图书馆微服务,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

无微不至的图书馆微服务的开展,要从微做起,并为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微”策略。

然后,对于云计算在数字图书馆应用的研究。宋翠详细介绍云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自适应系统内容及形式,对关键模块进行了详细阐述,并运用实例仿真,验证方法在数字图书馆智能化及个性化服务的性能表现。郑燕从云计算技术应用在个人数字图书馆上的优势和特点出发,分析讨论了基于云计算的个人数字图书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从行业组建云计算中心、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完善技术以及健全法律规范等方面来解决个人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困境。吉宇宽认为由云服务商提供的基于临时复制的“接触权”替代“复制权”的信息交易模式,剥夺了图书馆及公众信息消费者的信息选择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只有限制“临时复制”纳入“复制权”范畴、以法律规制与政策来保障图书馆的信息选择权、以集体管理组织对作品的质量和交易过程进行监督与管理,我国才能有效保障图书馆的信息消费权益。

最后,对于其他技术在数字图书馆的应用研究。尹玲敏针对 RFID 技术系统存在隐私风险的问题,以美国的应对策略为例,包括图书馆本身的自律机制建设、制定图书馆行业性的隐私政策指南,以及对 RFID 在图书馆应用涉及的隐私权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立法等,以指导我国图书馆的 RFID 实践应用。董迎霜认为虚拟现实技术和数字图书馆相结合的方式,是未来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方向,介绍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作用,其应用可使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更加多元化、使参考咨询服务更加快捷并能实现用户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二)情报学的研究

本年度情报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关服务与工作人员素质研究,文献的被引用情况分析等方面。

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周首领运用 CiteSpace 软件和文献计量的方法,在医 CNKI 数据库中以来源期刊检索为情报理论与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和情报科学的检索策略进行精确检索,收纳 2011 年至 2015 年共 8017 条数据,

剔除会议通知、征稿和报告类非学数学论文,得到 7207 篇有效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为情报学研究的切入点和重点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周惠来等根据河南省促进“三化”融合,加速推进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建设河南省产业竞争情报服务平台。通过“政产学研”协同,将人力和智力资源共享,创新情报服务方式和理念,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对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盖双双选取期刊引证报告(社会科学版)中 2004—2013 年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领域影响因子排名进入前 10 位的 22 种期刊为数据来源,分析了我国近 10 年高影响力图情研究论文的年代分布、作者分布、机构分布、国际合作和基金资助机构分布等文献计量学特征,结合前后 5 年和近 3 年我国高影响力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产出数量的对比分析,揭示了近 10 年我国高影响力图情研究论文产出的国际地位的变化。

相关服务与工作人员素质研究方面,刘燕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搞笑图书馆科技查新的发展现状,阐述了查新人员综合素质(包括信息知识、专业素养、情报分析能力和职业道德修养)对查新质量的影响,提出应通过参与学术会议与信息数据资源建设,培养查新团队意识及职业道德,提高科技查新人员的综合素养。丰锐从年度查新量、查新目的、查新范围、查新委托月份、查新项目所属学科、委托单位地域分布等方面对河南省医学情报研究所 2005—2014 年查新项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查新工作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提高查新服务能力,延伸查新服务内容及使查新更好地为科研服务提出建议。

相关文献的被引用情况分析方面,赵霞以 2012 年《中国图书馆学报》所载学术论文为研究样本,运用栏目、载文量、作者合作情况及作者时间序列和空间频度等文献计量学统计指标对该刊进行统计分析与评价。甄戌兰以 web of science 平台下 SCI-E 数据库为文献来源,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从论文的年收录量、合作的国家和机构、学科分布、作者分布、来源期刊及基金资助机构等方面,对 SCI-E 收录的河南大学 2005—2014 年的学术论

文进行统计分析。方红玲对 SSCI 收录所有图书情报类期刊 2011—2012 年发表的 NCD 进行统计,并进一步统计各类型 NCD 在 2013 年的被引量,探讨 SSCI 收录图书情报类期刊 NCD 的印证特征及其意义。盛丽娜以 JCR 网络版为基础,对比分析 2011 年和 2012 年 SSCI 收录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期刊各文献计量学指标情况,并进一步对 2012 年 SSCI 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 85 种期刊各文献计量学指标作详细的分析和探讨。钟镇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08—2012 年的数据,借助观测值与期望值相比较的 r 指标与改进的 salton 指数等指标,分析了河南省内 18 地市间高层次科学合作特点。赵元斌采用定标比超方法确定优势和潜力学科的定标标准,并利用 ESI 和 SCIE 数据库对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的优势学科和潜力学科发展趋势进行实证分析,挖掘潜力学科的绩效评价方法和流程。付中静^⑨选择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合 WOS 数据库和 CNKI 数据库收录的眼科学合作基金论文作为研究对象,从合作类型、基金资助项目类型和地区分布等角度,对我国眼科学领域的合作基金论文和两个数据库中的分布特点进行对比分析。王炳立以 SCI-EXPANDED、SSCI 和 CPCI-SSH 数据库 2003—2014 年 1556 篇研究性文献为数据源,对反映大数据宏观研究态势的基本文献计量学指标进行简要概述,并采用可视化分析技术从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角度对大数据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研究演进、趋势进行了分析。温芳芳以 SSCI 和 CSSCI 论文作为样本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及可视化工具,对中外情报学合作网络进行直观展示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情报合作模式的差异,为业界学者选择合作研究对象与模式提供参考。

(三) 档案管理学的研究

2015 年度档案学的研究延续了上一年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档案的信息化、网络化研究,相关法律法规研究等方面。

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李冉冉通过统计 1997—2013 年我国档案馆文化功能的研究成果,从档案的文化性质与档案馆文化功能的关系、

档案馆文化功能的内容、档案馆文化功能的特点以及我国档案馆文化功能的发展现状和对策等 5 个方面对我国档案馆文化功能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价。陈忠海以 2010—2014 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刊载论文为样本,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研究方法应用频次、应用时间分布和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耦合状况三方面揭示科学方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状况,并从中发现档案学研究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和不足,提出相应的建议。张晓培以 CNKI 为样本池,以题名为检索项的检索样本进行计量分析,总结出档案局人员编制、内设机构与智能配置相关文献研究的特点,提出这种情况应当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与重视。陈忠海指出档案信息资源的有序化工作,不能等同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而应将其理解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准备工作,它强调社会需求与用户的实际利用动机和利用行为对运用档案馆档案信息资源的作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既包括对档案信息的获取、组织、加工和利用等一般形式,也包括利用档案信息生产新信息、新知识或新理论等高级形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不仅是档案价值实现的条件,而且是档案价值实现的一种形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主体应是档案价值实现的主体。以此为基础,通过理论推导、范式分析和模型论证,论证了档案馆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发挥的主要是基础性作用,用户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发挥的是主体性作用。

对于档案管理信息化、网络化的研究中,石华介绍了关联数据概念,提出了基于关联数据的语义数字档案馆概念,并设计了语义数字档案馆的框架,该框架具有四个层次:数据发布层、数据网、数据存取整合保存层和应用层。其核心是用 RDF 三元组替换档案数据库,将传统的档案数据发布为关联档案数据,实现档案数据的共享、扩展和重用。陈忠海对香港地区八所高校的档案网站建设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总结出网站的特点,提出以下建议:采用中英文界面,方便国际交流;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协同创新;因校制宜,多种多样,突出共享。轩红研究了电子档案的特征和电子档案管理的难点,

并介绍了数字档案方面的新技术,满足电子档案的保存、提取、收录、检索等需求。姬荣伟就网上档案展览服务于“城市记忆工程”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 SWOT 分析,为档案部门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提供策略参考。

对于档案学相关的法律法规研究方面,陈忠海^[9]指出档案行政指导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主要有依功能、依方式及相对人是否特定、依有无具体法律依据、依是否应相对人要求、依行政指导主体与相对人关系、依行政指导行为的救济、依行政指导的层次、依行政指导是否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定形式和依行政作用领域等划分方式。这些分类方法既是相对的,也存在一定的相容与交叉。不同的角度划分和阐释,便于我们对档案行政指导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张珊指出《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公布实施对企业档案利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后,企业档案信息的社会利用不再由企业自己说了算;企业档案向社会提供利用是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企业未如期公示年度报告或公示信息不实的将被列入“黑名单”。可见,企业档案向社会提供利用将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陈忠海从档案立法、档案执法、档案司法和档案守法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档案行政管理机关需落实有法可依,执法必严。郭娜通过分析档案管理相关的法律规章,对我国现存少数民族档案管理的现状做出评价。

结语

综上所述,河南省各单位学者 2015 年度对省内管理学各个领域做出了比较清晰、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不难看出,河南省关于管理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研究涵盖范围广。我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管理学进行探究,涵盖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图书馆、情报学与档案管理等,对不同领域做了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二,突出热点问题。学者们结合 2015 年度河南省的发展形势,对管理学中物流工程、企业管理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符合河南省目前和

今后发展的形势和趋势。尽管 2015 年度河南省管理学研究成果丰硕,但是研究方法上过多使用定性方法,缺乏定量分析,不能够客观地反映具体存在的问题。关于未来河南省管理学的建设发展,我们应该保持现有的优势,克服自身的不足,不断丰富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同时为管理学的发展培养储备人才。

参考文献:

- ①方晓波. 河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 创新科技, 2015, 10.
- ②何亚辉. 河南省高速公路货车通行精细化收费政策研究[J]. 公路与汽运, 2015, 06.
- ③郭敬. 河南省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研究[J]. 河南科学, 2015, 11.
- ④白国强. 河南省年轻医生岗位胜任力现状分析[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5, 12.
- ⑤卢一心. 基于全过程的多项目工程风险管理研究[J]. 青岛科技大学, 2015, 05.
- ⑥靳轲. 基于 DEA 方法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政策绩效分析[J]. 水利发展研究, 2015, 09.
- ⑦鲁旭. 外贸 B2C 海外仓的流程再造效果与市场价值[J]. 对外经贸实务, 2015, 11.
- ⑧狄卫民. 河南省高校物流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J]. 物流科技, 2015, 07.
- ⑨左江涛. 河南省物流发展的现状研究[J]. BUSINESS, 2015, 23.
- ⑩李金峰. 河南省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度分析[J]. BUSINESS, 2015, 26.
- ⑪刘志怀, 刘学斌. 煤矿井下高压电网分布式综合信息系统设计[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34), 02: 253 - 257.
- ⑫王全国, 李君茹. 基于农业物联网的水产养殖监测系统研究[J]. 科技视界, 2015: 319 - 322.
- ⑬傅文骏, 张瞳. 基于 B/S 结构的输水工程安全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J]. 工程管理, 2015: 57 - 60.
- ⑭臧贺藏, 陈光磊, 张杰, 胡峰, 冯晓, 李国强, 王来刚, 郑国清.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作物远程感知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5,

17(6):50-56.

⑮刘晓娟,栗燕,杨玉珍,曲金柱.郑州市绿地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J].福建林业科技,2015(42),04:177-181.

⑯尚志会,等.基于Android平台的高校毕业设计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湖北大学学报,2015(33),04:402-405.

⑰王新刚,孔云峰.城市住房保障数字地图系统设计与实现[J].地理空间信息,2015(13),06:164-167.

⑱时雷,张家耀,钱诚,郭伟,马新明,赵晓莉.基于Web的农作物信息管理系统构建与应用[J].河南农业科学,2015,44(3):152-155.

⑲王宜慧.供应链信息管理研究现状及展望[J].2015.

⑳闫文婧.我国大型企业信息化及信息管理[J].河南科技,2015,08:26-27.

㉑雷真.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分析[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5,01:167-168.

㉒刘焕州.大数据时代企业管理决策发展的探究[J].北方经贸,2015,03:167-168.

㉓张小兰.中小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东方企业文化,2015,02:159-161.

㉔孙平.试论全面预算管理在企业内部控制中的重要作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05:24-148.

㉕韩海军.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现状及有效措施的探究[J].经济师,2015,05:227-231.

㉖王文政.新形势企业员工培训需要注意的问题[J].企业导报,2015,02:122-116.

㉗孙朝晖,赵凌霄.人力资源部门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体系构建[J].经济研究导刊,2015,14:286-287.

㉘任红娟.真人图书馆在我国图书馆服务中的适用性研究[J].图书馆,2015,(1):81-84.

㉙杨莉萍.高校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7):70-72.

③⑩张婷婷.网络环境下创新图书馆服务模式的

初探[J].科技视界,2015,(9):141,174.

③⑪苏杰.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服务模式创新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35(12):100-102.

③⑫李娟.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图书馆服务供给模式研究综述[J].图书馆,2015,(3):66-71.

③⑬姜亚奇.我国手机图书馆研究综述[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5,(12):159-161.

③⑭魏虹.公共图书馆推广全民阅读的服务模式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1):34-35,97.

③⑮郭玮.基于无线网络的图书馆泛在化创新服务模式研究[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2):109-110.

③⑯林锦钊.应用型本科图书馆嵌入式课题服务模式探讨[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35(11):64-66.

③⑰张庆伟.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探讨——以鹤壁市图书馆服务工作为例[J].农业网络信息,2015,(4):100-103.

③⑱潘霞.论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变化——以洛阳市图书馆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1(4):187-188.

[39]王雅睿.数字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的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5,24:15-17.

④⑰高真.RFID技术在河南地区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以郑州师范学院为例[J].山东工业技术,2015,(11):266-267.

④⑱刘红霞.物联网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J].河南科技,2015,(14):4-6.

④⑲王昶.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图书馆信息共享服务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1):127-129.

④⑳张振吉.浅析图书馆数据库的建设与维护[J].科技与创新,2015,(3):50-50,53.

④㉑高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的数据库版权问题[J].图书馆,2015,(9):11-16.

④㉒徐翠艳.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行业数据库建设研究?——以纳米新材料数据开发共享平台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9):71-72.

④㉓丁岚.网络环境下高等院校图书馆数据库资源建设[J].科技视界,2015,(32):206,261.

- ④⑦王建红. 论高校图书馆形象的塑造[J].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1): 126-128.
- ④⑧张鹏. 以图书馆形象塑造为路径开展阅读推广工作[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5, (1): 120-121.
- ④⑨薛岩. 浅析数字时代图书馆资源共享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J]. 科技与创新, 2015, (3): 34-34, 35.
- ⑤⑩吉宇宽. 云服务商著作权作品在线交易对图书馆馆藏的影响及保障策略研究[J]. 图书馆, 2015, (11): 84-87.
- ⑤⑪王钱林. 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的大众化与化大众[J]. 社科纵横, 2015, (4): 171-172.
- ⑤⑫李一男. 新时期加强图书馆文化建设的思考[J]. 科教导刊-电子版(上旬), 2015, (3): 189-190.
- ⑤⑬李春红. 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与创新服务[J]. 大观, 2015, (8): 211-212.
- ⑤⑭周海霞. 高校图书馆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5, 25(10): 42-44.
- ⑤⑮原小平. 简论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史料汇编[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5, (2): 62-66.
- ⑤⑯孙婉. 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浅谈[J]. 改革与开放, 2015(8): 103-104.
- ⑤⑰袁红霏. 图书馆联盟建设可行性与必要性研究——以龙子湖高校园区为例[J]. 创新科技, 2015, 190(12): 87-89.
- ⑤⑱胡海鹰. 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图书馆联盟建设实践研究——以河南省图书馆为例[J]. 图书馆界, 2015(3): 60-64, 84.
- ⑤⑲张晓桦. 社区文化服务中异质性图书馆联盟的协同研究[J]. 图书馆学刊, 2015(7): 7-11.
- ⑥⑰马育敏. 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5, 35(2): 41-43.
- ⑥⑱侯爱花. 基于生命周期的图书馆联盟知识产权冲突与对策研究[J]. 图书馆工作和研究, 2015(232): 8-11.
- ⑥⑲孟祥凤. 图书馆联盟数字资源共享平台架构研究[J]. 图书馆界, 2015(2): 5-8.
- ⑥⑳南楠. 高校图书馆联盟信息安全策略研究——以河南省高校图书馆为例[J].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30(1): 91-94.
- ⑥㉑韩姗姗, 韩迟. 数字技术在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J]. 现代教育技术, 2015: 1.
- ⑥㉒轩红. 浅谈高校如何建设智慧型图书馆[J]. 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5, 35(3): 59-60.
- ⑥㉓祁雨江. 互联网与开放式数字图书馆架构下的书香中国[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5, 35(11): 101-103.
- ⑥㉔龚义年. 论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完善[J]. 图书馆学研究, 2015: 95-97.
- ⑥㉕周艳丽. 关于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的探讨[J]. 政法精英, 2015: 267.
- ⑥㉖李丹. 浅析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与对策[J]. 决策论坛——政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 2015.
- ⑥㉗蒋丽敏. 河南省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优化配置策略[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5, 27(1): 16-18.
- ⑥㉘李云华, 李新广. 数字图书馆的分发模式研究[J]. 现代情报, 2015, 35(6): 54-57.
- ⑥㉙马骏. 克利夫兰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实践及其有益借鉴[J]. 图书馆学研究, 2015(3): 84-88.
- ⑥㉚臧振春, 汪陈, 崔春生. 数字图书馆的经济评价研究[J]. 情报工程, 2015, 1(2): 104-109.
- ⑥㉛臧振春, 周金倩萍, 崔春生. 实物期权博弈理论在企业数字图书馆项目投资策略中的应用[J]. 情报工程, 2015, 1(3): 43-48.
- ⑥㉜吴楠楠, 臧振春, 崔春生. 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在数字图书馆评价中的应用[J]. 情报工程, 2015, 1(3): 76-80.
- ⑥㉝徐黎娟. 基于微信平台的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系统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5, 27(1): 169-172.
- ⑥㉞司娇娇. 无“微”不至的图书馆微服务[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5(6): 68-73.
- ⑥㉟宋翠. 基于云计算的数字图书馆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5, 18(2): 107-108.

- ⑦⑨郑燕. 基于云计算的个人数字图书馆研究[J]. 新乡学院学报, 2015, 32(7): 57-60.
- ⑧⑩吉宇宽. 云计算环境中信息交易对图书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15: 72-76.
- ⑧⑪尹玲敏. 谈 RFID 应用与图书馆读者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基于美国的做法和经验[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5(228): 44-47.
- ⑧⑫董迎霜. 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015: 230.
- ⑧⑬周首领. 基于 CiteSpace 图书情报核心期刊的可视化分析[J]. 创新科技, 2015, 9: 91-93
- ⑧⑭周惠来. 周文迪, 等. 河南省产业竞争情报服务协作平台建设研究[J]. 创新科技, 2015, 8: 37-39.
- ⑧⑮盖双双, 刘雪立.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国际化现状——基于 SSCI 高影响力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引证分析[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5, 25: 156-160.
- ⑧⑯刘燕. 浅谈科技查新人员素质对查新质量的影响[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5, 25: 104-106.
- ⑧⑰丰锐. 河南省 2005-2014 年医学科技查新项目统计分析[J]. 河南医学研究, 2015, 7: 26-29.
- ⑧⑱赵霞. 2012《中国图书馆学报》载文与作者分析[J]. 科技创新导报, 2015, 20: 195-196.
- ⑧⑲甄戌兰. SCI-E 收录河南大学学术论文统计分析[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5, 25: 134-137.
- ⑧⑳方红玲. SSCI 收录图书情报类期刊“非可被引用文献”的印证特征[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5, 26: 1301-1305.
- ⑧㉑盛丽娜. SSCI 收录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期刊及其文献计量学指标分析——基于 JCR 网络版(2012)[J]. 情报科学, 2015, 33: 102-107+114.
- ⑧㉒钟镇. 从 web of science 看中部地区省内地市高层次学术成果合作特征——以河南省为例[J]. 情报科学, 2015, 33: 120-124.
- ⑧㉓赵元斌, 吴志红, 等. 高校学科发展分析评价实证研究——以河南省 3 所大学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 115-121.
- ⑧㉔付中静. 基于 CNKI 和 WOS 的我国眼科学合作基金论文对比分析[J]. 情报探索, 2015, 6: 27-32.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历史学

2015 年度河南省中国史研究综述

戴庞海 张艺凡 王林林

2015 年河南中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从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以及相关的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思想史、专著等十二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先秦史

金荣权的《新时期时期淮河上游的族群迁徙与文化融合》(《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第 4 期)主要论述淮河上游地区既有古老的本土文化,又有来着东方、南方与西方的文化,各种文化在这里传播、碰撞、融合,最终产生了具有大成意义的龙山文化。李玉洁的《三皇五帝——中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黄河、黄土、黄种人》2015 年 4 期)主要论述三皇时代与五帝时代的特点,以及关于太皞、伏羲氏的辨析,神农、炎帝氏问题的辨析、古代禅让制问题等几个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金荣权的《从神话传说看徐国的族源与迁移》(《中州学刊》2015 年 12 期)主要论述了神话传说与徐国的族源,以及徐国的迁徙、发展与灭亡。

先秦礼法:李敦庆《“三礼”中仪式用乐的政治含义及礼、乐之关系》(《文艺评论》2015 年 8 期),金荣权《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传播》(《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 1 期)两篇文章都论述了周代的礼仪制度,第一篇主要论述了周代的祭祀之礼逐渐将重点转向了对人事的关注,礼乐紧密不分,“三礼”中的礼仪用乐已经披上政治色彩。第二篇主要论述了周代礼乐制度、教育体系、赋诗风尚对《诗经》的保存与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陈鹏飞的《礼治视阈下先秦服制的精神与社会功能》中论述了先秦服制种体现的礼法精

神与宗族自治、社会治理等社会功能,以及对后世社会治理的影响。郭俊然《论先秦司法的残酷性》(《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 年 6 期),论述了夏商时期“灭人宗族”,西周时期“明德慎刑”,春秋战国时期的“滥杀”。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司法严酷的原因是源于社会大变革的现实,以及基于此基础上的发夹重刑思想。

先秦社会现象:付爽的《论先秦时期对鳏寡孤独残疾人群的社会救助及现代意义》(《中外企业家》2015 年 29 期),论述先秦时期对鳏寡孤独残疾人群的社会救助,以及这种行为对当今社会的意义。闫文菲的《先秦典籍中的男嬖形象探微》(《华北水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 3 期),通过对先秦时期典籍中的男嬖形象的解析,还原先秦时期同性恋的状况。作为我国同性恋文学之滥觞,先秦典籍中男嬖形象的书写对后世的同性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俊然的《先秦时期的人殉现象述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 年 3 期)论述先秦时期的人殉现象史伴随着福泉的确立而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日益提高,这种风俗已经开始走向消亡。

李久昌的《战国诸子名士的求功成名之路与学术传播之路》(《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 年第 4 期)指出崤函古道是战国诸子交流、学习的重要途径,是战国秦由西部的一个落后小诸侯国发展成为七雄之一的重要因素。李久昌的《崤函古道与商文化的西渐北上》(《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 年 1 期)主要通过商汤革夏、商文化的西渐北上、北上晋南等说明崤函古道都是重要的交

通要道,既是商王朝与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建立和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纽带,也是崤函与关中、晋南各区域之间文化交流的地理舞台。

张清改的《“申息之师”辩证考》(《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1期)通过对“申息之师”的构成、规模、战功进行考证和辨伪,发现其的历史功绩。李玉洁的《吴起“杀妻求将”质疑》(《中州学刊》2015年2期)对比《史记》与《韩非子》的记载,以及吴起“修德亲民”思想,认为“休妻”更为准确。《息夫人考》(《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年1期)认为息夫人,春秋时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国版的海伦,因其目如秋水、容颜绝代而又被称为桃花夫人,先嫁息国国君息侯,后息国被楚所灭。国破家亡后,息妃被迫入主楚宫,成为楚文王的第一夫人。

赵炳清的《先秦时期巴蜀地区人口迁移与文化交流》(《四川文物》2015年4期)主要论述了古蜀文化具有独立的体系,是巴蜀文化形成的基础,也为后来与汉文化相融合奠定了基础。

李建立《先秦商业道德的价值取向》(《社科纵横》2015年11期)主要论述了先秦时期商业道德中的“善行广布、爱国济民善、守信重诺、诚实守信、敬业乐业、乐中思苦”等思想作为基本的价值观,促进了先秦时期商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先秦商业经济的发展。

刘继刚的《从考古发现看先秦聚居地的水患防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4期)通过考古材料发现,先秦时期,人口聚居之地常受水患侵扰。先民通过选择离水近便且较高的居住地、修造城墙与城壕、修建排水系统等措施,有效地防范水患的威胁,这为后世城市防范水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汤洁娟的《中原先秦城址遗产资源的价值与开发利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3期)论述了中原先秦城址遗产资源丰富,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资源开发,城址资源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整体保护。

二、秦汉史

张燕蕊的《2014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5期)从政治、经济、社会、思

想、边疆、民族、中外交流、历史地理、交通史、环境史、农史、考古学及出土文献多个方面系统论述了2014年秦汉史研究情况,统计工具书约60部,发表论文700多篇,内容详实、丰富。

郭俊然的《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边郡防御职官》(《五邑大学学报》2015年4期)记录了汉代边郡防御系统相对完整的职官体系,填补了对汉代边郡防御职官的认识。《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工官考》(《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5年1期)将20种传世文献资料所遗的汉代地方工官,分为三类研究,对汉代官制有更深刻的认识。《出土资料所见汉代地方农官考论》(《昭通学院学报》2015年1期)补了文献记载内容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论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匈奴职官》(《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4期)根据出土资料中发现大量匈奴官印,发现这些官印与《汉书》所记职官有异,并分析其不同的原因。《论实物所见的南越王国职官》(《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4期),使得人们可以更进一步认清南越国官制的概貌。《文献所遗的西汉中央官秩》(《榆林学院学报》2015年1期)从实物资料与文献加载的对比中,发现按汉代官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动。《论秦汉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兰台世界》2015年21期)记述了秦汉时期的政治性大屠杀,从时间、地点、数量等多方面因素分析秦汉与其它历史时期显著不同的特点。

刘太祥的《简牍所见秦汉国有财物管理制度》(《南都学坛》2015年3期)分析简牍材料中的国有财物管理制度,对秦汉的制度建设有更清晰的认识。赵炳清的《秦代地方行政文书运作形态之考察——以里耶秦简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里耶秦简中大部分都是秦代地方行政文书,以里耶秦简为中心,考察文书的运作形态。贺科伟的《秦汉简牍官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初探》(《兰台世界》2015年2期),秦汉时期设置了专门的简牍官文书档案收藏机构和管理人员,档案分级保存意识已经出现,这对以后中国文书档案工作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刘玉娥的《实至名归大丈夫——张良故里争

议引起的思考》(《黄河、黄土、黄种人》2015年4期)展现了汉初张良这个历史名人的风采。高二旺的《论汉代人灵魂的认识和干预》(《中州学刊》2015年7期),汉代人认为灵魂的本质是气,是情性之神。为了趋吉避凶,生者通过丧葬、祭祀、巫术、建筑与绘画等各种方式干预灵魂。汉代的灵魂干预既有个人层面的功利目的,也有国家层面的消除灾异等目的。马媛媛的《秦汉迫害“赘婿”原因再探讨》(《兰台世界》2015年3期)论述了国家法律对赘婿迫害的原因。李向勇的《秦汉时期的射箭运动管窥》(《兰台世界》2015年12期)认为秦汉时期,射箭运动不仅在军事斗争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日渐成为意向颇具特色的体育竞技运动项目。

三、魏晋南北朝

张宏慧的《三十年来许昌学人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许昌学院学报》2015年1期)回顾许昌学人近年来取得的成果,并希望许昌三国历史文化研究迈出新的步伐。

乔凤岐的《汉魏西晋管理东北地区体制之演变》(《河北学刊》2015年4期)按照时间顺序,论述中央管理东北地区的体制演变。高二旺的《魏晋南北朝丧礼制度中的变礼》(《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8期)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变礼主要体现在对正常礼制的权变处理或低于正常礼制。刘春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日礼仪食俗》(《农业考古》2015年4期)认为这些节俗饮食反映了当时人的生活追求和文化心态。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物的加工与贮藏技术》(《农业考古》2015年1期),随着食品种类及结构的变化,食品的加工制作与贮藏技术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医学》(《许昌学院学报》2015年1期)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医制度,完善对当时军事医学水平的认识。

洪卫中《论曹操统治建立过程中的文化因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1期),认为文化因素在曹操征服群雄、统治建立、争取全国统一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典农校尉非曹操所置》(《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1期)通过分析不

同的史料,证明典农校尉非曹操所置。《从“崇本息末”到“崇本举末”——论王弼对老子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4期)认为王弼对现实政治的作出的深入思考,表现出他为解决现实问题而作出的积极努力。《颜之推对儒家思想的坚守——以〈颜氏家训〉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15年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发展显得式微脆弱,但是颜之推是继续推崇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

王莉娜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文化风尚》(《文艺评论》2015年2期)认为士族门第的风尚是士族文化的重要体现。陈开颖的《龙门石窟古阳洞供养人像研究》(《兰台世界》2015年21期)从供养人的形制位置、服饰姿态,可以探究当时人的宗教信仰背景和传统礼制在中国化进程中的融变。

刘玉娥、汪鹏的《韩愈乃东汉颍川韩棱之后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3期)综合文献和碑刻墓志厘析,韩愈为颍川韩棱之后。王莉娜的《颍川荀氏之兴起与早期发展》(《兰台世界》2015年21期)),分析颍川荀氏兴起与早期发展的原因。

张富春的《试论〈世说新语〉中的支盾形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5期)认为高僧、名士、俗子三位一体,和谐地统一于《世说新语》所见支遁形象中。

陈冬仿的《北朝语言认同探析》(《中州学刊》2015年11期)认为北朝语言认同的完成,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刘获的《魏晋南北朝图书业兴盛与文学发展浅析》(《科技传播》2015年3期)探讨了图书业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指出图书业的快速发展对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推动作用。赵纪彬的《魏晋南北朝序文刍议》(《宁夏大学学报》2015年2期),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序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较而言,在诸多方面均有所提升。

四、隋唐五代史

刘获的《国子监学官对唐代图书编辑出版的意义探微》(《兰台世界》2015年17期),从国子监

的基本情况谈起,分析国子监学官对唐代的图书编辑出版的重要意义。田利的《官刻本〈九经〉考略》(《兰台世界》2015年32期)认为五代后唐明宗时刻本《九经》开官刻本之先河,对我国图书发展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张瑾的《隋唐时期老年医学的发展与特点》(《中医学报》2015年6期)认为中医学对老年医学的认识肇始自《黄帝内经》,发展于隋唐,宋以后日渐成熟。隋唐医家对老年医学理论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付爽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僧侣研究概述》(《亚太传统医药》2015年24期),从中国古代医僧通史性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研究、医僧的个案研究三个方面梳理医僧的学术发展脉络,分析医僧研究的成果,并指出医僧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张小稳《改火、更火、出火及其融合》(《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9期)认为改火、更火、出火这三种渊源各有习俗与理论,在唐代融合为一,以国家法定节日——寒食节和清明节相连的形式出现,是为了达到整合民间社会和宣示统治合法性的目的。

乔凤岐的《谶纬术数与隋唐之际的皇权更迭》(《江汉论坛》2015年9期)谶纬成为朝代更迭和皇位继承的政治工具。惠冬《“真主”观念与五代政局嬗变》(《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6期)认为“真主”指称的变迁反映了政治局势的演变和中原统摄力的逐渐恢复与加强,体现了观念与现实之间的互动。

毛阳光的《洛阳出土唐郑虔书〈阿弥陀像记〉残碑考补》(《西夏研究》2015年2期)指出《阿弥陀像记》残碑对了解唐代洛阳地区的净土信仰、郑虔的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纠正了此前学者研究中的一些疏误。《唐代洛阳粟特人研究——以出土墓志等石刻史料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4期)认为粟特人的存在给唐代洛阳城市生活增添了浓厚的异域文化色彩,如胡服、胡乐、外来宗教、外来器物等,胡俑和骆驼俑也在洛阳唐墓中大量出现,这些事象对洛阳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张显运的《玄奘恳请回少林寺译经原因探研》(《西夏研究》2015年2期)分析了原因,认为唐初统治者令

其弃缁还俗则是直接原因。

金勇强的《唐宋时期河湟地区农牧管理形态的动态考察》(《柴达木开发研究》2015年1期)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对唐宋河湟地区的农牧管理模式进行了动态考察。孙铁林、屈军卫的《五代后梁后唐沿黄河对峙战略据点杨刘城考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5期)认为据新、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杨刘城遗址当在今山东莘县与河南南乐县交界处,为隔今徒骇河相望之杨寨村和刘寨村的统称,不在东阿县杨柳乡。

五、宋元史

金勇强的《北宋元祐江南灾荒与灾后积欠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2期)文章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积欠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基于博弈理论,对积欠危机的形成给予了进一步的反思。

张显运《宋代食品安全研究:以茶叶为中心的考察》指出宋政府实行榷茶制度,园户和商户对茶利的疯狂追求,以及茶叶保质期短等,宋朝的茶叶质量安全依然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张清改《两宋之际信阳茶的发展与历史启发》(《农业考古》2015年2期)研究两宋信阳茶业盛而衰的历史原因,对今日信阳地方茶产业的发展大有裨益。孙金玲《浅谈宋代私营旅馆业的经营之道》(《新乡学院学报》2015年7期)认为宋代私营旅馆不仅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而且旅馆经营者也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经营理念。

任崇岳《金兀朮魂归何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04版)通过实物与文献资料考证金兀朮的葬身之处。《漫话李姓》(《寻根》2015年4期)、《李姓蒙古人的来源于迁徙》(《西部蒙古论坛》2015年2期)着两篇文章通过实物、传说、文献资料论述李姓的发源流发展。任崇岳《程颐授徒著述生涯史述》(《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3期)论述了程颐授徒著述、历经坎坷的一生。

张显运《也谈〈清明上河图〉中“少马无羊”——对黄仁宇先生的一点质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4期)认为《清明上河图》中之所以“少马无羊”与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所画的地

点、京师开封马羊的饲养情况以及官牧羊饲养的地点密不可分。

王志跃《十院校编〈中国古代史〉宋代部分指瑕》(《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4期)指出第五版宋代部分来说,在吸收学界新成果、史实表述及注释体例等方面仍存在的不足。

六、明清史

牛建强的《明代国家基层社会控制体系述论》(《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5年1期)认为明代国家基层社会控制体系既继承了唐、宋制度和文化成果,更有时代体现和推进发展,从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明代北方水利滞后与官员试图改观现实的努力》(《史学月刊》2015年3期),虽然明代官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水利设施落后的情况,但是历史时期北方水利利用传统的相对断裂,地方政府未能持续发挥等因素的作用,北方地区水利整体落后状况并未发生明显改观。

展龙《明代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研究》(《求是学刊》2015年3期)认为诣阙上诉蕴含着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虽然存在诸多局限,但仍是明廷了解舆情、洞察民意、肃清吏治、监控社会的重要途径。《明初江南遗民的政治生态与命运沉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5期)真实记述了明初江南遗民复杂的政治生态,曲折的心路历程和嬗变的价值取向,再现了传统士人浓郁的遗民情结、经世意识和担当精神。

李智萍《屡筑屡蛰: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的祥符、仪封大工》(《农业考古》2015年4期)认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五年祥符、仪封大工之所以屡筑屡蛰,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既有管理因素也有技术因素。杨宪民《从〈理藩院则例〉管窥清朝时期蒙古地区的法律》(《兰台世界》2015年12期)以《理藩院则例》中蒙古地区法为研究重点,从行政制度、管理制度、宗教制度三个方面就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立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研究。

柳岳武《清末藩部地区筹备司法改良探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2期),随着内外危机的加深,清廷开始对藩部司法进行改良,推进新

政,推动了藩部地区法制的进步。《清末蒙边“置省”探略》(《中州学刊》2015年219期)记述了清廷务实地采取了“先实后名”的筹边设省办法,这一尝试不仅为传统藩部向主权国家地方政区之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民国乃至解放后边疆省份的设置,提供了宝贵经验。《“隔膜”与“猜忌”——“第二次中尼战争”与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关系考》(《同济大学学报》2015年2期)认为东西方体制差异、欠缺了解和互相猜忌,无疑成为导致使团访华失败的致命因素。

苏全有《清末械斗与政府应对》(《福建论坛》2015年6期)认为清末政府在械斗应对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会产生附带问题。《论清王朝灭亡的三大症候》(《历史教学》2015年2期)认为外交失分、舆论失控与民众的组织化三大症候,昭示着清王朝的灭亡。

牛建强、刘文文的《明代河南赋税征收中的折亩研究》(《中州学刊》2015年1期)论述了受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河南州县折亩在时空、力度和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李丽霞的《清末盐斤加价与财权关系的转变》(《历史教学》2015年2期)清廷为抵补鸦片税收,解决财政困境,清政府提出盐斤加价,各地督抚反应表现为反对中央干涉地方财政,这是中央和地方“共处型”财政关系下,财权和职能下移的表现。

李华欧的《论明清时期“湖广熟,天下足”经济现象》(《社会科学家》2015年2期)认为该地域的土壤水热条件是基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发展及种植技术层面的改进是关键因素,官府以轻徭薄赋与劝耕等政策的实施相关。《清代河南农业土地利用与作物种植》(《历史档案》2015年2期)清代初期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措施的实施,河南地区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土地开发与农作物种植形成了一定特色。《试论清代中原地区的商业发展》(《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12期)分析和论述了清代中原地区商业发展将为当今中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经验。《清朝遣戍制度与边疆经济发展析论》(《中州学刊》2015年2期),戍制度对边疆农业生产、戍边稳边、采矿等提供了人力,

促进了边疆的商业繁荣。程峰、程谦《清代怀庆府的商品贸易及怀商的形成》(《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1期)怀庆商帮,对整个中原地区的商品流通、河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程峰、任勤《清代河内清化镇的花炮业——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焦作大学学报》2015年4期)以清化镇现存火神庙的创建、重修碑刻尤其是清嘉庆七年(1802年)《重修火神庙碑记》资料为中心探讨了清代河内清化镇花炮业的生产状况,弥补了以往文献记载的不足。吕宽庆《清代妇女财产来源问题探析》(《兰台世界》2015年19期)以清代档案为中心对清代妇女财产来源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涉及了清代妇女对财产的处分问题,这些研究揭示了清代妇女享有确定无疑的财产权利。

七、中国近现代史

清末:柳岳武《晚清治理生番研究——以瞻对为中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6期)随着川藏危机的增强,清廷才最终收回瞻对,对川藏沿边的各生番进行改土归流。潘崇《承前启后: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考》(《史林》2015年3期)从清末瞻对问题的连续性审视,彰显出筹瞻川属已是川边内外交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同时客观上在鹿、赵之间构筑了联系的桥梁,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简玉祥的《庚子—辛丑年间惩办载漪之论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期)各个方面不同力量的抗衡形成的对载漪的惩处,以清政府的完全屈服而告终,客观上为以后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契机。丁健的《清季袁世凯开缺问题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1期)认为学界关于1909年袁世凯开缺回籍问题,对袁世凯遭罢黜之前的史实梳理尚显薄弱,特别是对袁世凯五十大寿及其影响重视不够。

张华腾《清末新政时期河南巡抚与河南早期现代化》(《中州学刊》2015年12期),河南巡抚群体忠实执行新政谕令,致使河南新政别有特点,开启了河南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征程。霍晓玲的《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述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5年5期)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对于当

前建设基层政治民主提供了借鉴和启迪。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年12期),“寓善于乐”的慈善理念通过清末娱乐观演及其慈善“场域”,对城市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促进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

民国:赵振的《民间记忆与历史叙事:〈袁氏家训〉和建文帝事迹》(《史学月刊》2015年9期)评论了《袁世凯家训》中关于建文帝的事迹以及对当时人物的评价。谢晓鹏《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在澳门的岁月》(《工会信息》2015年5期)论述叶挺1932—1937年叶挺曾在澳门居住,并积极从事多项政治活动。丁健的论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尴尬”处境》(《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2期)论述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所处的尴尬局面,无奈最终拱手将政权送与袁世凯。曹心宝、张华腾《徐树铮与张勋复辟》(《北华大学学报》2015年6期),徐树铮与张勋复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徐树铮在其中起了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张华腾《北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2期)通过分析北洋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北洋时期复杂社会的复杂政治人物,应该予以更全面的认识、更客观的评价。

苏全有、李佳骏《民国时期的地方械斗与政府应对》(《求索》2015年11期),民国时期械斗成风,政府未予高度重视。《论民国时期提水机械的现代化》(《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5年1期),民国时期,对传统翻车和筒车在结构和动力上改良,同时也逐渐使用简易的现代人力畜力提水机械和大型的柴油电动提水设备。苏全有、顾伟娜《论民国时期西方母亲节习俗的传入》(《鲁东大学学报》2015年4期)西方母亲节借“西俗东渐”的风潮传入中国。苏全有、白中阳《浅谈民国时期的上海音乐会》(《华北水利都会点大学学报》2015年6期)各种类型的音乐会在上海出现和传播,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苏全有《论民国时期的家庭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刊》2015年3期)民国时期家庭图书馆对当今社会有着借鉴意义。《论民国时期的拯救毛笔风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5期)分析了出

现拯救毛笔风潮的原因。《民国时期河南省立中山图书馆述评》(《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 年 1 期)从 1928—1935 年间,中山图书馆在建筑、人员配置、机构、藏书、阅览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当今资鉴意义昭然。《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的灾难述略》(《公共图书馆》2015 年 1 期),日寇对我国的侵略给图书馆事业带来的损坏十分巨大。苏全有、张亚楠《论民国时期图书馆倡捐图书的方式》(《山东图书馆学刊》2015 年 6 期)认为民国时期形式多样的倡捐形式,仍有借鉴意义。《什么人“活在民国也不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01 版)认为我们永远都不可以蔑视历史;我们亦不应该美化历史。当今的“民国热”,问题出在后者。

王守谦、周舟《民国初年的矿务监督署》(《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5 年 3 期)论述了民国初年设立的矿务监督署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矿业管理体制研究概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5 年 5 期)论述了民国时期矿业管理体制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需要新的研究方法、理论。杨涛《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历史考察》(《郑州大学学报》2015 年 5 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教育经费危机说明,只有高效的中央政府、优越的政治制度和统一稳定的国家才能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保障。《民国时期河南教育独立的考察》(《南都学坛》2015 年 3 期),民国时期河南教育经费独立的状况也启示我们,建立一个现代化导向的、稳定高效的政府,是教育界教育经费得以顺利供给的前提。巴杰《国民革命时期的店员工会》(《史学月刊》2015 年 4 期)认为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店员工会,但职业职能较为模糊,并不能代表所属店员的整体利益,更遑论将店员的内在诉求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府决策。杨涛《梁士诒与一战爆发后的土货出口》(《殷都学刊》2015 年 2 期)论述了梁士诒在一战爆发后,利用其担任职务,积极谋求土货出口畅销。对民族工商业在一战以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永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新型农会组织述论》(《中州学刊》2015 年 8 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会组织,维护

了农民群众的自身利益,为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积聚了力量。

抗战时期:巴杰《抗战时期中共经营河南的战略部署》(《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 年 1 期)河南战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党组织是中共经略河南的重要保障,战略部署的灵活性是其成功经验。巴杰、郭赛飞《〈风雨〉周刊及其在抗战初期的民众动员》(《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 年 6 期)《风雨》周刊是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关头自救活动的文化载体,也是河南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常英《报刊图片与抗战舆论动员》(《史学月刊》2015 年 10 期)报刊图片与抗战舆论动员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推进了抗战宣传的全社会覆盖,是抗战舆论与抗战文化中风格独具、富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报纸与难民救助》(《中国出版》2015 年 18 期)抗战时期,中国报界在宣传和动员民众积极抗战的同时,也在发动社会开展难民救助、扶贫济困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吴宏亮《论人民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 年 5 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最广泛动员了人民群众参与抗战,为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吴宏亮、任中义《抗战后期美国试图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前因后果》(《中州学刊》2015 年 1 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官员呼吁其政府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因为多种因素,使美国决策层最终放弃了这一援助计划。吴宏亮、陈杰《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战胜利的历史贡献》(《安徽史学》2015 年 6 期)鄂豫皖根据地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殒殒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张清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教育事业初探》(《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5 年 2 期)认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之后,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金融、文化等事业,其中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不仅摧毁了旧的封建落后文化,而且对革命动员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崔家田《全面抗战时期中原地区红十字组织

的医卫实践:以红会会刊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4期)全面抗战时期,中原各地红十字组织积极投身抗战,成为战时地方社会一支重要的医护力量。《北洋时期中原地区红十字组织战事救护与调停探析》(《延安大学学报》2015年2期)北洋时期,中原各地红十字组织战事救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体现了地方红会国际性与地方性的辩证统一。

李丽霞《抗战时期“西进运动”对河南人口的影响》(《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2期)河南人口的西迁,对缓解人地矛盾、加快偏远地区开发等方面有较大的积极作用,但由战争引发的被动迁移也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破坏。《抗战时期内迁高校教师群体的住房问题探究》(《兰州学刊》2015年3期)内迁高校教师群体在艰苦环境下,延续了中华文明的火种,为改变东西部文化教育不平衡的状况和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苏全有《美化张灵甫太任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4版)“张灵甫事件”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与曾几何时“内战败将”形成截然反差。

建国后:彭学宝的《试论建国初期中共接办外国在华教育事业》(《兰台世界》2015年22期)认为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教育影响的经验及局限,为当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霍晓玲的《开封市基层政权的创立与调整(1948—1955)》(《中共党史》2015年07期)1948—1955年开封基层政权的调整历程,反映了中共政权建设的理念与现实对接时的碰撞,也折射出其规划城市社会的宏大构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宗教:刘志庆《广西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中国天主教》2015年1期)《贵州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中国天主教》2015年4期)《江西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中国天主教》2015年3期)《陕西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中国天主教》2015年5期)论述了这几个地区的天主教教区的发展、变化。

新史料:苏有全《新史料的发现与傅斯年研究的深化》(《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4

期)《新史料的发现与辉县近代经济军事研究的深化》(《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9期)《新史料的发现与辉县近代社会文化教育研究的深化》(《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3期)《新史料的发现与苏炳文研究的深化》(《大连大学学报》2015年1期)分析了相关研究现状,随着上述及之外的相关资料的大量发现与利用,研究一定会而益趋于深化。苏全有、王世超《高山仰止敬群贤》(《焦作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1期)对梁鸿所著《二十世纪北京书画名家述评》的评述。

历史课程教学与改革:王新环的《地方志对高校中国近代史教材补充探究》(《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期)认为在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以地方志史料为基础,从地方史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代史上国家利权旁落、民众起义、灾荒、社会变迁等,不仅可以从微观体察宏观,加深对教材的理解,而且在增加乡土认同感的同时,还可以深刻地感知地方与国家之间命运的紧密关联。《地方志与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的互证探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1期)认为将方志史料与教材进行互证,使大而辽阔的历史叙事更加完整和全面,有利于从微观体察宏观,以小见大,更深层面理解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鞠明库的《新课改下高师历史专业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思考——以河南为例的考察》(《学理论》2015年17期)认为中学历史新课改,需要调整课程体系;构建严格的考核体系;调整历史教育实践课程体系;把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杨颀慧的《论我国实施文化遗产教育的必要性与途径》(《人民论坛》2015年17期)认为未来我国实施文化遗产教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发挥专业机构、社会团体的社会教育功能;在学校教育中增加文化遗产教育。《数字化时代高校历史专业教学改革》(《教育与职业》2015年16期)认为调整高校历史专业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专业信息能力,是数字化时代高校历史专业教学亟须进行的改革。张清改《市级党校开展地方史教学初探——以河南信阳为例》(《延边党校学报》2015年2期)认为如何在市级党校的培训工作中更好地开展地

方史的教学工作,把握地方史讲授的内容、方法、侧重点等,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巴杰《高校地方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以郑州大学“河南现代史”为例》(《河南教育(高教)》2015年6期)认为地方史课程是高校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实践中,编写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地方史教材、强化直观性教学、研究性学习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路径。叶宗宝的《历史学专业学生技能培养之途径》(《天中学刊》2015年6期)认为根据教学工作实践经验和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历史学专业学生技能的培养,应在课程设置上突出实践性,在课堂教学上突出专题性,在专业实践中突出灵活性,在社团活动中突出专业性,并将这四个环节紧密结合起来。

对外关系:尹全海的《两岸青年中华文化研习营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3期)认为两岸青年中华文化研习营活动,对两岸携手复兴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学术就在我们身边——兼及〈豫台大学生双向交流研究〉的选题取向》(《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期)认为豫台大学生双向交流活动及其效果,表明中华文化作为两岸文化基因,从而舒缓了因台湾“反服贸”和香港“占中”事件引起有识之士对港台青年疏离中华文化的忧虑。

八、历史地理

张新斌的《柏皇氏与中华柏姓考论》(《中州学刊》2015年11期)认为中华柏姓的始祖为柏皇氏,柏芝为其祖先,祖地在河南西平,西平的“老龙头”有可能为柏皇氏陵寝所在之地。

陈冬仿《环壕的发展与城的起源》(《中原文物》2015年6期)城址出现于距今约6000年~5000年的仰韶时代,三大地区城址的发展各自独立,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其产生都与环壕的发展密切相关。

张国硕《试析浍北商城之城郭布局——兼谈大城城垣的建造》(《考古与文物》2015年4期)认为浍北商城的规划设计具备城郭布局的特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经历了宫城与环壕、宫城与大城的发展演变。张强《生态环境与成汤以后商代都城迁

徙》(《殷都学刊》2015年2期)认为文献资料及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南庚迁奄与当时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游牧民族南迁有关,奄地优良的生态地理环境,军事上的安全需要也是南庚迁奄原因。

崔军红和冯艳艳《官渡地望考辨》(《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1期)根据早期史料和明清时期原阳地方史料的记载,以及近年在原阳发现的明代石碑《皇经碑记》和清代《重修碑记》,认定原阳马头村一带,就是官渡之战的主战场。

金勇强《“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期)认为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唐宋时期河湟地区城镇体系的演变》(《西藏研究》2015年5期)认为唐初至“安史之乱”前,河湟地区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的城镇体系:即军镇体系和政区体系。“安史之乱”后到北宋中期,随着吐蕃势力的渗入,流动性的部落体制占据了主导,原有的城镇体系趋于瓦解。北宋后期,随着熙宁拓边,河湟一带的城镇体系再度确立,但在管理机制、城镇空间布局和职能构成上,已经与唐代大有不同。

冯盼盼《北魏至隋唐时期玉门县的演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2期)认为北魏至隋唐时期,玉门经历由县→郡→县→军→县的多次变更,呈现出波澜起伏的发展状态。其改变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发展和军事形势密切相关。李留文的《王屋山“第一洞天”独尊地位的形成》(《宗教学研究》2015年1期)认为王屋山第一洞天地地位的形成与两晋中原士族及文化的南迁密切相关,更直接源于道教上清派祖师魏华存及其师傅清虚真人王褒与此山非同寻常的关系。

金勇强《北宋嘉佑二年幽州大地震再考》(《唐山学院学报》2015年5期)在重新查阅相关历史资料,比较不同版本地震目录所给出的参数基础上,对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幽州大地震重新进行了考订。

张富春《古代民间文化跨区域之传播模式——以妈祖文化在河南南阳的传播为考察中心》(《中州学刊》2015年5期)清代闽籍人士在河南南阳地区供奉妈祖,传播妈祖文化,共有三处,三座妈祖庙宇的创建方式基本上涵盖了古代民间文化跨区域传播的模式:游宦士人传播、屯垦移民传播、客商传播。庙宇供奉乡土神既是团结同乡的精神纽带,又是张扬本土文化的强力手段。

吴小伦《河道变迁与明清朱仙镇的兴衰》(《兰台世界》2015年3期)认为元代末期,贾鲁河的疏浚给朱仙镇带来了发展机遇;明嘉靖至清道光间,随着贾鲁河的持续通航,朱仙镇迎来了最为繁盛的时期;道光朝以后,黄河频繁决溢,镇城数次被淹,大量泥沙的沉淀又使贾鲁河陷入淤积的困境,朱仙镇由此迅速衰落。陈隆文《〈朱仙镇新河记碑〉再研究——水利碑刻与中原水环境变迁研究之二》(《中原文物》2015年2期)认为《朱仙镇新河记碑》对于研究贾鲁河水运与朱仙镇商业兴衰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有重要价值。

王守谦、周舟《建国初期新乡地区的引黄济卫工程及其影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乡地区修建的引黄济卫工程一方面推动了新乡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确保了卫河在豫北地区水上通道的地位。

苏全有、王仁磊《何为卫文化》(《新乡学院学报》2015年1期)认为卫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卫文化研究是中原经济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姜建设、陈隆文《从“卫河三便”之策看卫河水运价值》(《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5期)认为卫河水运及沿岸的自然资源为环渤海沿岸地区的区域发展和北方长城的营造都起了推动作用。陈隆文《始祖黄帝祭祀三题》(《黄河、黄土、

黄种人》2015年24期)主要论述了陕西黄陵拜祭与新郑黄帝故里拜祖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了始祖黄帝拜祭的地点,进一步说明中原地区乃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姜建设、陈隆文《山西垣曲商城西城门的建筑特色》(《山西档案》2015年5期)根据考古资料展现垣曲商城的整个布局,从而发现其西城门的建筑特色。

张清改《略论信阳城市历史与文化意蕴》(《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年1期)认为信阳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演绎着不同时代的城市风情,其城市空间、城市景观、城市人文亦随着城市空间的迭变而累积了厚重的历史和悠远的文化意蕴。《信阳城阳城历史变迁考辨》(《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1期)认为城阳城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城池、称谓变化繁复,世人模糊不清,今借助史籍和考古发现厘清其变迁历史实属必要。尹全海《“八姓入闽”考释》(《中州学刊》2015年6期)认为至元祐年间始定型为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入闽;明清之后,“八姓入闽”传说由姓氏源流叙述转为地方历史叙述,并经由地方志书传至中原和台湾,流传至今,成为豫闽台两岸三地跨区域移民传说。

王新环《志书中的物产资源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中的柿子为例》(《中国地方志》2015年5期)搜集整理志书物产中的柿子资料,对当前经济发展倡导的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农业以及开发特色农林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文献支持。

九、历史文献

吴漫《〈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与严格的水管理》(《历史文献研究》2015年1期)指出《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是目前可见最早且约束全面的保障农田灌溉的重要科条碑刻。其价值在于:确保农业灌溉用水不被侵夺的宗旨;严格的取水许可;实施多层监督;提供矛盾与冲突的解决路径;严厉的多级制裁等基本原则。

郭俊然《〈十批判书〉的历史影响述论》(《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4期)认为历史上对《十批判书》的毁誉不断。今天学界日益认识到《十批判书》的真正价值:一是方法论上的开拓性

价值,二是文本叙述上的全新范式。

陈冬仿、常佩雨《从〈史菑问于夫子〉看上博简的文献价值》(《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认为上博简《史菑问于夫子》等文献提供了最新的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文化、思想史材料,对于楚系简帛本身及其他楚文字的释读、准确校读其他古文字资料和推进汉语上古音的研究等都有较大的帮助,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王新环的《方志中的物产史料价值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为例》(《史志学刊》2015年1期)认为方志物产中的农作物品种、种植状况、种类增减等,是研究农业史及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的重要史料。《河南方志中的农谚》(《农业考古》2015年1期)认为作为农业遗产的一部分,农谚为人们保留了诸多耕作经验和生产智慧,对研究河南农业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农谚中可持续发展的耕作理念,对现代农业生产也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苏全有《莫让馆藏古籍化身“吸尘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1日)认为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型的重要标志,就是由重藏轻用变为藏用兼重。作为一种古老的媒介、历史的“活化石”,古籍仿如文物的“包浆”,承载着历史的张力,从中可以体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历。《史学“三病”当须“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6日)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界的两个阶段,其成就之斐然、硕果之累累,令人惊叹。只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亦应清醒地意识到其背后所潜藏的问题与不足。具体来说,当前史学研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即智慧缺失、远离现实、考据失真。

十、科技史

王星光《汉代长安与农业发展》(《中国农史》2015年4期),汉代长安城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都长安及其京畿地区也是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为了供应京城内大量人口的日常消费和为全国的农业生产作出示范。《刘知幾与获嘉》(《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7期),刘知幾

在获嘉的20年,是其奠定史学根基的重要时段,也是其积累政治经验的重要时期,值得加以重视和研究。

十一、思想史

儒家思想方面:赵炳清的《略论〈中弓〉篇孔子‘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期),从上博楚简《中弓》篇中孔子回答仲弓的“为政”“导民兴德”“民务”的三个问题,体现了孔子“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朱荣英的《先秦儒道的“天人之辩及其当代价值”》(《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主要把先秦儒家的“义理之天”与道家的“自然之天”对比,从而分析儒家“天人之辩”的当代价值。雷永强的《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述略》(《中国哲学史》2015年2期),论述先秦音乐教化中“中和”审美观的系统化,并为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奠定了基调。王志跃的《虚实之间: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2期)认为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礼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有益启示,对当今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史学思想方面:郑先兴的《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2期)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历史学的功用就是政治教化与鉴戒。桓占伟的《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文史哲》2015年1期)认为春秋之“义”具有统领性、共识性和普遍性,三者共同支撑起“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张华腾、李泽华的《浅谈梁启超新闻思想及实践中的“史家精神”》(《殷都学刊》2015年2期)表达出梁启超首次提出“史家精神”这一办报主张,对近代新闻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十二、专著

乔凤岐、穆慧贤主编的《古代文明与秦汉社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是许昌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

“2015年河南省历史学年会暨魏晋文化研究”会议中“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论文合集之一,时段集中在秦汉时期并向前后有所延伸,主要是从考古、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比对和深入分析中,从社会、文化、宗教、儒学、女性、地方等方面对于文明的传播做不同侧面的研讨。

李玉洁著《先秦丧葬与祭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04)论述了黄河流域古代的丧葬、丧服与祭祀制度。该书运用大量的考古材料对先秦时期的墓葬制度的起源、墓葬形制、随葬品、性质等级进行研究,以《三礼》为主要文献,结合考古材料研究古代的丧礼、葬礼;本书研究了周文化类型的墓葬、东夷文化类型的墓葬、楚文化类型的墓葬、秦文化类型的墓葬、吴越文化类型的墓葬、边疆少数民族的墓葬,包括东北地区的积石墓、西北地区的墓石人石棺墓、西南地区的悬棺葬、福建武夷山的架壑船棺葬等墓葬特点;本书对古代的祭祖中的虞祭祔庙之礼、宗庙等级制度、昭穆制度、神主宗祧、尸祭制度等祭祖之礼进行研究。

张丽君,乔凤岐等著《颍川士族与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11)本书是以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政治、人物、社会生活等方面为对象展开的专题性历史研究。全书涉及四部分,一是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二是讲述这一时期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等,三是从饮食、娱乐等方面研究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四是从经济、生态、社会福利等方面来研究。

乔凤岐《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士族、士人与魏晋隋唐政局研究 以士族个案研究为例》(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07)本书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士族、士人为研究主体,以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或在民间与传统文化方面有重要地位的人士为主要考察对象,重点探讨这些人士对魏晋隋唐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主要内容有:君临天下、治国安邦、边疆经略、文化生活、士庶乱政等几个方面。通过以上几个关键点的论述,能够比较理性地了解士族、士人对魏晋隋唐历史发展的影响。《颍川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10)本书以许昌及其周边的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为主要研究内容,涉及许昌历史、传统文化、钧瓷工艺、民间美术、民间曲艺、舞蹈等方面,探讨了许昌地区的人文历史、民间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发展及其对现代经济文化建设的影响。

赵振《二程语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考察二程语录的形成过程及其在二程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指出二程语录是二程兄弟平时传道讲学和交游论学活动的记录的结集,是记录二程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的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之一,在研究二程思想方面具有其他文献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是对二程语录的文本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辨,指出了其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二程语录的记录者及记录时间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证,借此分析二程思想的形成和变化情况。本书阐述了二程语录与经学及理学之间的关系,指出二程经学不同于传统经学,在经典文本的选择上推重“四书”而非“五经”,特别是二程语录所采用的口义的解经形式,为二程自由发挥自己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驰骋空间。

张显运《十至十三世纪生态环境变迁与宋畜牧业发展响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04),十至十三世纪是历史上环境变迁异常显著的一个时期,频繁的战乱,水患的肆虐,大量的毁林开荒,人口的飞速增长以及农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破坏。而生态环境的变迁对这一时期畜牧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全面系统地梳理这一课题,既是五代、宋生态环境史、农业以及畜牧业研究的需要,又是推动这一时期历史纵深研究的必要。《十至十三世纪生态环境变迁与宋代畜牧业发展响应》主要探讨了宋代畜牧业的地域分布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其内容分为六个方面:第一章为绪论,探讨《十至十三世纪生态环境变迁与宋代畜牧业发展响应》的选题意义与学术史的回顾;第二章介绍了宋代畜牧业的生态地理;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宋代的自然灾害及其对畜牧业的影响;第四章对十至十三世纪农

牧争地问题进行了回顾;第五章为宋代畜禽的地域分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主要研究了宋代官、私畜牧业的地域分布及生态地理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第六章为宋政府为保护生态环境与畜牧业采取的应对措施。

郑永福,吕美颐著《晚近历史人物论稿》(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10)本书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发表的关于清代以来历史人物的论文,全书分为近代人物、河南人物、清初人物、学统学案四个部分,从不同角度对晚近历史人物的思想及学术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对河南籍人物的理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张华腾《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北洋史研究新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12)主要包括北洋史研究理论探索、北洋集团研究、北洋时期人物研究、北洋时期政治经济研究四个研究部分。充分利用相关档案、文件,试图对辛亥革命前后北洋集团发展、分化情况给予简要的叙述,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作用。

王星光《中国农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04),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农业历史和中华农耕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汇编,共收录了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分别对中华农耕文化、中国农业的起源发展与交流、中国农业耕作理论与技术、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中原农业历史成就、中国农村社会与风俗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系统地展示近年来中国农业历史与中华农耕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叶宗宝《〈抑斋自述七种〉整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04),本书可谓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抑斋自述》的姊妹篇。由于该书将《抑斋自述七种》之第七部分《病中岁月》(甲、乙、丙、丁、戊)大幅删削(删节15万字),且第一部分《浮生梦影》省略6处(约900多字),第六部分《药饵余生》省略4处(约7000多字),因而自2008年开始进行校勘增补工作,《〈抑斋自述七种〉整理研究》便是最终成果。

程民生主编《古史新探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09)

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稟呈河南大学历史学科的一贯学风和第一辑《古史新探》的编辑原则,我们从中心成员近一年多的研究成果中,选出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22篇论文编辑成第二集,串珠成链,呈现给学界。阵营中老中青齐备,而青年学者占了一半;内容上从夏代到清代,政治、经济、文化、考古、历史地理等等俱全,而宋史研究占了近三分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优良的形态。

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07),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关于“王权主义学派”问题的对话、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在陆学界河洛文化研究的现状及问题等。《朱绍侯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10),本书是为庆贺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九十华诞而编写的纪念文集,书中收录了先生的同学、同事、朋友、学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回忆文章、诗词及学术评论共64篇。

十三、其他

刘志庆《“中国基督宗教史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6期)2015年10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安阳师范学院宗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基督宗教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逸夫图书馆多功能厅举行。来自全国23所高校、8个研究机构、6个宗教团体、3家报刊社的52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60余位师生旁听了研讨会。

霍晓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12期)2015年10月17日至18日,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辽宁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 30 余位学者与会。

李振宏《关于古代社会危机应对问题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15 年 12 期)对于史书《酷吏传》《循吏传》以及大量个人传记中保留下来的这些个性很强的案例进行官员个人素质的具体考察,对他们的个性化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是可以提取一些处理社会危机、群体事件、突发性事件的历史智慧的。

戴庞海、徐蒙蒙、马晓宁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人力资源支撑》(《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5 年期 1 期)论述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可以提升中原文化的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府和各有关方面须制订和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早日建成。

刘朴兵《略论河南食文化的主要特征》(北京:《2015 食文化发展大会论文集》),河南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中国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河南食文化的不少重要的因子已泛中国化,成为其他区域食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总之,2015 年中国史的研究成果很多,成绩斐然。中国史的研究呈现出与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不断采用新的理论与方法,更加注重对考古材料、新出土材料、地方志等的挖掘。先秦时期的礼法制度、思想研究成果突出,其他领域相对薄弱。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依然是研究的重点,官制制度研究成果突出,对新出土文献研究已成为秦汉史研究的前沿方向。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科技史、通史、对外关系史、也有相关成果,各有侧重,突破不大。明清史、近现代史的成果非常突出:尤其是在与社会史结合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远超往年,说明历史的研究更加注重与地理及相关学科的结合。不足之处:分段的历史研究普遍缺乏通史眼光,不能够跳出时代的局限,这是研究中的弊端。在学术的道路上,中国史的研究仍有空白领域,学者们仍需不断努力。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2015 年度河南省世界史研究综述

邵飞飞

2015 年河南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现从英国、美国、俄罗斯(前苏联)、以色列——犹太民族、日本、其他国家和地区、专著七个方面,按照世界历史的时间脉络进行分项概述:

一、英国史

2015 年河南人对英国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并且集中分布在货币铸造体制、政治、法律、农业、哲学思想等方面,其他方面涉及较少,具体情况如下:

张建辉《〈末日审判书〉的形成及现代翻译》(《黑龙江史志》,2015 年第 3 期)《末日审判书》主要是讲是“征服者”威廉对英格兰的土地占有状况,作者对此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明确了英格兰各级土地所有者对威廉的效忠。《末日审判书》又分《大末日审判书》和《小末日审判书》,分别包括不同的调查地区,现代对《末日审判书》的翻译分为菲利莫尔版和亚历克托历史版。

刘景华《东盎格利亚道路——英国传统农业区的曲折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东盎格利亚是中世纪英国相对发达的传统农业区,在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东盎格利亚根据自身的资源、传统和优势,不断探寻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向,走了一条“传统农业—原工业化—商品化农业”的曲折道路,最终找到了较为适当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次转型既反映了英国崛起过程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道路的多样化。

崔洪健《中世纪英国农民生产剩余与财富积累状况探微》(《世界农业》,2015 年第 5 期)。中世纪英国中等以上农户的生产多有剩余,以农产品和畜牧产品为主。农民把剩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

进行销售,不仅为他们积累起了家庭财富,而且也促进了中世纪英国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崔洪健《英王亨利二世时期货币铸造体制变革探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英王亨利二世对货币铸造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革新,改善了货币流通,加强了英王对铸币权的控制,也使中世纪英国的货币铸造体制初具现代意义上的契约性特征。

崔洪健《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群体研究(973—1158)》(《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该文介绍了英王亨利二世对货币铸造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形成了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社会群体,其主要负责货币的铸造和兑换,以便在不同铸币厂之间流动。国王所授予的特权和赠予的财富,再加上货币铸造与兑换中的获利,使得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铸币师也被认为是除王室官员之外最重要的社会群体。

裴幸超《〈1352 年叛逆法令〉对英格兰王权的显性制约与隐性维护》(《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该文肯定了《1352 年叛逆法令》在英格兰叛逆法历史上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其中大部分条款在今天依然有效。该法令设计精巧,一方面限制国王和王室法官在解释叛逆案例和叛逆罪问题上的自由度,保障了贵族与平民的利益;另一方面维护了王权。

裴幸超《敞田制对中世纪英国农业的影响》(《农业考古》,2015 年第 1 期)。敞田制是中世纪英国最基本的土地耕作制度。作者首先描述了在近代农业革命的背景之下,敞田制成为议会圈地的对立物,被标榜成落后、低效率的象征;其次,更进一步揭示了敞田制的实质——一种效率较高的土

地经营模式。敞田制不仅推动了中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世纪英国农牧混合经济的发展。

裴幸超《对中世纪英国“劳作的人”的探究》(《世界农业》,2015年第4期)。在中世纪时期,“劳作的人”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劳作的人”分为自由农民、半自由人以及农奴,作者肯定了“劳作的人”既促进了中世纪英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亦肯定了它对封建制度正常运行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另外,作者对中世纪英国“劳作的人”之考察,有助于揭示当时英国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运作与发展的状况。

蔡磊《试论亨利八世在英国宗教改革中的作用——兼论都铎君主在近代英国构建中的地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作者论述了都铎君主在宗教改革中形成了王权至尊思想、君王决定改革的成果,最后肯定了都铎君主们是近代英国的构建者。

陈思、姚炬《19世纪欧洲的军事竞争与英国大国地位的衰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该文论述了英国大国地位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直接的军事竞争环境,国内社会力量的膨胀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力量,同时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军事竞争系统的削弱。

彭远《对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再认识》(《郑州大学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英国工党思想家安东尼·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对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认为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和布莱尔、布朗所领导政府的相应政策提供了许多重要启迪。

段汉武《论吉卜林帝国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吉卜林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作者从他的作品中认识到吉卜林的帝国意识经历了从对立走向融合的转变。

二、美国史

在美国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分布在近现代史上,且多集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外交政策,包

括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另外,在美国的文学方面也有所涉及。

王金虎《韦伯斯特的对华外交方略与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作者描述了鸦片战争之后,美国政府派凯莱布·顾盛作为全权大使来华,于1844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作者分析了该条约不仅使美国取得了英国在中国得到的全部权益外,还取得一些英国谋求但没有得到的权益,作者对次进行了分析,有独特的见解。

张耀《卡尔霍恩与19世纪美国政治思想传统》(《许昌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该文论述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正处于政治思想转型时期,卡尔霍恩以其系统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为美国南方保守主义确立了发展方向,其社会状态论、自由平等观、两种多数原则及州权理论为美国思想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正式开启了美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时代。

王晓东《罗斯福新政——一场自由派主导的保守改革》(《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该文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在面临危机时所进行的改革,其强化了政府职能,增加就业和恢复工业生产,由此开启了美国的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其变革并不彻底,本质上仍力图维持美国传统的观念、价值和社会结构,且新政没彻底达到解除经济危机的目的。

杨成良《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联邦劳工法的发展:以州际关系为视角的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9期)。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最高法院抵制各州的劳工法,新政第一阶段通过的相关法律被判为违宪,新政第二阶段有关劳工保护的法律得到肯定,美国有了联邦统一的劳工保护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各州劳工权益保护水平差异而导致的州际不公平竞争。

刘亚轩《布莱尔时期的英美特殊关系》(《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5期)。该文论证了在英国外交政策中,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二战结束以来,英国一直在重温帝国梦,而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被认为是实现

英国帝国梦的重要法宝,布莱尔在英国执掌时期,尤为重视英美特殊关系。

杨建国《再谈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背景、内容、及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1978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正式发布,是中美两国相互让步与妥协的产物,是外交智慧的结晶,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杨建国《探析美国对华经贸文化外交(1979—1981)》(《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作者以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完成为契机和新起点,揭露了卡特政府通过接触、交流、合作等途径与手段,对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层面的渗透与扩张。

杨建国《卡特政府对台军售政策的出笼背景、过程及内涵》(《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3期)。卡特政府对台军售政策的出笼过程与美中建交谈判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其中对台军售政策深受其国内政治结构和体制的牵制。《与台湾关系法》极大地限制了总统决策的活动空间,使得政策出笼变得艰难。

杨建国《1979—1981年美国对华“双轨制”政策之论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该文论述了美国依据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和1979年美国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对华从法理层面上开始正式形成和实施“双轨制”政策,一轨指向中国大陆,一轨指向中国台湾,这两轨错综复杂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同步实施。作者指出表面上看该政策似乎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展美国的国家战略性利益,但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外加具体实施中的伸缩空间受限严重,从根本上来看,其最终与美国在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杨建国《1949—1981年美台经贸关系之述评》(《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该文分析了1949至198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经贸政策及实践活动,既表现出贯彻始终的鲜明特征,又表现出随着时代和内外环境的变迁,其动机和侧重点不断调整的明显特点。“不变”和“变”均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在亚太地

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性、整体性的国家利益,同时作者揭示了美国试图以台湾为最佳的跳板和中介,进而对中国大陆实施“和平演变”的目的。

杨建国《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新加坡政策及对华影响》(《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12期)。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新加坡政策,在于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既有的利益和拓展需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上加强与新加坡的协调与合作,经贸领域的强化,以及新加坡的依赖与对接,另外作者指出该政策有明显对中国的防范与围堵意图。

孙璐,金衡山《胜利的焦虑,从后冷战时代美国小说探讨当代美国民族危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以《美国牧歌》、《纠正》和《中性》为代表的美国小说,对美国民族身份及特点进行了反思与展望。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小说再现了美国多元族裔和民族统一、传统价值观和当代文化氛围、美国梦与现实间的冲突与协商,为探究和解决当代美国民族危机提供了不同思路。

邱晋艳《奥巴马时期美国南海政策的变化及影响》(《许昌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该文论证了奥巴马上台后,基于美国自身利益需要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南海问题进行了积极干预,并将其逐步推向地区化和国际化:一是支持东南亚及其周边国家对南海主权的要求,反对中国对南海权益的合理要求;二是与东南亚国家共同遏制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增加了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同时,作者提出了中国应积极地制定对策,维护领土主权。

卢保婷《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导性作用分析》(《安阳工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作者阐述了中美关系的基础以及互动方式,解读了当时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导性作用,这可为未来提供借鉴。

董丹丹《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现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文章通过分析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来透视美国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进而分析马克·吐温深入批判美国现实的主要原因,以及在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的个体心理和个体作为,揭示了这位现实主义作家对十九世纪下半叶

美国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愤怒批判。

三、俄罗斯史(前苏联)

在俄罗斯(前苏联)的研究成果则多集中在中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具体情况如下:

刘恩至《柏林大学时期马克思的法学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以批判形而上学法学观为路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作者介绍了马克思法学观的一次重大转折:黑格尔主义的介入,使马克思抛弃了康德和费希特的法学思想,并对其展开尖锐的批判。这一转折开启了批判形而上学的理论路径,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黎丽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俄国文化背景探析》(《新乡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作者论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南,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侯杰、赵天鹭《声援并军援——苏联与中国的抗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文章论述了苏联在中国抗战的不同阶段,为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作者认为苏联援华抗战的历史值得铭记。

赵乐《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众政治心理对苏联政治的影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文章揭示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众政治心理普遍存在政治信仰衰退、政治价值观出现偏差、政治信任崩塌等消极现象,这些影响了苏联的政治环境,并导致苏联思想意识领域混乱、政治环境恶化、政治参与大爆发,从而推动并加速了苏联剧变。

万长松《哲学并未终结——论苏联“新哲学运动”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20世纪60—80年代的“新哲学运动”,是一场打破教条主义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创立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主义、科学认识论等多个哲学学派,在许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观点。作者进而呼吁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苏联哲学,不能因为苏联解体和教条主义的破产而否定苏联哲学中的积极成果。

王冠军《布兹加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探析》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作者论述了以布兹加林教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已经成为当前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力量。该学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内涵,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质和实践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批评了俄罗斯自由化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思路。

陈桂华《社会发展全球化趋势下俄罗斯学者对儒家思想的新诠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作者描绘了在当代社会全球化的趋势下,俄罗斯学者对儒家思想作出新的阐释,即儒家学说是道德哲学。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今日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情况下仍能迅猛发展,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并指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人性自我完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全球化趋势下当代国际社会发展的新矢量。

四、以色列——犹太民族史

在以色列——犹太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丰,且多集中在犹太人与丝绸之路方面,此处的犹太人是指开封的犹太社团,这些研究对开封犹太社团在丝绸之路中的地位起了突出作用。

张倩红、贾森《犹太人与丝绸之路》(会议名称:北京论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2015)。考古发现证明东西方之间的经贸交流早在汉代以前已经开始,犹太人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商业民族,成了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维系者与受益者,散居民族所独有的国际化特质与世界商人的特别禀赋,使他们能够以丝绸之路为舞台,穿梭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突厥文明以及中华文明之间,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与纽带,充当了东西方经贸、政治、文化等交流的友好使者。

张倩红、贾森《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犹太商人——开封犹太社团来历问题研究述评》(《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以开封犹太人的来历考察为微观个案,作者梳理了犹太人来华的可能性路线,以及不同文化元素在开封犹太社团的体现,作者认为开封犹太人来自可萨汗国的可能性同样存在。

刘百陆《明清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流变与犹太社团之兴衰》(《中州学刊》,2015年第9期)。作者分析了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内部结构在明清时期发生变化:涌现了儒生群体,结交主体社会,为社团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揭示了随着社团人口规模的萎缩,从明中期起,儒生群体规模和层次不断提升,社团事务主导者逐渐由宗教文士转到儒生官员。

刘百陆《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中的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陈垣是最早关注开封犹太人问题的历史学家,其《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审视开封犹太社团,解决了社团研究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为开封犹太社团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被中外学界所重视,并多有借鉴,它推动了开封犹太社团研究不断深入。

宋瑞娟、张礼刚《试论19世纪初期柏林沙龙犹太女性的阅读行为》(《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作者论述了犹太女性沙龙是19世纪初期柏林公共领域出现的新型文化现象,阅读对柏林沙龙犹太女性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活动。作者指出了阅读对沙龙女性的塑造作用,对现代犹太女性意识的形塑以及犹太女性的现代化起到的促进作用。

张礼刚《柏林哈斯卡拉运动兴起的犹太因素》(《学海》,2015年第6期)。作者首先肯定了柏林哈斯卡拉运动对犹太的启蒙作用,及其在犹太史和欧洲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另外全面分析了近代早期犹太新知识阶层的出现和柏林犹太社团的特殊性,这为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内部条件,并从欧洲的社会变革分析了运动兴起创造的外部条件,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认识。

五、日本史

河南人对日本史的研究多集中在中日关系上,如近代中日不同的教育的不同影响、中日佛教关系等,另外还涉及日本的自然美学。

王献龄《近代中日教育不同路径对甲午战争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作者对比了甲午战前三十年中

日两国的不同教育方式:日本锐意引进西学,推行国民教育,普及基础知识,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增强了军队制胜的人力因素;而此阶段之中国依旧为没落的封建传统教育,所实施的洋务教育有很多局限,其人才不济、民智未开、思想僵化,严重制约了军事近代化建设中官兵素质的提升。作者揭示了近代中日不同的教育路径与甲午战争的结局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许效正《抗战时期中日两国佛教界关系评述》(《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文章描述了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徒对日本佛教纵容侵略、践踏佛教宗旨的行为非常不满,并与之展开了坚决斗争,两国佛教界的关系也因此降到了冰点。作者揭示了中国佛教信众对日本佛教徒的批判和斗争,既是中国佛教信众国民意识迅速觉醒的必然结果,也是佛教“慈悲救世”理念的体现和升华,这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佛教信徒的抗战积极性。

陈巍《日本自卫队派遣柬埔寨论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应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先后向柬埔寨派出两批自卫队员和军事观察员,他们负责修复道路、桥梁,辅助选举和军事观察,这为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也出现了违反其和平宪法的趋向。这反映出其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抱负。

刘玉丽《南海争端中的日本因素及其影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南海对于日本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日本对南海的政策从“经济渗透”到公开全面介入,其目的在于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而日本因素的介入也增大了中国解决南海诸国争端、矛盾的难度,使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复杂化。

[日本]仲间裕子著、胡莹译《日本艺术及其发展中的自然美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文章介绍了日本美学的主要特点,美学关键范畴日本传统艺术样式,其展现了日本艺术中所表现的与自然共在的机趣。行文自装饰开始,以风流精神为分析对象说明装饰中自然元素的重要性,探讨幽玄在日本美学讨论中的核心地位,最后以“绮丽寂”勾勒出日本美学的氛围和生机。

李恒《中美英苏接受日本投降的台前幕后》(《档案时空》,2015年第9期)。作者详细展示了日本接受投降的史料,使读者能够清晰的认识到中美英苏四国接受日本投降事件的始末。

六、其他国家和地区

除了英国史、美国史、俄罗斯史(前苏联)等之外,河南学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如法国史、西班牙史、加拿大史、朝鲜韩国史、东南亚史、埃及史等;另外,在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方面也都有涉及。

(一)法国史

董延寿《论拿破仑的婚姻思想》(《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作者得出拿破仑的婚姻思想的三个特点:早期重感情、中期感情和实用并重、晚期重政治。其婚姻思想较多受政治影响,并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

贾延斌《拿破仑与欧洲犹太人的解放》(《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作者分析了拿破仑对犹太人的政策: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带给犹太人。拿破仑以革命性的方式解放犹太人、赋予他们以平等的公民权,并对犹太人进行了改造。这一政策促进了犹太人的解放进程,并逐渐扩大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之中。

(二)西班牙史

杨春燕《斗牛运动的兴与衰》(《新乡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文章分析了西班牙斗牛运动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讨论了斗牛文化与西班牙经济的关系以及斗牛运动的去留问题。作者认为斗牛运动经久不衰的原因不仅在于其高超的技艺,而且它代表了西班牙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斗牛运动与西班牙的诸多经济行业紧密相关,虽然它遭到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但其去留问题仍难预见。

(三)加拿大

葛音《论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贫困人群的构成与分布特征》(《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作者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的贫困者在人口结构与地域分布方面的特点,并且揭示了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加拿大国内社会环境中的一些固有的、明显的特征。

(四)朝鲜、韩国

赵田园《后冷战时期韩国对朝鲜的理想主义外交》(《郑州大学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韩国自“北方外交”到冷战结束后,对外政策得以调整,其提出了“阳光政策”、“和平繁荣政策”等南北合作政策,试图推进韩国与朝鲜经济社会的统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作者认为其受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卢保婷、刘雪莹《朝鲜战争始末及对中国战略影响的再审视》(《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作者从朝鲜核问题的升级、人们从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分析了地缘政治及其历史的影响,尤其是朝鲜战争的影响,中国在此中的作用愈发显现;另外作者重新梳理朝鲜战争的始末,以史为鉴探究其对中国战略的影响,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五)东南亚

王继东《中国易学象数对越南阮朝都城顺化的影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越南阮朝都城顺化,是以明清北京城为蓝本、运用了中国易学象数的都城文化。作者从九五至尊和三极之道等方面,研究易学象数对阮朝的影响。

于向东《从悠久历史与文明的角度来看越南的过去与现在——简评萨德赛的〈越南:过去与现在〉》(《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萨德赛(Damodar R. Sar Desai)教授所著的《越南:过去与现在》一书,该书多次出版,分10章概述了越南的悠久历史。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篇幅适中,厚古薄今,把过去与现在看做一个整体的历史,放在地区和全球的历史中考察,重视越南民族的文化与特色,这与教授本人对越南史的兴趣有关,另外,作者也指出该书的一些不足之处。

于向东《试析越南阮朝明命帝的海洋意识》(《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文章认为19世纪前期越南统治者明命帝表现出一定的海洋意识,但这仅是属于古代海洋意识,其海疆意识仅仅涉及海岸关汛、海口国门的防守意识。

赵茜《2010年以来南海争端背景下的越南对外军事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作者认为自2010年以来,越南为了与中国抗衡,开始与他国开展军事外交,而且越南与它们之间的军事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赵茜《越南对中国心态纠结探源》(《内蒙古电大学刊》2015年第2期)。作者从越南与中国的历史宿怨、越南自身发展的问题、强邻的压力以及大国的推动方面,来阐述越南对中国的纠结心态。

(六)埃及

顾家伟《大河三角洲营养盐研究进展与启示——以阿斯旺建坝前后的尼罗河为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作者详细梳理了埃及阿斯旺建坝后,尼罗河三角洲和近海营养盐研究成果,重点剖析了营养盐来源、分布规律和对渔业产生的生态效益,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今后应关注的研究方向。

(七)环境方面

黄萍《欧美环境政策对我国的启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作者讨论了在环境保护方面欧盟在国际环境事务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欧盟的环境政策以其完善的一体化环境政策体系,在欧盟内部及世界范围的环境治理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对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思路。

崔小莉《基督教与佛教的生态思想对生态危机的回应》(《前沿》,2015年第5期)作者通过基督教与佛教生态思想的对比分析,说明基督教与佛教中有益的生态思想资源,这对于解决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作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需要汲取有益的文化资源,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基础。

崔小莉《基督教中的生态思想对解决生态危机的启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文章通过基督教中的生态思想分析,说明宗教中的思想文化资源具有改变人们传统价值观的作用。

(八)其他方面

郑达威《近代欧洲印刷术传播的经济偏向研

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在近代欧洲三大思想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印刷术传播对经济因素有决定作用,也对经济发展具有传播意义上的能动作用。

张晓峰《欧债危机的梳理与反思》(《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作者梳理了欧债危机的爆发、蔓延及解决过程,从国家、地区及国际三个层面来深入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而对中国应对此类危机提供借鉴。

田鹏《欧美文字实证研究(ESL)述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文学实证研究(ESL)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展于欧美的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虽然其自身尚有许多缺陷,但其实证性、跨学科性和可应用性的特征给文学研究带来了独特的价值,成为沟通文学与科学的桥梁。

李继堂《从伽利略到杨振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作者从近代科学发展史的重要理论及成就论述了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在西方近代科学革命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伽利略开创了把数学与实验完美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传统,规定了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形成所谓的“伽利略风格”。杨振宁的研究不仅很好地再现了“伽利略风格”,而且对重新理解“李约瑟问题”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启示意义。

(九)世界史教学

张礼刚《一级学科背景下地方高校世界史教学团队建设:以河南大学世界史教学团队建设为例》(《河南教育》(高教),2015年第8期)。面对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的现实,作者以自身实践经历探讨如何进行河南大学世界史教学团队建设,探索出地方高校建设世界史教学团队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有四步:一是充分认识建设世界史教学团队的重要性;二是世界史教学团队建设要突出特色与优势;三是加强内部力量的整合和外部资源的利用;四是教学团队的各个要素要协调发展。

尤建设《世界当代史教学方法改革初探:以许

昌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当代史〉课程为例》(《许昌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作者从学术史回顾、课堂教学现状、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来看,认为有必要进行世界当代史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又从实践探索方面:实行模块化、分段式教学;根据教学需要,综合运用案例式、启发式、研讨式、双语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互动。课程教学方法改革达到了预期目标。

七、专著

除了论文等,河南人也有一些专著上的成果,其中,郑州大学的张倩红老师在此方面的贡献比较突出,不仅有许多以色列发展方面的成果,而且还有一些英国史以及中外关系的论文集等著作。

张倩红著《2015 以色列发展报告 以色列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09)。本书内容上涉及范围广:包括了以色列的经济、政治、安全、社会、外交等领域,聚焦了2014年复杂的政治局势、国情状况及外交环境,分析了导致近期美以关系“降温”及中以关系“升温”的诸多因素,这对于我们了解当前以色列及中东局势,进一步深化中以关系有着重要的资讯作用与参考价值。

张倩红著《犹太史研究新维度 国家形态·历史观念·集体记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04)。针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家形态、历史观念与集体记忆这几个课题的研究未能形成系统,作者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涉及犹太史研究领域中的疑难课题:希伯来王国“有限君主制”、流散时期犹太人的国家权威观、犹太启蒙运动与犹太教改革运动的兴起、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巴以冲突与后犹太复国主义等关键性问题,学术价值极高。

西蒙·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著;张倩红译《耶路撒冷三千年》(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01)。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西蒙·蒙蒂菲奥里以客观、中立的角度,依年代顺序,生动讲述了耶路撒冷的故事。

张亚东、张倩红编《英国史论集萃》(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06.)。是一部关于英国史研究的

论文集,正文分为:英国政治与外交、英国经济与社会、英国思想与文化、英帝国与英联邦四大部分。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钱门弟子近年来在英国史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其所涉及的主题都是以前在国内研究中相对薄弱、但又在英国历史进程中有比较重要意义的问题。钱门弟子从系统研读基本文献和已有论著成果入手,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了自己的研究特点。

丘进、张倩红、万明主编《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4年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10.)。本书主要包括: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200周年与伯希的贡献;评西方首部纳西学研究专著《麽些研究》等。

陈海宏著《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失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10)。本书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工作,对世界史研究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成果。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对世界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背后发生的各种失误的分析研究成果,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体来看,2015年的世界历史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受时间、空间和语言的限制,多数学者对世界史的研究范围比较局限。传统的欧美历史的研究更加注重思想领域的研究,深挖事件背后的原因。英国史、美国史尤其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依然是研究的重点;以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为中心的以色列——犹太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著作和论文成果都很多,尤其注意开封地区的犹太社团研究;东南亚史也因地域上距中国较近成为研究的热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中日关系、中俄关系、朝韩关系等都有研究。从研究的时间阶段来看,世界历史的研究集中在世界近现代时期,世界上古史的研究几乎为空白,中世纪的历史略有涉及:集中在中世纪英国的政治制度与农业方面,这也一直是学界普遍面临的问题,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找到很好的突破途径。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考古学

2015 年度河南省考古学研究综述

孙新民

2015 年是河南考古学的又一个丰收年,考古发现不断涌现,科学研究成果迭出,科技考古继续发展,文物保护全面推进。201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 2015 年 4 月在北京揭晓,我省郑州东赵遗址和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两项成功入选,至此我省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的项目总数已达 42 个,位居全国首位。濮阳戚城龙山时代城址、郑州东赵遗址、南阳市百里奚路西汉木椁墓、汉魏洛阳城太极殿东堂遗址、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遗址,入选由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华夏考古》编辑部主办的“2014 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多个大型学术研讨会的依次召开,进一步促进了河南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大大提升了我省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知名度。

一、重要发现精彩纷呈

2015 年,我省全年完成灵井许昌人遗址、淮阳县平粮台遗址、信阳城阳城八号墓、洛阳汉魏故城遗址、洛阳邙山东汉帝陵等 20 余项主动性考古项目,抢救发掘了禹州市大吕墓地、伊川县徐阳墓地、巩义东区唐宋墓等一批古墓葬,完成发掘面积 30000 余平方米。开展了信阳出山店水库、灵州至绍兴特高压工程、孟平铁路增建二期工程、中原油田至开封输气管道、郑州机场至西华高速二期工程、中核新能源叶县马头山风电场等 10 余个重点建设项目和郑州、洛阳、安阳、新郑等城市建设的文物保护工作,发掘文物点近百处,完成发掘古代遗址和墓葬面积近 50000 平方米,获得了一大批考古实物资料。上述考古工作有效服务了全省经济建设,为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区提供资源储备和智

力支持。

河南地处旧石器时代文化南北交汇区域,近年来迭有重要考古发现。灵井许昌人遗址,曾以出土 2 颗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而闻名。2015 年度的考古发掘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同完成,于 5 月首次发现 2 块古人类肢骨化石。肢骨中一件为左侧股骨远端后面残片,另一件为左侧股骨近端残段,股骨头的骨松质已部分缺失,上面齿痕可能是古人类留下的。这两件古人类化石均属未成年个体,是自 2005 年发掘以来首次发现的肢骨化石。这次发掘还出土一件顶骨化石断块,其形状与 2014 年发现的“许昌人 2 号头骨”接近。新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同属于灵井许昌人遗址第 11 层,地层年代经测定为距今 10 万年左右。与以往的发现相比,今年的发现尤为重要:首次出现了古人类头后骨化石,可以更有条件破解古人类的进化密码;在第 11 层还发掘出土了 1000 多件哺乳动物化石和加工精美的石器,石器中小型手镐和钻具制作精致,左右对称,可代表本遗址石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龙泉洞遗址 2 号洞位于栾川县龙泉山公园内庙坡上,2015 年在洞内发现了 2 处用火遗迹和 1 处灰烬层。出土标本 8500 余件,有动物化石、石制品、烧石、烧骨、水晶等。石制品原料以脉石英为主,有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碎片等类型,体现了中国北方旧石器主工业的特点,属于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传统,又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时代特征。出土的动物化石种类有鹿、牛、羊、犀以及食肉类动物等。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可以对古人类的技术、

遗址利用等行为进行更好的分析,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古人类的文化面貌和人群之间的交流。

平粮台遗址位于淮阳县城东南四公里大朱庄村西南,1980年曾在此发现了龙山时期古城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为配合该遗址保护规划的実施和展示利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4年底至2015年,再次对平粮台遗址开展科学的考古工作。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收获。一是发现平粮台城址南门外的壕沟,残存宽度仅5.2米,深1.5—1.7米,较其它位置壕沟的25米宽明显变窄,推测可能是此处正对进出古城的南门,为了跨越的方便,这体现了古代先民科学的规划意识。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南门卫房南部,发掘出龙山时期出城道路1条,宽1.8至2.5米,残存长约9米。道路东部即为排水沟,系南门卫房之间道路下陶排水管道穿越城墙后向外排水的沟渠。三是在平粮台城址南部新发现早晚两组龙山时期的陶排水管道,为我们形象的展示了平粮台龙山时期居民筑城、排涝、修补、维护等动态过程。四是发现龙山时期竖穴土坑墓葬8座,随葬陶器有罐、壶、觚形器和盆等,这些墓葬层位相同,排列整齐,应该是一处龙山时期的墓地。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中原地区龙山时期墓地发现较少,此次发现对研究中原地区龙山时期的埋葬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河南是商周考古的重地。大吕墓地位于禹州市小吕乡大吕街一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13年9月至2015年9月对该墓地进行了2次大规模钻探和发掘。共勘探约15万平方米,发掘2640余平方米,发现新石器遗址2处、大型商代聚落1处、商周汉代墓区5处,清理商、西周、战国、汉代等时期墓葬19座,出土有青铜器、玉器、石器、原始瓷器、陶器、蚌器等遗物近300件。其中,晚商时期聚落遗址面积约在20万平方米以上。已发掘灰坑4座、房址5座、仓窖1座和水井1眼。商代墓地已清理甲字形大墓1座,中型墓2座,车马坑1座。甲字形大墓墓道南向,长方形墓室,南北长6、东西宽4.16、残深3.5米,南部二层台上残存殉人4个。虽被盗一空,其规模之大,在河南除殷墟之

外的商代墓葬中实属罕见。陪葬该座大墓的车马坑为一东西向近方形竖穴土坑,长3.62米、宽3.16至3.6米、残深0.8米。内葬车1辆、殉人1个、马2匹。马骨上各有1套完备的青铜当卢、马衔、节约组带。其青铜车件和工具完备,殉人葬马齐全,是河南省晚商时期除安阳殷墟外的首次发现。

西周墓地大中小型墓葬均有,并发现3座车马坑,已发掘了7座。大型墓3座,均为带南向墓道的大墓。墓室南部两角向外均有长方形大小不等的耳室,构成了平面近“早”字形的特殊墓形,均有棺槨葬具,头向南。耳室间设置有宽于槨室的宽大头厢。其中墓室最大的M3为男性墓,墓道略呈弧形,墓室长4.4、宽3.6、残深2.28米。M3墓壁上还发现了鲜艳朱砂层,槨盖与周围二层台上有木质葬车的痕迹,车横处发现1枚大青铜铃。大中型墓的二层台上均发现有数量不等的殉人,最少的2个,最多的5个,基本上为年轻女性,没有葬具,遗骨被夯打致碎。一些殉人身上还陪葬有玉蝉、石项链等玉石器。大墓均有腰坑,坑内各有1殉狗。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头厢和槨内北头。从已出土陶器特征上看,大型晚商聚落的时代大致为殷墟三期至四期前段,是一处重要的晚商遗址;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和葬俗特殊的西周早中期诸侯公族墓地的发现非常罕见,可能和早期许国或者吕国有关。

201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的城阳城址八号墓,位于信阳市平桥区城阳城址保护区。从20世纪50年代起,该地区陆续发掘了8座大型楚墓,包括著名的长台关一号墓、二号墓以及七号墓。八号墓平面呈“甲”字形,坐西向东,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道大致呈长方形,长6.0—6.4米,宽3.2米。墓葬全长18.5米,残存上口长10.1—10.9米,宽9—9.4米。墓室自上而下呈阶梯状逐层内收,共发现5级台阶。槨室平面呈长方形,由主室、前室、南侧室、北侧室以及北后室、中后室、南后室组成,总长6.2—6.3、宽4.8—4.9米。前室虽然被盗严重,仍发现不少陶器和彩绘漆木器,陶器主要是陶鼎、方座簋,漆木器数量较多,有案、耳杯、豆、盒等。南侧室发现有床榻、竹席、木俑、木几

以及铜镜、铜剑等,北侧室发现有木质车舆、弓、箭、箭囊、瑟,以及铜矛、铜戈、车害、车辖等。南后室发现有陶方壶、圆壶、鉴等仿铜陶礼器,表面多施彩绘。中后室发现40余个荷叶包裹,以及雕刻木案、陶鬲、陶罐等。主室双棺双椁,墓主人头部及全身被织物敷裹,织物纹样依然可辨。南后室陶壶和陶鬲可确定为战国中期楚文化遗存,与7号墓的年代相当。其他诸如彩色髹漆竹席、长柄矛、耳杯、案、几等漆木器十分精美,特别是墓主人全身敷裹的织物,是河南地区战国时期楚墓的首次发现,在全国楚文化墓葬中也十分罕见。

徐阳墓地位于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2013年发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经过对徐阳村周围进行大面积调查,并对局部区域进行较为详细的勘探,已发现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00余座,车马坑10余座,灰坑30余座、烧窑10余座,基本摸清了徐阳墓地的分布范围。2015年度的考古发掘清理墓葬2座和陪葬车马坑1座,出土一批具有东周时期特征的陶器、铜器、石器、骨器等遗物。2座墓葬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小底大,其中1座墓口长6.30,宽5.40-5.15米,深8.5米。墓室西侧棺椁之间发现饰夔龙、蟠螭纹铜鼎、铜壶、铜簋和漆器痕迹。墓室东侧棺椁之间发现龙形纽夔龙、蟠螭纹铜钲钟、钮钟、石磬等随葬遗物。车马坑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口东西长9.30,南北宽8.80米。已清理发现车7辆、马3匹,北部发现马、牛、羊头蹄,排列规整,马头15个,牛头近30个,羊头28个。从徐阳墓地墓葬形制、陶器组合、铜器、骨器纹饰特征等推测徐阳墓地应为东周时期。陪葬车马坑中埋葬马牛羊头蹄的习俗,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西北地区戎人葬俗相似。发掘者认为徐阳墓地应为陆浑戎贵族墓地,车马坑属陆浑戎国君或高级贵族的陪葬。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陆浑戎迁徙伊川的历史事件,是研究中原地区少数民族迁徙和融合的重要资料。

配合中核新能源叶县马头山风电场项目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了叶县马头山楚长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共计发掘面积800平方米,首次掌握了“方城凹口”西侧山体上两

道长城墙体的结构及时代,了解了马头山山顶上与楚长城相关的兵营遗址的内涵。在兵营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铁锛、铁匕首、铁镢、铁铤铜铤、铜戈等器物残件,以及大量的东周绳纹陶片;还清理两处与居住有关的建筑基址。此外,还在叶县保安镇后古城村勘探出东周城址一座,城址一百米见方,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

洛阳作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相继营都建国,历时1500多年。2015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对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东汉帝陵、汉唐烧窑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考古发现。经过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十多年的不断努力,洛阳东汉帝陵考古发掘又有新进展。根据史书记载,东汉12个皇帝中有11个葬在了洛阳。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及勘探,并结合史书记载,目前可基本确定这11个皇帝的帝陵共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是邙山陵墓群的东汉帝陵区,即孟津县平乐镇朱仓村西部。另一个区域位于伊滨区,即南兆域东汉帝陵区。2015年度对邙山陵墓群东汉帝陵的发掘,以被推测为顺帝宪陵的朱仓M722陵园为主,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共发现“寝殿”东门、“园省”夯土台基、“园省”天井、烧窑、兽骨坑等遗迹。其中,“寝殿”东门与原发掘的西门呈对称分布,南北面阔8米,进深7米。“园省”夯土台基东南部还发现有砖砌券顶排水沟等。烧窑位于“园省”南墙以南区域,应为陵园建造时临时设立,呈马蹄形,被废弃后作为兽骨坑,发现多具狗的骨头。此外,在“园省”以南,还发现一兽骨坑,内有牛骨一具。“寝殿”为陵园内举行祭祀的大殿,“园省”则为守陵妃子、宫人的居住区,此次发现进一步明确了东汉陵园遗址的平面布局,对了解东汉陵寝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新庄汉代烧窑遗址位于孟津县平乐镇新庄村东北部。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调查勘探时发现,共发现烧窑127座。2014年7月—2015年7月对该遗址进行试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发现遗迹包括完整烧窑3座、水井1处、沟3条、灰坑29个。三座烧窑均由通道、操作坑、窑门、

窑室和排烟系统组成,窑室顶部为砖券穹窿顶。烧窑规模较大,单个窑室的面积均在9平方米左右,窑床至券顶的高度在3米以上。烧窑的使用时间较长,且发现有多次修补的现象。在发掘区的东部和南部,发现4处形状规整的长方形坑,可能与存放炉灰、澄泥、过滤等功能有关。出土遗物以建筑材料为大宗,仅出土少量的制陶工具和日用陶器。根据遗址出土的“建武二十四年”纪年陶臼,以及空心砖“大泉五十”钱纹,推测该遗址早在东汉初期就已投入使用;而戳印“建宁”年号的带字铭文砖,则将遗址的使用年代延续到灵帝时期。该窑址地处邙山东汉陵区,出土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制作精良,规格较高,与朱仓东汉陵园遗址出土遗物基本可以对应,应是营建东汉帝陵所需建材的重要产地,是邙山东汉陵区内新发现的一处重要手工业遗存,它的发现丰富了东汉帝陵的文化内涵。

汉魏洛阳城宫城太极殿是曹魏至北魏宫城的中心正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宫城正殿,开创了中国古代宫室制度及都城布局的新时代。该遗址位于北魏宫城中部偏西北处,北距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约1公里,南距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460米。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考古队启动了对以太极殿遗址为中心的宫城中枢区的全面勘察,明确了太极殿及周边附属建筑的规模形制、布局结构、保存状况和时代序列,取得了重要成果。2015年对太极殿西侧、太极东堂及周围地面、太极殿宫院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共3000平方米。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一是初步确定太极殿夯土台基东西面阔最大宽度为102.3米,南北进深约60米。二是对早期建筑遗迹的解剖发掘,在太极殿建筑周围的地面以下,解剖发现了大面积的铺砖地面,其时代应不晚于魏晋时期。铺砖地面之下,间隔有序分布着13个柱础石(坑)。东堂夯土台基北侧的铺砖地面成“凹”字形分布。基本确认了太极殿曹魏时期始建、北魏改建沿用、北周改造的时代序列,对曹魏时期太极殿的形制布局也有了崭新的认识。三是通过对太极殿所处的宫院布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初步确定了太极殿宫院的四至。太极殿宫院是以宫

城三号门址为其南端,太极殿遗址居于其中部北端,宫院的四周以大型的廊庑建筑围合。宫院东西面阔约340、南北进深约310米,形成一个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巨大宫院建筑群。太极殿建筑群处在以三号宫门遗址为南门、大型廊庑建筑围合的大型宫院的北端居中位置,充分显示其择中而居、建中立极的政治权利中心地位,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14—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考古队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阳城南部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了明教坊西坊门、宁人坊东坊门、两坊门之间的定鼎门大街以及宁人坊东南区域内的部分夯土基础。与其它坊门相比,面朝定鼎门大街的坊门体量更为宏大。定鼎门大街最大宽度为141米,路土可分隋至初唐、盛唐、晚唐、宋、明清五期,由早至晚逐渐变窄。在宁人坊东南发现边长10.4米的方形夯土台基和南北宽7.8、东西大于20米的夯土基础,其以西80米还发现有多条边长0.9米的方形礓墩,在这些夯土基础附近都发现有铜鎏金造像、石经幢、石刻等佛教文物。《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宁人坊内有龙兴寺,从这些夯土基础与出土文物来看可能与龙兴寺有关。

新街口烧窑遗址位于洛阳市瀍河西岸,西距新街约100米,属于隋唐洛阳城洛北里坊区范围内。2015年9月至12月对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350平方米,清理河道1条、夯土遗迹1处、砖瓦窑址32座等。32座烧窑均由操作通道、窑门、窑室和排烟系统组成,窑室顶均已坍塌。根据窑址位置、形制以及包含物的不同可分为两期:隋唐时期17座,烧窑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平面呈“马蹄形”,呈一字排列。其中北部8座窑址位于宋代窑址操作通道的下部。北宋时期15座,其中2座仅存火膛部分。余13座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平面均呈圆形,呈曲尺形排列。南北向10座,东西向3座,窑门外侧为一长方形操作通道,其底部有一条宽0.3—0.9米,深约0.2米的沟槽。在发掘区中部偏东,残存有码放整齐的长方形砖、踩踏痕迹以及平铺砖遗迹,应是与窑址相关的作坊遗存。此处窑址

布局统一、排列整齐,遗址内出土有大量的隋唐及宋代时期的建筑构件砖瓦等,部分砖上有戳印有“官”字,应为隋唐及宋代时期漕河流域大型官营窑场的一部分,对研究隋唐及宋代时期洛阳城营建和修缮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5月至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巩义东区的城市建筑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先后清理唐宋时期墓葬数十座,出土了瓷器、三彩及单彩器、铜器、银器、陶器等重要文物。在这些出土文物中,尤以三彩或单彩的茶具以及绞胎瓷器的发现更为重要。三彩或单彩的茶具出土于唐代中晚期之际的三座墓葬中。三座墓均为小型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主要随葬品有瓷器、三彩及单彩器、铜器、铁器、石质墓志及墨书砖志等。唐代茶具的主要类型有三彩或单彩的炉及坐俑、茶盘、茶碾、茶罐、执壶,还有瓷碗、瓷碟、瓷盏等,人物形象逼真,制作十分精致。绞胎器出土于唐代以及宋代早期的墓葬中,主要类型有枕、杯以及碗等。这些考古发现为推动唐代茶文化以及唐代绞胎器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学术会议递次召开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夏商周都城主要在河南地区,我省在夏商周考古工作中占据重要的学术地位。2015年11月,由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2015年年会暨考古视野中的早商文化与先商文化论坛”在开封召开。本次文化论坛分为主旨发言及考古新发现、专题发言两个部分,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作了《发扬科学求真精神,进一步推进夏商考古研究》的主旨发言。与会学者分别介绍了焦作李屯、新乡王门、定陶十里铺及焦作安阳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本次会议是对以往关于先商、早商考古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进一步促进了先商、早商相关问题的研究。

夏商周时期中原和周边地区交流融合、相互促进,奠定了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1955年郑州商城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夏商周考古研究进入

了一个新的时代。以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为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和郑州商城的发现、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缅怀韩维周、安金槐、邹衡三位考古学家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进一步推动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局、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于2015年7月在郑州联合举办“夏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周边——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关系、郑州商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进一步深化了夏商周时期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出版了《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研究》和《郑州商城陶器集萃》两书。《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研究》收录了考古学界60年来对郑州商城遗址的重要研究文章44篇,全景式记录郑州商城60年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历程。《郑州商城陶器集萃》收录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洛达庙期、二里岗期和人民公园期的代表性陶器600多件,器类包括炊器、盛储器、酒器等,书前附有“郑州商城发现历程和出土陶器综论”的导言,集中展现郑州商城出土陶器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2015年11月,由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博物院、信阳市文化广电出版局承办的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四次年会在信阳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有5项:楚文化考古新发现,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楚系墓葬研究新进展,楚文化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研究,楚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研究。会议收到论文78篇,分别有河南、湖北、湖南考古学者在大会上报告了楚文化考古新发现;与会代表分别就楚文化考古新发现、楚文化综合研究、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等开展专题学术讨论,相互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积极探索合作途径,推动了楚文化研究继续向前发展。

丝绸之路与大运河作为近年入选的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和卓

越代表。前者以陆路东西沟通亚欧两大洲,后者以洛阳为中心,由水路贯通中国南北,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二者的有机结合促进了中原地区古代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与交流。2015年12月,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河南省文物局、郑州大学主办的“中原古代丝绸之路与大运河学术研讨会(2015)”在郑州召开。专家学者从各自的研究成果出发,对洛阳古丝绸之路、通济渠、永济渠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讨论;对古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和研究;对古丝绸颜色、古代丝绸之路上所见河南的特征与历史地位,中原地区隋唐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等也进行了交流和深入探讨。本次会议将丝绸之路与大运河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将进一步推动今后研究古代中原地区丝绸之路与大运河在经济、文化、历史价值等方面的进程。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90周年华诞,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协办的“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于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并于2015年11月举办了汝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次展出文物共计135件,其中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的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和汝州市内张公巷窑遗址考古发掘品72件,宝丰县文物管理处收藏的北宋窖藏出土汝窑瓷器4件,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传世和出土汝窑瓷器以及明清仿汝釉瓷器的整体面貌。从文献记载来看,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由于烧造时间短,致使流传至今的传世品不足百件。自1987年至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对位于清凉寺村的汝窑遗址进行了12次考古发掘,获得大量瓷器、窑具等标本,揭露出窑炉、作坊等遗迹,找到了烧造御用瓷器的中心区,为全面认识汝窑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三、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2015年,河南考古学研究成果迭出。由河南省文物局主编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进入收获期,陆续由科学出版社推出了《荥阳官庄遗址》《淇县黄庄墓地二区

发掘报告》《淇县西杨庄墓地、黄庄墓地I区发掘报告》《卫辉大司马墓地》《淅川新四队墓地》等多部成果。尤其是《舞阳贾湖》(二)、《元代靳德茂墓出土文物科技保护及其相关研究》等考古研究报告的问世,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另外,还出版有《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第二辑)》《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古代青铜器修复与保护技术》、韩建业著的《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杜金鹏等著的《前世今生(偃师商城遗址考古与保护)》、阎铁成著的《重读郑州(一座由考古发现的创世王都)》、孔德铭著的《安阳墓志选编》等一批图书。

《舞阳贾湖》(二)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联合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全面、系统地报道了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2001年第七次发掘的资料及研究成果。贾湖遗址是目前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裴李岗时期文化遗址,在以往发掘中曾出土有八九千年的七孔骨笛、人工栽培稻米、龟甲刻划符号等重要遗物。2001年发掘共发现房基8座、灰坑83座、陶窑3座、兽坑2座,墓葬近百座,各种遗物数百件及大量动植物标本。全书分十八章,大体由资料篇、环境篇、经济篇、技术篇、聚落篇、思想篇和结语七个部分组成,在详细报道发掘所获丰富的遗迹遗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农业考古、环境考古等领域的研究,同时还开展了食性、锶同位素、寄生虫等新的研究,为距今9000—7500年间中原地区和淮河流域人类生存策略及环境背景、聚落形态、人口交流和技术工艺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和研究案例。

嵩山地区是中华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嵩山地区在研究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大考古课题当中的重要作用日益被国内外学术界所认识。2013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研究中心、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和郑州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嵩山文明与早期中

国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市召开。2015 年出版的《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第二辑)》,即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内容涵盖郑州考古、历史等学科的研究文章,大大推进了嵩山文明的深入研究。

由北京联合大学韩建业著的《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201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丰富考古学资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早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就已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观点,认为早期中国是有中心有主体的超稳定的多元一体结构,有着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基本特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过程。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直到晚商的漫长时期,其早期中国文化中心主要在中原地区。本书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环境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进行综合研究,尤其是在考古学与传说资料的对应、文化的变化发展与人地关系互动方面的探索,从整个文明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观点新颖,脉络清晰。

偃师商城是中国夏、商王朝改朝换代的界标,也是中国最早规划严谨、布局整齐、城墙与护城河互为表里的都城遗址。其宫城是我国夏商周三代唯一被完整科学发掘出的宫城遗址,在宫室制度方面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等编著的《前世今生(偃师商城遗址考古与保护)》以图册的形式,全面介绍了偃师商城的发现发掘过程、主要研究成果、重大历史内涵、遗址多重价值及其保护和展示的理念,对偃师商城作了全景式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

2013 年 11 月,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与会代表围绕楚文化考古新发现、楚地出土文献、楚国名物制度、早期楚文化以及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即由本次年会提交的论文选编而成,共收入 58 篇学术论文。其中,楚长城的修建及功用、淅川下寺乙组高级贵族墓社会性别特征浅析、陈楚关系及周口楚墓初探、楚文化与濮文化关系研究、淅川楚国青铜器组合和铸造工艺技术、河南出土春秋虎形玉雕装饰工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许、叶间地名丛考、浅析周

代应国贵族人物名、字、溢称谓等 10 余篇与河南楚文化相关的论文,多为河南学者所撰写,展示了河南年轻学者的风采和实力。

荥阳官庄遗址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于 2010 年 10 月 ~ 2011 年 1 月进行了考古钻探与发掘,发现了两周、汉唐及清代多个时期遗存,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最为丰富。官庄遗址是继荥阳娘娘寨遗址之后,郑州西部地区发现的两周时期又一大型聚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荥阳官庄遗址》发掘报告包括概论、西周文化遗存、春秋文化遗存、汉代遗存、唐代遗存、清代遗存及结语计 7 章内容,较为详细地公布了这批发掘资料,为研究荥阳地区两周及汉、唐文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淇县黄庄墓地分作两区,Ⅰ区在黄庄村东,Ⅱ区在黄庄村东南,皆由鹤壁市文物工作队主持发掘。其中,Ⅱ区于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2 月先后经过两次发掘,共清理清代墓葬 1 座、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墓葬 30 座,墓葬出土有陶、铁、青铜等质地的随葬器物。《淇县黄庄墓地二区发掘报告》就是上述两次考古发掘成果的总结,对于揭示淇县西部平原地区的汉代墓葬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淇县西杨庄墓地、黄庄墓地Ⅰ区发掘报告》作为淇县西杨庄墓地、黄庄墓地Ⅰ区的发掘报告,对两个墓地发现的 52 座两汉、宋元时期墓葬,21 个灰坑,8 条灰沟,1 口水井以及 1 个积石坑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叙述。在黄庄墓地Ⅰ区发掘的 22 座墓葬中,大多数年代为西汉时期,并且出土有不少彩绘陶器,杨庄墓地宋元时期墓葬还随葬有一些瓷器,这对认识淇县地区两汉、宋元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大司马墓地位于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大司马村北,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于 2006 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卫辉大司马墓地》分上、下两编,上编以墓葬为单位,全面和详细地公布了在该墓地发掘的 26 座墓葬,其中汉墓、隋唐墓各 1 座,宋墓 3 座,西晋墓 4 座,明清墓 17 座,为研究豫东北一带汉晋至明清时期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下编为综合研究,除公布了该墓地的两批人骨鉴定报告外,收录

了研究大司马墓地考古材料的专题论文3篇,涉及小五铢、乞伏令和墓志铭、朱书板瓦等,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这批材料所反映的币制、墓主身份、丧葬习俗进行了探讨。

2010年7-9月,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淅川新四队墓群进行了发掘,共发掘战国秦汉墓葬43座、元明清墓葬5座。《淅川新四队墓地》发掘报告在全面、系统介绍新四队发现的48座墓葬资料的基础上,对墓葬形制、陪葬品、墓葬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总结了墓葬的时代特点、地域特征、等级归属及其合葬形式等。该墓地应是由多个等级不高的家族墓地组成的综合性墓地,结合墓葬规模小、随葬器物品种及其数量少、质地相对单一等因素来看,墓葬等级较高者可能为低级官吏或中小地主,等级低者则为一般平民。

焦作市博物馆编著的《元代靳德茂墓出土文物科技保护及其相关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靳德茂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历任尚药太医、太医院副使,封阶嘉议大夫、怀孟路总管。元代靳德茂墓位于焦作市中站区许衡街道办事处东王封村东南1公里处,2007年5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进行了发掘。在长8米、宽6米、深7米的墓道底部,共发掘出墓志等珍贵文物85件(套),其中80件(套)彩绘人物俑和陶车马,组成了一支庞大壮观的出行仪仗方队。这些陶俑制作精美,彩绘色泽艳丽,人物俑表情生动,为研究元代焦作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组织结构、丧葬风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元代出行仪仗方阵彩绘陶俑出土后,焦作市博物馆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合作,完成了全部彩绘文物的修复保护。本书将靳德茂墓进行整理出版,

同时记录这批文物修复保护成果,并围绕靳德茂其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古代青铜器修复与保护技术》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新民、郭移洪编著,大象出版社出版。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自然科学日益广泛地走进考古学。科技考古学的建立,表现在青铜器修复技术上,即不断引进先进的仪器及设备。马新民与郭移洪等在修复古代青铜器时,用创新的思维,创造性地运用一些机械设备,发明了一些修复工具,不仅获得了相关的专利权,而且大大提高了技术水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本书即是他们通过长期实践,不断摸索创新,对于河南古代青铜器修复与保护成果的科学总结,必将大大推动河南文物科技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版了《华夏考古》1-4期,河南博物院出版了《中原文物》1-6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出版了《洛阳考古》1-4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合作,将《黄河黄土黄种人·炎黄文化》改版为《华夏文明》月刊,每年度出版12期,为河南乃至全国文博工作者再添一处发表学术成果的窗口。全省文物考古研究人员在《考古》《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人类学学报》《考古与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大众考古》等专业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或考古简报100余篇,不仅报道了以往的考古发现成果,其研究内容涵盖了河南考古学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元明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专题。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学

2015 年度河南省文学研究综述

范红娟 尹 诗

2015 年,河南省广大文学工作者认真学习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努力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运用于创作实践,在创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导向,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讲述中国故事,抒写中国精神,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从河南省作家协会等相关部门得到的统计数字,2015 年河南省文学创作产量持续稳步增长,名家力作层出不穷,新人新作也有不俗表现;在文学评论领域,关于河南文学的研究非常活跃,整个河南文学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一、文学创作

(一) 小说和网络文学

2015 年河南文学的一大收获,是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生命册》的构思颇具新意,全书十二章,奇数章是主人公骆驼的故事,指向现实,偶数章是无梁村故事,指向历史。两个时间维度的故事在外层上除了叙述人“我”之外,没有情节上的密切联系。李佩甫关注的不是故事逻辑的统一性,而是以悲悯的人文情怀,打量着“绵阳地”的芸芸众生:不管疯狂如骆驼,还是卑贱如虫嫂,人生的轨迹与结局,都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生活如同炼狱,每个人物质上或精神上都必然在这个炼狱中承受地火的煎熬,且无可奈何,无可逃遁,他们的悲剧不是个别人的,而是弥漫在这片大地上的生存悲剧。这部小说虽然发表于 2012 年,但是,它在三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中获奖,代表着当前文学界对李佩甫、对河南文学成绩

的承认与褒奖。

无独有偶,程韬光发表于 2015 年的长篇历史小说的《碧霄一鹤——刘禹锡》,也荣获了河南省最高文学奖项——河南省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程韬光在继为豫籍文学家杜甫、白居易立传后,又为荥阳籍文学家刘禹锡作传。小说瞩目于刘禹锡的多面性,抒写诗人与权力、诗与政治之间难以调解的冲突,试图从中探窥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与世俗、精神追求与现实生存之前艰难行走的奥秘。从情感倾向看,程韬光对刘禹锡晚年寄情山水赞赏有加,其言下之意显然认为一个人的精神自由要远远高于对物质世界的追逐,在当下物欲第一的时代,程韬光“借古鉴今”的意味十分明显。

2015 年,豫籍作家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曲终人散》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曲终人散》是官场反腐小说的模式,但是,周大新刻意凸显的是小说的写实意义。小说披露其内容为省长写传记的采访素材,主人公欧阳万彤是从基层干部一步步迈上省长高位的官人,他一生为官追求独善其身,当好父母官,但是,他的官场路却步步维艰,甚至因此而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在目前反腐倡廉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中,《曲终人散》是一部典型的唱响主旋律的作品,周大新的目的,不只是树立一个清廉拒腐的好官,而是要表达一个严肃作家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严肃看法,因此,这部小说在目前的文学生产中具有正向的独特性。

2015 年,河南作家在中篇小说创作方面呈现上升势头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多数作品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聚焦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现状,讲

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这些小说因为大都贴近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可读性极强。

许昌作家李清源这两年全国开始声名鹊起。他的中篇小说构思别致,叙事富有现代气质而又不是装腔作势,内容上聚焦社会人生,富有很强的人文主义气息,颇受读者和学者赞赏。2015年《小说月刊》首次转载李清源发表于2014年《当代》第6期上的中篇小说《走失的卡诺》,并加编者按专题推荐李清源的中篇小说。本年度,李清源又发表5部中篇小说,1篇短篇小说,其中在中国著名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上刊载了两部中篇小说《苏让的救赎》和《相见欢》,并且《苏让的救赎》获得《当代》2015年中短篇小说总冠军。《苏让的救赎》的主角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屌丝苏让,故事核心围绕苏让的父亲捡到10万元巨款,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让苏让逐渐明白,原来一直被自己看不起、乃至憎恨的父亲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人。小说的重心不在于审视社会的世道人心,而是以反笔的方式揭示出现实世界的各种丑相背后仍深孕温情,因此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充满温暖与力量的小说。

2015年,申剑在《山花》上发表两部中篇小说《白衣胜雪》和《太平天下》,其中《白衣胜雪》品质更高。申剑在其中讲了一个极为精彩的、不断反转的故事:白衣“天使”何无疆以精湛的医术救了一个农民工梁小糖,并且,这一对医患关系发展成了相知的朋友关系。然而,梁小糖病好之后却玩失踪,在给何无疆留下了巨额医疗债务的同时,也使何无疆彻底丧失了对人的信任。若干年后,何无疆再次在手术台见到了梁小糖,此时的梁小糖是一位身受重伤的抢劫惯犯。在治疗过程中,何无疆逐渐了解到梁小糖当年因为无力承担医疗费而逃离医院,因为深受良心谴责,无力筹钱还债而走上抢劫的不归路。小说以何无疆为叙事视角,借助他的坦荡和逼视,告诉读者:生活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龌龊和令人绝望,每一个人内心都埋藏着善的种子,因此,我们应该对生活,对人性充满希望。

2015年,河南中篇小说创作风格趋向多样化。如戴来的中篇小说《都去哪儿了》,小说的语言完全抛掉了作者惯有的精致和婉转,显得异常粗粝,

但是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把生活的真相铺陈在读者面前,读起来让人觉得异常亲切。赵大河的《马戏团》是一部新历史故事,小说风趣幽默而又隐藏着深沉的力量。田中禾的《库尔喀拉之恋》、乔叶的《卡格博峰上的雪》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力量。梁深义的《唱戏》、赵瑜的《老张吧,那人就那样》,把目光转向历史,写在“左倾”政治横行时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些荒唐事,揭示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人性的割裂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丧失,在对历史的审视中见出深沉的人性思考。沈靖的《铜壶》,陈铁军的《轰炸》则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描写那段历史给人们留下的惨痛的哀伤。行者的《食物链》、张陀的《出轨》、赵瑜的《实习期》、申剑的《太平天下》、陈铁军的《谁也别想走》、安庆的《穿过雨季的前方》、蔚然的《向左转向右转》、傅爱毛的《非常疯子》、张云涛的《小警察》则摹写现实人生的种种“色相”,或鞭辟入里,或种下希望,都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

必须承认,短篇小说体制在目前的文学语境中并不红火,但是河南作家群依然显示出旺盛的创作精力。豫籍作家刘庆邦被誉为是中国当下的短篇小说之王,2015年度,刘庆邦发表了《杏花雨》、《红围巾》、《银扣子》等多篇作品。《银扣子》是典型的刘庆邦式的苦难叙事,描写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拜入老银匠门下学手艺,但是却始终得不到信任,后来因为5个银扣子的失与得,少年无奈远走他乡,吃了兵粮,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小说的矛头对准了人性的猜疑与冷漠。《杏花雨》则相反,作品写一对北漂小夫妻离婚之后在男方父亲葬礼上的一顿哭,悲伤的哭却让我们感觉到了人性温软的部分被触动,让未来的天空显得不那么昏暗。

青年作家历来是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本年度最富有创新性的作品也出自于他们笔下,在这方面,乔叶和戴来表现的更为突出。她们分别创作的《塔拉,塔拉——致我呼伦贝尔的朋友》、《表态》被多种选本采用。乔叶的《塔拉,塔拉——致我呼伦贝尔的朋友》和《煮饺子千万不能破》完全用散文文化的方式,前者写“我”在呼伦贝尔的一次兴之所

至的旅游,却幸遇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塔拉;后者写“我”吃饺子的一次经历。两篇小说阐释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浓浓的爱意和朴素熏人的生活气息,充满了温馨的力量,是彰显正能量的小说。戴来的《表态》以这些年来刻意追求的男性视角,叙述了一老一少两个男人逼仄的婚姻生活。老人深更半夜刷寻人启事,却是自己找自己;年轻人在雨夜自己把自己关在了门外。两个男人共同的特点,是等待迷失在外的另一半回来,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谨慎的审视与委婉的批评。

在2015年,还有一些短篇小说也很引人注目。蒋一谈的《二泉不映月》以第一人称“我”叙述一个在台老兵对故乡与发妻的思念,但是,历史已经撕裂了与亲人、故乡的纽带,堵绝了老兵的回乡路,因此留下“二泉不映月”的人生遗憾。赵大河的《浮生一日》同样写的是历史遗留的惨痛记忆。小说的构思颇富匠心:单数章节是历史,写在印度经商的唐诺接到母丧速归的电报,坐飞机回腾冲奔丧,飞机降落昆明机场,赶上云南省卢汉起义,他被当作特务关押起来,坐牢几十年;双数章节写作者对中国远征军老兵唐诺的采访。赵大河有意采用历史与现实交叉,拉伸故事的纵深,为读者认识历史、了解抗战英雄的心灵史开启一个新的视角。

除上述小说外,赵大河的《帷幕后的笑声》,墨柳的《糖》,鱼禾的《失踪的》,李胜志的《国旗下的讲话》,王中明的《给寂寞一些温暖》、叶剑秀的《石牌坊》都是本年度河南短篇小说的结出的丰硕成果,也集中体现了本年度河南短篇小说的整体水平。

网络文学逐渐成为普通读者阅读的重要选择对象,河南网络文学在2015年也获得了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写手加入到网络文学的写作大军中。同时,河南文学界也在有意识地整合网络文学写作队伍,加强对这支生力军的引导与管理,使之更好地发挥网络文学的效用,服务民众。相信不久的将来,河南网络文学在正确的引导,一定能够加快发展步伐,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二) 诗歌

在当代文坛,河南诗坛一直是共和国诗坛的重

镇。2015年,河南诗歌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严肃诗歌逐渐向民间渗透,各种诗歌主题活动在全省多个区域、多种层面展开,大大改善了河南的诗歌环境。2015年伊始,开封市上河诗社就联合开封市道德大讲堂总堂举办了开封市2015年元宵节诗歌晚会,晚会现场,既有普希金的《致凯恩》、余光中《乡愁》、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齐遂林《明月逐人来》等名篇佳作,也有如紫觞的《3月,我与雷锋有约》等新作。本年中,鹤壁市于2014年开启的首届“中国诗河 鹤壁”全国诗歌大赛揭晓,河南诗人梁文超、徐慧根、王宏雷、韩冰、纯水山色、康湘民等20余位诗人的作品在获奖作品之列。本年底,来自海内外的诗歌创作者和诗歌爱好者齐聚开封,举行“诗兴开封”国际诗歌大赛,经过层层评选,共有98名参赛者获奖。除上述三大活动外,一些自媒体平台如“郑在读诗”在民间非常活跃,他们对优秀诗歌的传播和诗歌受众的培育起着良好的作用。

另一方面,河南严肃诗歌创作延续以往良好的创作态势,如一些享誉全国的著名的诗人邵丽、蓝蓝、马新朝、何向阳等仍然非常活跃,在本年度发表了一些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诗篇,并进入到本年度各种诗歌选本。

本年度中年女性生存体验和生命经历的诗歌显得特别突出,这些诗作显示出中年女性成熟的生命特质和特有的人生需求。如邵丽在本年度有两首诗《请别让我哭泣》《致小女人》进入《2015中国年度诗选》。这两首诗以邵丽特有的细腻情思和笔法,抒写中年女性对爱的呼喊,理性、直接而又不失于对美的追求。何向阳发表于本年度的《无限接近》和组诗《失眠》《从前》《谷雨》《盟》《离开》等,如她的文学批评文章一样,细腻而有力,诗作明显见出一个步入中年后的女性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虑,文思细密,文雅,而睿智。与上述两位诗人相比,蓝蓝是一位专治诗歌的作家,本年度她发表了《无题》、长诗《沙粒》等多篇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沙粒》是诗人系列诗学随想。在这些富于美感与力度的随笔中,极其自由地展现了诗人的写作经验、对人生的智性思考,把女性的细腻和独特

的生命体验表达得淋漓尽致。读者阅读这些文字,很容易把自己带入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激发着自己对内在生命的寻找。与之相比,琳子的《皱纹女人》就抛掉玄思部分,直写岁月给女性留下的生命印痕,以及女性对爱、对知心的渴望,文笔直爽而富有力量。

除了中年创作这个特殊的群体之外,其他方面的诗歌创作也引人注目。霍楠楠的组诗《低音区》,表现了一个生存于现代都市的女性站在城市的不同区域打量着世间万相,诗思轻渺而文字沉重,把现代人在现代都市里的孤独、寂寞妙化于笔端,形象而生动。邓万鹏《好地方》(三首)则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抒写对故乡的思念、负疚。魔头贝贝的《未眠者》(五首),以奇特的诗思和极富跳跃性的语言与结构,表现一个现代人对乡土世界和世界佛心的抽象玄思,他的诗歌似乎处于一种可读不可解的奇妙状态。陈十三的《与寂静有关》(四首)表现出一种陈子昂似的生命迷惘,站在天地之间,对自然、对生命本身不断地进行追问,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感。青青的《我看见新月轰鸣着坠落》(六首)抛开了城市,转向于乡土描写,把对大山的情思寄托在笔端,恢复了诗歌空旷、辽远的想象力量,清新,神秘而富有韵味。这些较为年轻的诗人的写作虽稍显稚嫩,但是却充满朝气,正在慢慢向全国诗届传播,未来河南诗歌发展也因此可期。

(三)散文与报告文学

盛世出散文。2015年度,河南散文创作繁荣依旧,多篇散文作品在全国不同级别的平台上获奖,引起广泛注意。

《散文选刊》自2010年起,连续六年举办“年度华文最佳散文”活动。在2015年度华文最佳散文8篇获奖作品中,有2篇河南散文作品获奖。何向阳的学术随笔《柳青的“于心不安”》从作家柳青的一部散文集入手,揭示柳青时代的作家不是封闭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而是非常了解民众生活,正是因为熟悉民众和民生,他们的作品里甚至有极为先进的蓝图规划。这篇文章的言下之意也不证自明,非常值得当下文坛细细品味。艾云的《谁的个人悲伤》从“我”的生活轨迹和生活体验出发,来追

问个体生命在群体社会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身体属于个人,又不仅仅属于个人。因为当我们在昏聩中迷失时,个人的悲伤将衍化成民族的痼疾。”文章的口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当年周作人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思想,充满浓郁的人本主义气息。

在第二届河南杜甫文学奖获奖的3篇(部)散文作品中,有两篇(部)是于2015年发表或出版。叶灵的《秦淮水骨》是一篇游记。秦淮风景是文学家钟爱的写作对象,在现代创作中就有朱自清和俞平伯两位前辈曾笔耕于此,并成为两座大山,让后来者望而生畏。叶灵却选择秦淮河最著名的传说李香君入手,以女性的细腻笔触探究女性命运,笔墨纵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流畅恣肆,可读性极强。韩晓民的《民间记忆》是作家辑刊了30多篇自己的专栏文章而成。韩晓民是河南著名的民俗专家,他这部以描述中原民俗为内容的散文集内容因此也非常充实,从小到民间的剃头、吃桌风俗,大到孝道,农耕收获文化,30多篇文章囊括了中原地区的礼教、饭食、游戏、信仰、节日、文艺等,称得上是一本中原民俗百科全书,可读性极强,自问世之后,就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除了上述获奖作品之外,其他河南作家的散文也具有较高的品质。周大新《又见青瓷》的主角是越窑青瓷工艺美术大师施珍,文章却从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开始,由远及近,由个体到群体,文笔亲切,富有生活气息,而文意上却极为绚烂,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著名学者耿占春的《隐形书写》是一些断片式的思想札记,他分析,论证,提问时间、生命、历史、梦想等在人类身上留下的印痕,并着迷于揭示语言与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富有思辨色彩。这篇散文与写作者的身份非常协调,是不折不扣的思想者絮语。谭丽娜的《风情济州岛》是一篇域外游记,极富现代气息。除此之外,南丁的《嫁衣》,乔叶的《片段》,胡亚才的《1929年的那次比武》,熊西平的《风中百合》以及鱼禾的随笔等,都是2015年度河南散文的重要收获。

近几年来,随着河南各地市报告文学学会成立,报告文学创作有复兴之势。本年度最引人注目

的报告文学之一,是郑雄的《中国红旗渠》。在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中纪委监察部网站2015年推荐书目之首”的字样,并且印上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话:“看到红旗渠,我很震撼,在这里我想到的是中华民族顽强拼搏、奋斗不息的精神!”郑雄通过现场调查、口述实录的方式,从红旗渠建设者、红旗渠精神的报道者、红旗渠精神的传承者那里获得大量一手资料,精心讲述了红旗渠及红旗渠精神的诞生、发展的过程,既还原了历史真相,又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成为宣传红旗渠精神的一部重要的报告文学。2015年,《中国红旗渠》发表后不久,就获得了第二届河南杜甫文学奖。

二、文学理论评论

2015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随后,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单行本,并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掀起了新一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新高潮。《讲话》立足于中国文艺工作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需求,明确回应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当下以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艺工作需要遵循的新原则、新方法,指出文艺繁荣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是民族复兴伟业的标志之一。《讲话》针对现实文艺工作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指出作家要感时代风气之先,不可有浮躁之气,分美丑,辨是非,抒写正能量,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作品。10月19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对落实讲话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6部分25条意见,成为当前和今后推动文艺工作的基本指针和切实措施。

围绕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河南省文艺批评界在不断地深入学习与贯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李佩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做“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家应该深入时代生活,找出属于自己的“平原”,自己的“家”,做“精神家园”的守护者。何弘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不负时代著好文》,指出文艺工作

者应该走出个人情趣的小圈子,文艺批评不能与社会现实脱节,要有能力关注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

2015年度,是河南文学的研究的大年,多地和多个平台贡献了诸多河南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年初,由河南省诗歌学会主办的纪念著名诗人苏金伞座谈会在郑州举行,自此掀起了一年多的苏金伞诗歌阅读与研究热,白玉红发表《解读苏金伞诗歌的灵魂价值》,李海英发表《政治无意识下乡土抒情的迂回——以苏金伞的诗歌创作为例》,进一步深入解读了我省已故著名诗人苏金伞的诗作。同年度,《郑州师范教育》、《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等专业学术期刊开辟河南文学研究专栏,发表了一批有质量的研究文章,为进一步推介河南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莽原》、《牡丹》、《大观》等河南省文学期刊也开辟河南作家研究专栏,发表阎连科的《“八零后”:怯弱的一代》、《神实主义的中国与文学》,访谈《卡夫卡奖后的阎连科》;周大新的创作谈《哼个小曲听一听》,乔叶的《在场漫谈》等。另外,在这些杂志上还发表张延文的研究文章《访谈周大新》、《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吟唱》。省外的期刊如《山花》也发表墨白的《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谈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指出文学从来都不是站在缥缈的虚远立场上谈论现实,同时,文学又是一种特殊存在,始终不能抛弃精神的高贵。

2015年是河南文学研究的一个大年,还表现在《中原作家研究丛刊》的出版。这部关于河南当代文学的研究丛刊是由信阳师范学院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为主体,联合了省内外多名专家学者主持编纂的大型河南文学研究资料文库,丛刊辑录白桦、周大新、刘震云、二月河、张一弓、阎连科、刘庆邦、李佩甫、田中禾、张宇、李洱、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我省15位著名作家的研究资料,成为目前最为完备的河南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专集,为研究河南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提供良好的资料基础。

除上述成绩外,基础理论研究在本年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鲁枢元的《生态社会能否成为一种期待》《文学的文化之根与自然之根》《现代人丢

失了自己的精神之根》，从文学生态学入手，着眼于文学生态美学的构建，讨论中国当下文学的生态表述问题。何弘的《网络文学的模式转变与精神担当》，讨论了在日益膨胀的网络文学创作中，网络文学的创作伦理问题。刘进才《民间的何以成为民族的——文学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文体及语言问题》，尹诗的《用文化细节构建“别样文学史”》《〈雷雨〉的市民接受真相——兼及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话剧通俗化的趋势》，白玉红的《阿 Q 和“阿 Q”们》等也是本年度一些重要的文学研究成果。

结 语

总之，在 2015 年度，河南文学界和文学研究界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创作和研究持续力。整个学界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遵循《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所指定的意见规划，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借助河南深厚的文化底蕴，认真创作和研究，为打造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015 年度河南省图书·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综述

张怀涛 耿伟杰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在 2015 年遇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就是随着“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在全社会形成共识,需要理论工作者进行相应的探讨。本文通过对阅读推广、图书馆学、资源建设、信息服务、档案学等五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2015 年河南省图书·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概况如下。

一、阅读推广

(一) 阅读推广理论

要实现“书香社会”的目标与愿景,倡导“全民阅读”是必由的途径与过程,实施“阅读推广”则是最有力的抓手与措施。张怀涛《阅读推广方式的维度观察》认为读者、读物、阅读环境是人们阅读活动的要素,也是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着力点,而阅读推广方式也是依据这三个维度形成的。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是社会阅读的需要,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高校图书馆肩负着青年大学生的阅读推广使命,更是任重而道远。张新杰《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实践与思考——以南阳理工学院图书馆为例》通过对南阳理工学院图书馆开展的系列活动分析,指出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必须树立“大阅读”理念,善于利用新媒体技术,激发读者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使阅读推广工作持续、稳定发展。张红军《我国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服务模式观察》分析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发挥的作用,介绍了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推广全民阅读的服务模式,最后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服务模式。《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以“大阅读观”为核心,对

读书理论与阅读实践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张怀涛从 8 个方面对它们进行了梳理、总结和归纳。我国关于全民阅读的理论研究较薄弱,需要加强。

我国有着悠久的阅读文化,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何新会《清代公共阅读活动探析》认为清代的公共阅读活动起到了传播文化、发展教育、救亡图存的历史作用。张怀涛《耕读传家有义方——感悟中国传统家训中的阅读观》对中国传统家训中一些具有思想内涵和借鉴价值的阅读理念进行了阐释。

(二) 阅读推广工作

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是目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为了更真实、全面地了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和需求,以提升阅读推广活动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曹炳霞《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研究——以郑州大学图书馆“重命经典”活动为例》对高校图书馆的经典阅读推广提出建议:明确“何为经典”,做好书目推荐;以人文经典为重点,循序渐进逐步推广;以分众推广为抓手,坚持差异化的推广策略。微博的出现,让信息的传播更迅速、更快捷,信息受众群体也更广阔,实现了信息传播的蝴蝶效应。岳修志《基于读者自主调查的大学生阅读状况分析——以中原工学院为例》介绍了中原工学院图书馆在图书借阅排行等记录的基础上,学生组成兴趣小组进行观察,自主设计问卷、组织访谈,分析中原工学院大学生阅读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于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受到重视。郭文玲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专题微博之建设——以@大学生阅读分享平台为例》系统梳理了高校图书馆微博阅读推广的现状,并从阅读方向引导、阅读方法指导、阅读资源推荐、阅读活动直播、阅读体会分享等方面介绍了阅读推广的主要内容及栏目,同时讨论了具体的实施方式。郭文玲《基于微博平台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比较研究》对10所高校图书馆的微博概况、微博阅读推广内容、微博阅读推广体系进行统计比较,发现存在如下问题:缺少主题化的“微语录”、缺少条理化的“微话题”、缺少个性化的“微推荐”、缺乏一体化的“微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高校图书馆微博阅读推广建议。在微博中设置阅读推广“微话题”可以彰显阅读推广理念、放大阅读推广效果、引导阅读推广方向。

公共图书馆的推广与发展需要借助相关的营销传播理论来解决其大众认知度偏低的问题,以保证公共图书馆成功向知识共享空间发展的未来趋势,苏超《公共图书馆从“我存在”到“我成长”的跨越转变——基于声浪传播理论的图书馆营销推广新概念》在“公共图书馆的推广与建设可以参照星巴克的成功经验”的分析基础上,引入了中国学者自己提出的声浪传播理论,建立了公共图书馆“声浪圈”,并分析了公共图书馆实现推广宣传的路径。农村地区的阅读活动开展是全民阅读推广的重点和难点,是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实现普遍均等阅读服务的基本要求,而县级以下的基层图书馆尤其是农村图书馆被置于公共图书馆范畴之外。陈辉玲《城乡一体化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与公共政策研究》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分析,城乡一体化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主要特点。农家书屋建设是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重要举措。围绕“农家书屋”议题,学术界产生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申研《农家书屋建设研究述评:区域经验、弱势群体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对CSSCI期刊文献的梳理,发现以往综述多是对文献的数量分布特征等进行分析和讨论,缺少对近三年研究成果代表性观点等的深入总结和对其共识与分歧的评论。为此,以农家书屋建设在

“区域经验”、“弱势群体”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方面形成的研究“焦点”为切入点,总结这些研究的基本要点,指出共识与分歧,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儿童阅读是处于失声状态的。杜定友曾说:“从前的图书馆的馆员和阅者,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总以为儿童是最可恶、最讨厌的东西;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尤其是图书馆,都挂了‘儿童免进’‘孩童恕不招待’的牌子”。权雨桃《民国时期儿童阅读研究述略》概述了民国时期儿童阅读的背景,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儿童阅读研究中有关儿童阅读兴趣、阅读能力以及阅读指导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从中提炼其先进的理念及经验,为我国当代儿童阅读工作提供了借鉴。针对我国中小城市图书馆在幼儿绘本阅读服务中存在的不足,谢蕴《中小城市幼儿绘本阅读实证分析研究——以开封市的调查问卷为例》通过社会调研,有针对性地提出图书馆服务应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期为中小城市图书馆开展幼儿绘本阅读服务提供借鉴。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网络文学阅读借此机会也有很大的发展,与经典文学阅读产生了矛盾。对于这个问题,各大高校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保证大学生足够的经典文学的阅读,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阅读习惯,培养他们对于经典文学的鉴赏能力,王丽娟《高校图书馆文学经典阅读推广的问题与对策》针对这些问题对如何加强高校经典文学阅读推广力度做了简要的探讨和研究。¹²³图书馆是杭州汉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我国首家闲置图书循环阅读网络推广平台,它以蒲公英模式为核心,实现了社会闲置图书资源共享、价值共享和就近共享,有效解决了社会闲置阅读资源浪费问题,李国朋《123图书馆的自组织发展模式及其启示》认为这种模式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可持续循环的阅读文化,对我国社会阅读资源的共建共享有重要影响。

二、图书馆学研究

(一)文献学

汉代写书的材料,这些年发掘出来的比较多,

为研究当时图书形态提供了宝贵的依据。饶增阳《从出土文献看汉代藏书在文献学史中的地位》认为上世纪我国出土的大批汉代简帛,真实地再现了汉书涉及内容之丰富,以及藏书活动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文献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回族文献,是指以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小经”文等记录、与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有关的文献档案资料,以及用以上文种的口语传唱承袭的口碑记录。回族文献目录的编制与利用起于元朝,至今已有大量产品,李敏《回族文献目录工作述评》梳理这些目录著作,探索编制的时代特征和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为民族目录学成长提供参考,给回族文化发展研究提供更丰厚的学术积累。石刻文献指以石头为介质镌刻书写的,供阅读识别的语言文字资料,也包括石质材料的雕刻、画像等非文字信息,牛红广《石刻文献的内涵及属性——兼与刘延华女士商榷》认为石刻文献的载体类型包括不同形制与功用的石刻原件,也蕴含艺术风格多样的石刻拓片和拓本。

在中国文化史中,具有读书、治学、入世传统并传之久远的书香门第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王安功《风尚与渠径:明代江南“书香门第”的构建及启示》从发达的编纂刊刻事业和普遍存在的图书藏抄风尚、书香门第的形成以修齐治平理念为内生动力两个方面阐述了明代江南书香门第形成的社会氛围。家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母系氏族后期开始,经历了口传、结绳、甲骨、青铜、谱牒等形式。谢琳惠《家谱中“祖”字文化内涵探究——以河洛地区若干家谱为例》认为“祖”字由“示部”与“且”字结合而成,基本含义有四个方面,一是指崇拜,二是指宗庙,三是指祖宗或族人,四是指祭祀。其蕴含着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祖宗崇拜、祭祀仪式、孝悌精神等集体无意识。

佛道老庄思想对宋代知识精英阶层的渗透是比较显著的,郭祥正也不例外地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观念,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杨宏《佛禅老庄思想与郭祥正诗歌创作》认为这些诗歌传达出诗人渴望隐居佛寺,借佛禅来求得身心解脱,而老庄思想中逍遥至乐、齐万物等死生的理论以及由

老庄思想发展而来的传统隐逸和道教游仙掺杂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最后形成诗人特有的以求仙为外壳、遁世隐逸为实质的思想体系。在熙宁变法中,张载与王安石曾经同朝为官,先后应召入对,共同表达了“复三代”的政治理想。卢有才《张载与王安石:熙宁变法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在变法的方式方法上,二人存在着较大分歧,故而“语多不合”。张载以“渐化”哲学为理论指导,倡导渐进的革新方法,主张行“井田”、复“周礼”;王安石以“尚变”哲学为思想武器,“以理财为方今先急”,除旧布新,全力推行新法。

李致忠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李先生的《三目类序释评》一书把中国目录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种著作《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进行了比较与释评,李正辉《〈三目类序释评〉献疑》认为这对于初学者可提纲挈领、答疑解惑,功莫大焉,但在受益匪浅的同时,发现李先生之释评偶有疏漏,并提出了疑问。韦棣华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杰出女性,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程大帅《韦棣华研究述评》认为目前对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其人、生平考辩、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图书馆精神、韦棣华基金、中华图书馆协会7个主题,并在核心著者群、基金项目资助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这些研究在史料占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角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

近年来中国文献辨伪学研究文献数量大增,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一定突破。王国强《近十年中国文献辨伪学研究述评》从文献辨伪学的整体反思、文献辨伪方法研究、文献辨伪学家的思想和方法研究、文献辨伪成果及西方文献辨伪学译介等入手,讨论近十年中国文献辨伪学研究的成就、特点和局限,并对未来文献辨伪学研究提出建议。

在图书馆史学研究中,史料是基础,史料整理既颇见功力,又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原小平《简论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史料汇编》认为史料整理本身,可视为图书馆史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属于图书馆史研究的一部分。民国校勘学是

现代学科意义上校勘学理论的滥觞时期,杨翔宇《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认为梁启超的校勘学方法奠基了现代校勘学的理论基础,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标志着现代校勘学的正式创立,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集理论、方法、历史于一身,对校勘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使它更加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张舜徽的理论创新则使校勘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促进了这一学科快速发展,也为校勘学屹立于现代学术之林奠定了基础。

(二) 图书馆管理与建设

图书馆发展面临着新的文化环境和信息环境,张怀涛《新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的创新路向》认为图书馆服务必需创新,面对新的环境,图书馆服务的创新路向主要集中在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模式创新、主体创新,从而使图书馆职能不断得到丰富。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打造“互联网+”环境下的创客空间服务体系 and 平台是当前支持社会创新系统优化和公共服务建设任务中的题中之义,张晓桦《创客时代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融合路径研究》认为创客空间是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引入创客空间是图书馆战略转型的前沿趋势,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融合的路径应从认知层面、规划层面、实践层面3个维度切入。李燕波《论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经营模式及发展策略》认为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经营模式主要分为创业型、协作型和集中分布型3种,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发展策略主要包括:全面评估影响因素,精准定位发展模式;核算运营成本,评估未来价值收益;建立在线交流平台,开办互动培训课程。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量的未知数据被发现、激活,知识信息更新内容与速度持续加快,作为知识搜集、存储、组织、控制、发掘、传送的高校图书馆受到的冲击首当其冲,袁红军《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协同创新模型及实现机制》在分析协同创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论述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协同创新的内涵,并构建一个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协同创新模型,建设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协同创新实现机制。

图书馆作为一种公益型社会组织形式,其发展水平必然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胡凤萍《国内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研究综述》认为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是图书馆业态从管理转向治理的标志,图书馆治理的目标应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图书馆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优化策略,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我国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研究的焦点和难点。在关于“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问题的研究中,周九常《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形象论》发现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除了与服务形象、资源形象、文化形象、建筑形象等因素有关外,还与它在社会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关,具体来说,公共图书馆社会角色的地位、类型等对其社会形象产生或多或少的影 响,并就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周九常《新保守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解析》认为我国图书馆新保守时期上至1902年,下到1989年,在这个历史时期,公共图书馆的传统性依旧存在,具有明显的保守性,馆藏资源通常被称为“文献”,图书馆的主要职能表现为藏与用,而处理这一矛盾关系的基本态度是“藏用并重”,并且公共图书馆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性机构。王佩《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区域差异研究》以我国大陆31个省级公共图书馆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法、基尼系数,从资源投入、服务产出、民众受益情况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省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进行分析。

国内学界对参与基层图书馆服务供给的社会力量一般排除具有官方背景的个人或组织,以及图书馆文化企业,李娟《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图书馆服务供给模式研究综述》虽然基本认可社会力量通过捐助、直接办馆、合作、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基层图书馆服务供给,但在参与模式上多基于现有案例分析,划分标准上不尽统一,更缺乏可持续支持模式和激励方式的研讨。民间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沈光亮《民间图书馆“民办官助”发展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有责任通过资助、委托、服务购买、合作建馆、吸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建设、NGO 援助援建等“民办官助”方式对民间图书馆给予扶持,切实增强和提高自身的社会服务功能和发展能力,真正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多元化供给,让社会民众最大可能地获得图书馆服务。私人图书馆在我国源远流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私人图书馆在我国方兴未艾,同时面临着诸多困惑和挑战。朱珍《私人图书馆的兴起、困境与发展条件探讨》认为私人图书馆发展的条件应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着手,包括采取扶持政策、完善法律法规、拓宽融资渠道、创构盈利模式、打造服务品牌、加强监督管理等。

我国对图书馆治理的研究始于 2000 年,研究文献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胡凤萍《图书馆治理研究综述》从研究内容上看,我国学者对图书馆治理概念的理解虽然存在差别,但却是大同小异。从实践上看,我国图书馆治理仍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法制保障、建设主体责任缺失、建设主体形同虚设、建设主体能力分割等方面。伦理激励通过外在诱因和内在动力的共同作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沈光亮《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的伦理激励》认为一般通过价值激励、需求激励和制度激励三个基本途径,以行为认可、政策支持和专业帮助等形式予以实施。图书馆绩效评价是对照统一的指标,采取一定的方法,对图书馆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在一定时间内经营图书馆所取得的业绩以及图书馆在一定时间内提供各项服务中所获得的效益进行评价和测评。赵春辉《我国高校图书馆绩效评价研究进展及问题分析》在梳理了我国高校图书馆绩效评价研究脉络的同时,从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数字资源评价、人力资源评价、业务工作评价五个方面评述了其研究热点及进展,最后剖析了学术研究和评价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图书馆集成系统的技术和性能瓶颈也日益凸显出来,郑丽平《对比分析国外高校图书馆集成系统对人员配备模式的影响》对比分析了国外新旧图书馆集成系统对学术图书馆系统和技术服务人员配备模式的影响。从 21 世纪伊始,我国公众到图书馆借阅图书的人

数就一直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成骥《读者参与图书馆制度设计的问题刍议》从分析我国民众对图书馆的消极态度入手,通过介绍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的历史演变,探讨我国图书馆制度存在缺陷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图书馆制度在设计过程中忽视读者的参与。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已经成为国内图书馆提高社会认知与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和图书馆理论研究的热点领域,王平《国内未成年人图书馆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试图通过质化研究发现影响国内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以此作为确定满意度指标体系和提升服务水平的前提和基础,并以实地访谈和扎根理论为资料获取和观点归纳的方法展开研究。

开展用户研究能提高图书馆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蒋霞美《图书馆老年用户模型构建研究——基于两所图书馆的实地调研》通过对周口市图书馆和周口市川汇区图书馆等两所公共图书馆的实地调研,提出了图书馆老年用户模型的构建步骤和方法。海峡两岸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涵盖用户进出馆、馆内行为举止、资料借阅、功能区使用、座位使用、电子资源利用、校外人士入馆等方面,付立宏《海峡两岸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比较分析》经过对比,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可取之处较多,但两岸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 图书馆员

图书馆员肩负着引导读者进行深度阅读的社会责任,其自身的阅读行为更应备受关注,杨俊丽《基于数字化阅读调查的图书馆员专业阅读需求与行为实证研究》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馆员数字化阅读的问卷调查结合馆员深度访谈,探讨当代馆员在阅读认知、阅读方式和阅读兴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重拾职业情怀、寻找专业阅读圈、拓展国际视野等馆员阅读策略。杨俊丽《高校图书馆员专业阅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通过统计图书馆员专业图书的借阅量,调查馆员阅读纸质和数字化专业信息的情况,结合深度访谈,分析和探讨图书馆员在专业阅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

出加强馆员专业阅读的策略。自我管理是个体主动应用认知及行为策略对自身的思想、情绪、行为以及所处环境等进行目标管理的过程,刘小锋《实施馆员自我管理和知识转移关系的试验与启示》通过读者参与辅助馆员自我管理过程,结合试验和问卷调查,明确了馆员知识自我管理中的潜在目标对象、管理时间、频率及周期、自我管理评价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

随着社交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图书馆采访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侯爱花《社交媒体环境下采访馆员角色的转型》认为采访馆员既要做好传统采访工作,更要注重书刊策划、数据分析与阅读推广,同时,应从网络技术运用、知识经验积累和创新思维方面提高自身能力。学科服务是图书馆服务创新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但学科馆员的知识特性影响着学科服务知识整合的深度和广度,袁红军《学科馆员的知识特性对学科服务知识整合创新绩效的影响》从知识特性和知识整合的视角,构建了学科馆员的知识特性对学科服务知识整合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构模型,详细剖析了该模型中诸要素间的彼此作用机理,揭示了学科馆员的知识特性、学科服务知识整合和知识交流共享三者对学科服务知识整合创新绩效的影响,再现了知识管理对提高学科服务创新绩效的重要性,为提升学科服务创新绩效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相较于第一代学科馆员,学科馆员 2.0 在服务内容与深度、角色与责任、手段与模式、素质与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陶海柱《论云计算环境下学科馆员 2.0 的服务职能及服务素质》要求学科馆员必须拓展和深化信息沟通、教育培训、信息建设、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等职能,提高和强化知识、能力、职业道德等素质。MOOC 教育模式的出现教育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以互联网技术及智能设备为依托的 MOOC 教育考验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能力,张文娟《基于 MOOC 教育模式的深度学科馆员服务创新》在分析学科馆员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度学科馆员的概念,阐述了深度学科馆员学科背景、服务方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等特征,探

讨了大数据时代深度学科馆员嵌入 MOOC 课程制作流程的服务模式、创建 MOOC 学习帮助中心以及参与 MOOC 学习以提高自身信息素养等问题。

(四) 国外图书馆学研究

目前,许多国家针对学龄前儿童开展了一系列的阅读推广活动,澳大利亚 Read4Life 项目是一项旨在为 0-5 岁儿童建立起阅读重要性感知的嵌入式活动,权丽桃《澳大利亚 Read4Life 项目对我国儿童阅读推广的启示》通过该项目的运作及实施情况透视澳大利亚学龄前儿童阅读推广的经验,以期能为我国开展学龄前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带来有益的借鉴与参考。科学数据是指在科技活动中获取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变化规律等的原始基本数据,以及根据不同科技活动需要,进行系统加工整理的各类数据集。完颜邓邓《澳大利亚高校图书馆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的调查分析》通过对 U. S. News 发布的澳大利亚高校排行榜前 19 所高校图书馆开展的研究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调查,发现这些图书馆开展的研究数据管理服务项目主要有制订研究数据管理指南、介绍宣传服务、参考咨询服务、教育与培训服务、存储服务、获取与共享服务等内容。

人种志法是研究者深入研究群体的实地观察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为图书馆空间评估工作开展提供了新视角,张振吉《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人种志方法下图书馆空间评估研究》认为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 SMU 图书馆受人种志方法启发,开创了区域细分评估及整体总览评估的空间评估新体系,并运用至其信息共享空间评估,对国内图书馆空间评估有着启迪意义。经过多年发展,美国高校图书馆治理结构已臻成熟和完善,白永红《美国高校图书馆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化基础》认为美国独特的政治和权力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共享性、制约性和分散性等特点,在低权力距离文化下,美国社会公平观念十分强烈,强调人人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平等权利,而各级政府也在制衡观念影响下具有了松散性特征。赖彤《美国公共图书馆儿童服务实践_基于网络内容的分析》以美国 50 个州主要公共图书馆为调研对象,通过网络内容分析发现,

美国公共图书馆儿童服务内容丰富,特点突出,贴近儿童实际需求,基础阅读服务专业完善,服务主动性高,致力于采用多种方法激励儿童阅读,非常注重与学校教育的结合,重视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儿童使用的安全性。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是指图书馆制定的、用户在享受图书馆服务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付立宏《美国国家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比较研究》研究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这三大国家图书馆的用户义务性规范涉及用户个人物品限带、馆内用户行为、借阅、个人财产保护、游客、知识产权、网站信息安全等方面,其规范良莠少,对我国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英国三大国家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内容涉及用户入馆、阅览活动、馆藏作品版权保护、外借活动、馆内设施和物品使用、用户安全、用户对馆员和其他用户的尊重、少儿用户对图书馆的利用和用户出馆等方面,付立宏《英国国家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比较分析》认为这些义务性规范定位明确,除少数地方需要改进外,大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国外大学图书馆为 MOOC 提供版权服务呈现出学术研究渐趋活跃、扮演多元化的版权角色、突出版权教育的重要地位等特征,陈良《国外部分大学图书馆为 MOOCs 提供版权服务的动态与评价》认为图书馆开展版权服务推动了 MOOC 的发展,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丰富了图书馆管理版权的经验,为立法创新提供了依据。王平《国外社群信息学教育与研究实践现状》通过网络调查和文献分析,考察国外 CI (community informatics) 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研究机构、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发现国外 CI 教育与实践呈现出资金支持下的以项目为导向、教育与实践一体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①CI 研究与教育紧密结合,相互支撑;②CI 研究与教育受惠于研究基金支持;③CI 研究与教育凸显实践特色;④CI 研究与教育重视方法论指导。

三、资源建设

(一) 信息资源建设

图书采访是高校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环节,如何

有效地进行质量控制成为做好采访工作的关键,张新杰《高校图书馆采访有效性质量控制因素分析》通过对各个可控因素进行分析,结合相关经验、技术,尽可能制定规范、量化数据,保证采访质量控制的可操作性、有效性,以此来满足读者需求。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出版行业带来了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已经直接影响其下游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李云霞《全媒体出版背景下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研究》回顾了近年来全媒体出版的快速发展趋势,以及其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带来的重大影响,并基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分析当前图书馆行业文献资源建设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图书馆联盟已成为提升图书馆创新水平、促进知识资源整合、增强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侯爱花《基于生命周期的图书馆联盟知识产权冲突与对策研究》认为图书馆在联盟过程中知识产权共享以及知识专有性之间的冲突,对运作和持续发展图书馆联盟造成了阻碍,主要体现在图书馆联盟组建时期、联盟成员的组建构想与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冲突,联盟运行时期知识产权标准以及资源投入程度等方面的冲突,联盟结束时期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的冲突。

网络信息资源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利用的各种信息资源的总和,刘月学《网络信息资源融合机理研究》从网络信息资源、信息融合、网络信息资源融合的基本概念入手,从原理、体系结构、关键技术三个方面阐述了网络信息资源的融合机理,指出网络信息资源融合是实现网络信息资源科学化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作为一种经济产品,数字产品既具有经济产品的一般特征,也具有数字化带来的特征,一般用户由于不具备相应的产品知识,无法对其价值独立作出正确的评价,用户购买决策从众现象较为普遍,尚新丽《数字产品需求的从众效应分析》在简述数字产品特征的基础上,从网络效应、信息跟随效应和口碑效应等方面分析数字产品需求从众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电子图书长期保存既存在一些共性的困扰,也有针对不同类型电子图书的特殊困扰,臧国全《电子图书长期保存的困扰》认为共性困扰主要来自于电子图书的虚拟

化拥有属性、电子图书的格式多样化、数字产权管理等,数字转换型电子图书的特殊困扰主要来自数字转换质量,纯电子图书的特殊困扰主要来自自助出版模式、电子图书包含的内嵌对象、内容的稳定性、呈缴本制度、电子图书唯一标识符等,基于因特网的集体创作型电子图书的特殊困扰主要来自产权许可、保存价值、保存动机缺失等。阅读终端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使纸书出版的跨界融合成为必然,高校读者是纸书的主要受众,出版机构要积极实现与高校的融合,王瑞珍《阅读终端多元化时代纸书出版与高校融合的思考》通过充分掌握读者阅读需求特征、尝试建立高校图书荐购数据库模式、有效运行高校图书选题机制和恰当借助电子书推进纸书发展等方式,创新纸书的发展路径。家庭阅读资源是社会阅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有效地满足读者差异化和个性化的阅读需求,针对我国家庭大量的阅读资源,李国朋《家庭阅读资源共享模式研究》从资源共享、价值共享、服务创新和信用评价等方面研究了家庭阅读资源的共享模式,指出将家庭阅读资源纳入图书馆循环阅读体系不仅是社会阅读资源建设观念的创新,也是市场观念的深化,需要国家、社会、图书馆及家庭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对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和推进全民阅读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业务外包是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化三方合作外包,能够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降低信息资源数字化独立外包存在的问题,王晓燕《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化三方合作外包模式探索》从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化外包的成因、独立外包存在的问题、三方合作外包模式及其优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数据库呈现出垄断特性并成为趋势,最突出的表现是居高不下的价格和年度涨幅,李明理《“程焕文之问”的数据库垄断观解读》分析了程焕文教授《十问数据商!!!》博文对数据商在数据库产品的定价策略、销售模式、使用规则、合同条款等方面不合理性的质疑,讨论了数据库的垄断以及数据商对垄断权的滥用,建议图情界采取多种策略应对,最终化解危机。在与图书馆的数据库贸易中,

数据库出版商利用版权垄断地位滥用许可权,秦珂《出版商在图书馆数据库贸易中滥用许可权的反垄断法规制》指出数据库出版商滥用许可权的行为包括“搭配销售”“价格控制”“拒绝许可”“权利限制”等,我国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立法有待完善,切入点包括科学选择政策取向、开展专门性立法、建立详细的操作指南、确定违法审查标准等。公共文化机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开放存取数据库、自建数据库和商业数据库,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它们分别涉及不同的版权问题,高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的数据库版权问题》认为需要规划好资源整合的版权策略,包括强化版权意识,注意保护被整合的数据库的知识产权等方面。

(二) 新媒体资源建设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在推动高等教育新一轮变革的同时,引发了诸多新的版权问题,郝瑞芳《大学图书馆版权管理和版权服务的新视点——关于MOOC建设与发展的思考》认为大学图书馆在解决MOOC版权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版权清理者、版权政策制定者、版权利用行为的指导者、版权许可服务者、替代资源组织与提供者等多种角色。E-reserves是MOOC教育进程中图书馆员信息资源服务新模式,相对于嵌入MOOC教育模式而言,E-reserves嵌入服务更贴近特殊专业和小范围教育,是图书馆员嵌入MOOC教育的基础形式,王瑞珍《MOOC教育进程中E-reserves嵌入课程服务模式研究》认为资源获取与组织、信息揭示与推送、协同教学服务、拓展课程知识服务和融入MOOC学习等是E-reserves嵌入课程服务的重点。翻转课堂在文检课中有着重要意义和广泛用途,田艳艳《文献检索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型构建》在分析翻转课堂内涵的基础上,详细地探讨了翻转课堂对传统文检课的冲击,指出翻转课堂的一些概念、原理和方法移入文检课,能够提高传统文检课的教学质量,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文献检索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型。自主自助学习能力包括自我规划能力、自我选择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我评价能力、自我激励能力、信息处理

能力和协作交流能力等,刘巧英《全媒体时代大学生自主自助学习能力培育研究》认为高校要努力提高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变革教师和管理者观念,充分利用社会网络资源构建多样化的学习共享空间,积极培育大学生的终身自主自助学习能力。

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具有便捷性、背对脸、原创性、草根性等特点,王娜《微博刷屏与其对用户获取信息效果影响的调查研究》对用户的微博使用情况和刷屏情况进行抽样调查与分析,并提出一种解决微博刷屏的方案。伏琰《图书馆微博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985工程”大学为例》通过覆盖度、活跃度、交互度三个方面考量,甄选了16项指标用以评价微博影响力,建立了图书馆微博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科技博客社区核心功能是扩散知识,目前学者对其知识扩散动力系统研究较少,马育敏《基于知识扩散动力视角的科技博客增值机制研究》阐述了社区的知识扩散机制与知识扩散动力系统结构,同时提出增值社区知识扩散动力的新方法。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让社交工具改变着人们的信息利用行为与规律,靳佳丽《我国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评价》阐述了微信及其公众平台的特点,并以国内排名前8的高校图书馆为例,利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图书馆微信服务的各个层次进行量化评价。韩娟娟《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账号服务研究——以“211”高校为例》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账号信息推送、自定义菜单服务等功能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发现存在一馆多个账号、伪公众账号、自定义菜单功能缺乏创新等方面问题,并希望完善微信公众账号服务功能,构建良好安全的微信服务环境,更好地为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为避免信息过载的危害,移动社交网站应向用户推荐更符合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信息,王娜《移动社交网站中的信息过载与个性化推荐机制研究》通过对移动社交网站的信息过载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了信息过载产生的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构建了面向移动社交网站的个性化推荐机制的宏观架构,并进一步探讨了该机制关键模块的功能和关键步骤的

技术实现问题。

四、信息服务

(一) 检索与咨询

根据1935年的《全国图书馆调查录》,当时全国设立了近2500所图书馆,管理人员达5000余人,王菊明《中西杂糅:民国二十四年图书馆文献分类法探析》认为这些图书馆所藏图书以中国传统文献、近代新型文献、外国文献以及生活常识小书等为主,其文献分类法主要包括中国近代新型文献分类法、四库分类法、杜威十进法以及混合型分类法,反映出这一时期图书分类法呈现中西杂糅的特征。任何一部检索语言的修订是不可避免的,李敏《〈中图法〉G250和G350类目体系的修订研究》试图在梳理这些修订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其修订特点,进而阐明修订对两个学科建设和《中图法》发展的意义,并提出续修建议。

为丰富和完善馆藏数字信息资源,陈雪《基于语义信息检索的馆藏数字资源优化方法研究》提出了基于语义信息检索的馆藏数字资源优化方法,以期提升馆藏资源的检索与利用效率。在检索过程中充分利用医学文本中的语义信息有助于提高检索性能,郭少友《基于细粒度语义化描述的医学文本检索》在分析现有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细粒度语义化描述的医学文本检索算法,并通过实验对算法进行了验证。网页语义标注是指利用本体对蕴含在网页中的知识进行描述以便计算机和人均能理解,郭少友《网页语义标注研究综述》首先对网页语义标注的涵义、要求和形式进行分析,然后分别讨论静态网页和动态网页的语义标注方法,并对现有的标注工具进行总结,最后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泛在网络的背景下,信息资源将会出现新的特征,王娜《用户参与性分类法在泛在网络搜索引擎中应用的探索》在分析目前搜索引擎应用于泛在网络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两种典型分类法用于组织泛在网络信息资源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用户参与性分类法,并进一步研究了其设计策略,同时探讨了将其应用在搜索引擎中后,对搜索引擎的基本架构与流程的变革,以及其所起到的优化作用。智能手机越来越普

及,为读者提供移动图书检索服务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李翠侠《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图书移动检索系统的研究与实现》提出一种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图书移动检索系统框架以及一种基于图书检索定制的语音识别服务优化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 HTK、SRILM、JUICER 三个开源项目来构建的具体实施方案。

参考咨询工作是高校图书馆业务活动中最能体现信息增值和服务价值的工作,赵春辉《中外高校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宏观对比研究》对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研究与实践现状进行梳理,通过定性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与国外的差距,提出改进措施和展望。参考咨询是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袁红军《国内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参考咨询服务调查分析》利用网络调查法对 27 个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参考咨询服务项目进行调查,提出从逐渐完善与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式“大咨询”服务体系、进一步扩大多样化的服务方式,以及强化服务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入手,提升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参考咨询服务创新绩效。袁红军《合作式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知识转移生态学机制构建》在分析 CDRS 知识转移及其知识生态学的内涵基础上,构建了 CDRS 知识转移知识转移生态学模型。

(二)信息组织

分众分类(Folksonomy)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产生的一种新的信息组织方式,刘永《分众分类的特点与应用策略研究》在仔细分析 Folksonomy 区别于传统信息组织方式的特点的基础上,对新旧两种方式相互结合的模式进行了概述,最后讨论了 Folksonomy 与图书馆传统服务相结合的几种应用,以期为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提供新的研究视觉。在社会化标注系统中,标签是用户对资源进行标注的结果体现,赵开慧《基于社会化标注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方法研究》在已有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方法的基础上,将社会化标注融入个性化信息推荐之中,设计了基于社会化标注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方法。

王娜《泛在网络中信息组织方式的比较与模型构建研究》在泛在网络中信息种类和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泛在网络中主要信息组织方式的应用情况,并就用户检索信息时较关心的效率、相关性和用户体验这三个指标对泛在网络中的主要信息组织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可将多种信息组织方式相结合来提高信息组织效果的结论。针对信息资源的决策效用评价问题,王素立《基于决策效用评价的信息资源结构化组织策略研究》深入探讨了信息语义特征及与其数据结构的相关性,提出相应的结构化与层次化组织基本原则与模型。王娜《移动社交网络中个人信息保护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从用户行为习惯视角出发》对移动社交网络中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进行抽样调查,并在对用户行为习惯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保障移动社交网络中个人信息安全的策略。袁静《移动网络下高校用户信息行为的实证调查与分析》对高校用户信息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通过移动终端获取信息成为高校师生的普遍行为,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此,提出高校开展移动图书馆服务的几点建议。金燕《科研团队成员的协同信息行为模型》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科研团队成员间的协同信息行为过程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研团队成员间的协同信息行为模型,指出科研团队成员协同信息行为产生的外部和内部驱动因素,并对科研团队成员间协同信息行为规律进行分析。金燕《学术型 UGC 社区用户协同信息行为的调查与分析》介绍学术型 UGC 社区的内涵以及特点,以“小木虫”为例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的基础上,识别出学术型 UGC 社区的用户主体及其协同信息行为的主要类型,统计与不同类型主体进行协同的满意度,并据此探讨学术型 UGC 社区用户协同信息行为产生的协同效益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网络的海量信息出现了信息冗余、信息质量良莠不齐、内容真伪难辨等问题,周春雷《科学网博文质量评价研究》通过对科学网参赛博文的多角度分析,初步探索了影响博文质量的各种因素,为优化博文质量评价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杨瑞仙

《大数据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 2002—2012 年间 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收录的大数据方面的论文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统计分析工具 Spss17.0 中的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 Ucinet6 可视化工具,从发文增长规律、作者分布、研究机构分布、期刊分布、以及高频关键词等多角度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及可视化分析,揭示了我国在大数据领域的研究现状,并总结出研究特点,以期对大数据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未来大数据的发展提供参考信息。为了更深层次地全面揭示科研实体关系,杨瑞仙《基于海量数字资源的科研关系揭示方法研究述评》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数字资源科研关系揭示方法,并对现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述评,提出未来应从科研关系揭示原则、科研实体识别与抽取、揭示方法的完善和揭示工具的辅助、深层次科研关系揭示几个方面开展相关研究。海量数字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科研实体,杨瑞仙《基于引文的科研关系组织及其服务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从引文分析、科研关系识别与揭示、引文数据服务与科研关系可视化应用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文献调研和梳理,认为科研实体的识别与抽取研究、基于引证的科研关系揭示与挖掘研究、科研关系的融合与展示研究以及基于引文的科研关系服务应用研究这四个方面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对科研机构命名进行识别是开展机构评价的前提,杨瑞仙《面向知识评价的我国科研机构命名识别方法研究》通过分析国内外机构命名识别方法研究的现状,结合知识评价目标下机构命名识别的特点,在分析科研机构命名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规则与向量空间模型相结合的科研机构命名识别方法及步骤。学位论文与其他文献相比具有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等特点,齐俊景《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分析》从参考文献类型、来源期刊、高被引图书及学位论文所属机构等内容进行分析,旨在了解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历届硕士的学术旨趣和对本领域国内外期刊及重要信息源的了解程度,以期为提高我院研究生乃至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硕士的培养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 知识服务

高校用户在享受图书馆提供的情景敏感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面临个人基本特征、行为情景等隐私泄露的风险,袁静《高校图书馆情景敏感服务中的用户隐私保护研究》探讨了高校图书馆情景敏感服务中涉及的用户隐私内容,分析了情景敏感服务对用户隐私保护提出的新要求,界定了用户隐私保护的范围,并提出用户隐私保护与图书馆服务提供之间的平衡、用户隐私保护有效性评价、用户隐私数据的定期清理等需要关注的问题。用户信任有助于促进高校图书馆情景敏感移动服务的采纳与推广,袁静《高校图书馆情景敏感移动服务用户信任构建》认为用户特征、图书馆特征、移动服务技术、移动终端设备等影响用户初始信任的建立,服务平台、服务产品、制度等促使初始信任向持续信任的转化,通过建立长久的用户信任关系能够促进服务的深入开展。白华《利用标签-概念映射方法构建多元集成知识本体研究》针对大众分类法和知识组织系统各自的优势和缺点,构建兼有大众分类和概念本体特征的新本体,利用语义关联技术为标签添加语义,以克服传统分类线性结构的缺陷。

Web2.0 强调用户参与和自组织,是知识交流的理想环境,李白杨《基于 Web2.0 环境的知识交流模式研究》以 Web2.0 环境下的知识交流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调查、模型构建等方法分析了它的特点,以期能够探索其中规律和更好地促进知识交流的发展。金燕《协同创新网络知识增长的动力模型研究》以协同创新网络为对象,研究其知识增长的动力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识别出协同创新网络知识增长的内部和外部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协同创新网络知识增长的动力模型,分析该动力模型的运行机制。杨瑞仙《基于 SNA 的我国知识组织研究现状分析》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题名或关键词包含“知识组织”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研究文献的年代、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分析,并建立关键词共现的可视化图谱,根据关键词中心性分析,分析知识组织在国内的研究现状。

李亚梅《基于用户认知的学科服务可视化研究》结合用户认知理论和学科服务的研究现状,阐述学科服务与用户认知结构的关系,认为可视化技术手段可以激发用户的认知能力,提高用户的认知层次,并以此构建基于用户认知的学科服务。

图书馆服务的开展有赖于其内涵的确定和其理论基础的支持,探寻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理论基础,王运显《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理论基础研究》认为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是图书馆服务与移动信息服务相结合的产物,个性化服务理论、信息无障碍服务理论和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论等图书馆服务理论,以及碎片时间管理理论、即时性服务理论和泛在信息服务理论等移动信息服务理论构成了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的主要理论基础。知识冲突普遍存在于知识型团队中,袁红军《图书馆咨询团队知识冲突探微》在分析冲突、知识冲突、图书馆咨询团队知识冲突及其类型的基础上,搭建了图书馆咨询团队知识冲突理论模型。

五、档案学研究

档案学研究方法是指从事档案学研究活动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对了解学科发展动态,关注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是十分有益的,陈忠海《档案学研究方法应用的状况、问题及建议——基于2010—2014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所载文献的统计分析》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近五年档案学研究中科学方法的实际应用状况。跨学科研究存在于档案学的教育和实践领域,对档案学科的研究视角、理论发展、研究方法与策略等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陈忠海《档案学跨学科研究的状况与趋势——基于1984—2014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所载文献的统计分析》通过对我国档案学跨学科研究相关文献的分布、跨学科研究的广度、跨学科研究的深度以及跨学科研究存在的问题等四个维度的具体分析,来考察我国档案学跨学科研究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档案学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以期促进我国档案学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是学科构建和发展的元问题,目前,关于中国档案学逻辑起点的表述有多种,孙大东《中国档案学逻辑起点研究》在梳理和

评述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厘正了某些观点上的误解,并进而根据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提出应将档案信息作为档案学逻辑起点的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分组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草案)》时首次提出“依法管理档案”概念,此后,“依法管档”成为近30年来档案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组之一,陈忠海《“依法管档”研究的主要内容、特征及问题分析》对1987年至2015年1月31日间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包含“依法管档”或“依法管理档案”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专业分工的逐渐细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刘永《嵌入性理论在档案管理与服务中的应用探讨》针对专业分工细化与融合泛化的两极发展趋势,分析了“嵌入性”理论的由来及其在档案工作中的客观存在性。在对嵌入性应用背景、应用必要性、应用动因和应用原则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空间的嵌入、技术空间的嵌入和业务空间的嵌入三个维度以及嵌入性专业服务、嵌入性专题服务和嵌入性知识服务三个层面对嵌入性理论在档案管理和档案信息服务中应用模式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基于知识服务的档案管理模式最早是企业提出的,王笛《基于知识服务的档案管理模式理论探索》认为企业在建立档案管理模式时,需要将优秀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结合起来,基于知识服务的档案管理模式就应运而生。图书馆档案是图书馆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全面系统真实的记录,何明举《高校图书馆档案管理工作研究》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的工作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档案管理工作在为全校教学、科研等服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要进一步明晰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正确面对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积极探求方法、措施,管理和利用好档案,使之进一步为高校图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陈忠海《香港地区高校档案网站建设的特点及启示——以香港八所著名高校为例》对香港地区八所高校的档案网站建设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认为它们具有7个方面的特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是,采用中英文界面,方便国际交流;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协同创新;因校制宜,多种多样,突出共享。参照“地市级档案网评估指标体系”,朱琨对陕西省、四川省的档案信息网进行了研究、评价,建议在积极开展档案目录数据库建设的同时,加快开展档案在线全文检索和下载服务。

《错位的价值判定应该被纠正——对档案鉴定及销毁的历史视域考量》一文观点大胆、论证犀利,犹如投在平静水面上的一块石头,孙大东《档案鉴定的历史和现实视域考量——与周林兴、邓晋芝二位作者商榷》在钦佩论文作者学术创新勇气的同时,对文章的观点也提出了疑问。档案是人类社会记忆大厦的基石,档案信息资源是人类社会记忆的源泉,其质量和完整性都影响人类社会记忆的

留存,郭喻楠《试析档案信息资源的形成过程》阐述了档案信息资源形成条件,并从横向、纵向不同纬度分析档案信息资源的形成过程。

综上所述,2015年河南省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继续稳步前进,学者们做了比较清晰、客观的分析和述评,体现出研究的多角度性和多学科交叉性,河南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们的研究特色越来越突出。学者们还努力将学术研究的成果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对图书馆发展、信息研究事业、档案馆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和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图书馆)